C53120 — 39

大學

魯迅回憶錄

上海文藝出版社

魯迅

回憶錄

一集

宋慶齡　周建人　茅　盾等

鲁迅回忆录

一集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215,000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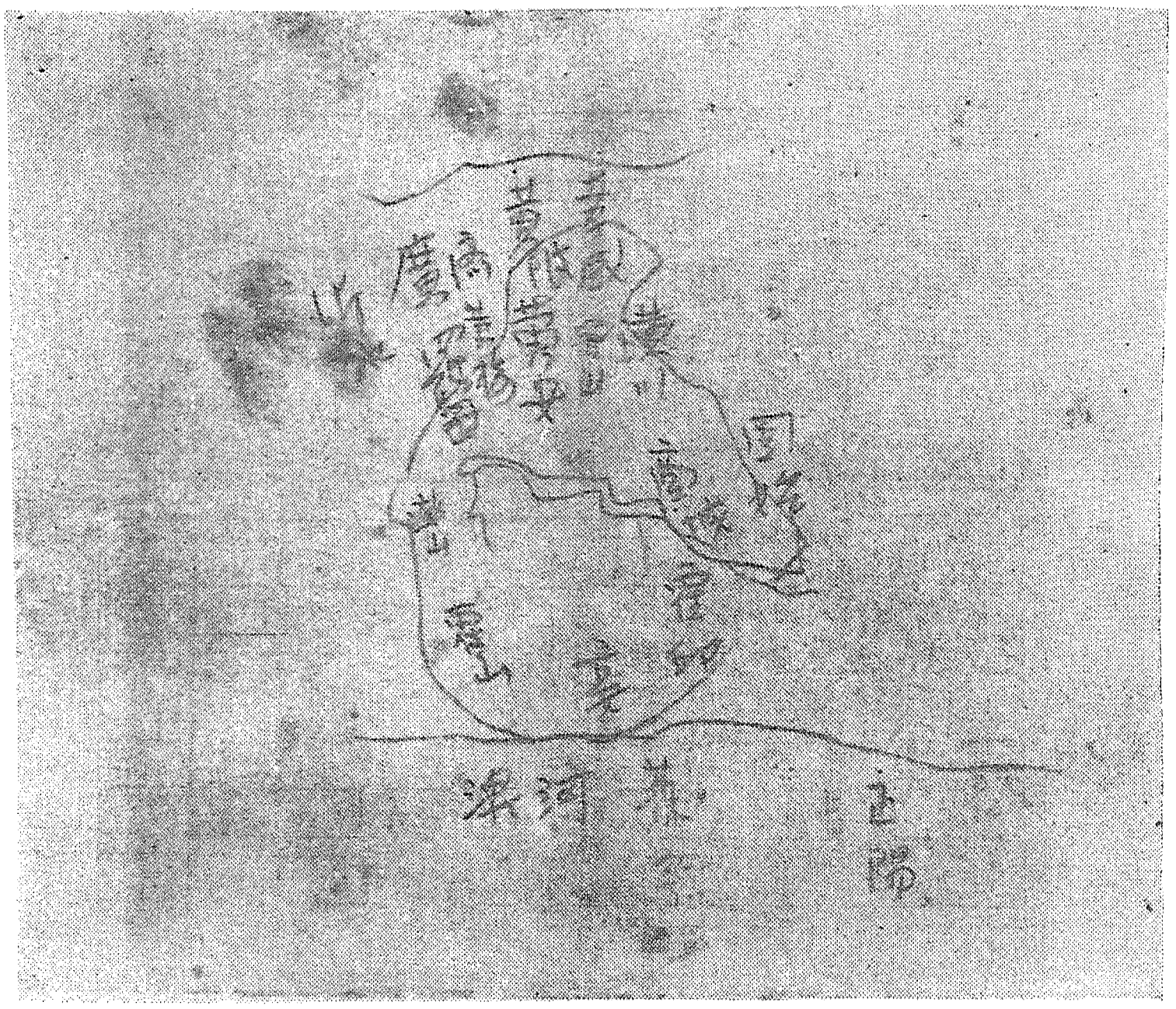
书号：10078·3002　　定价：0.77元

毛主席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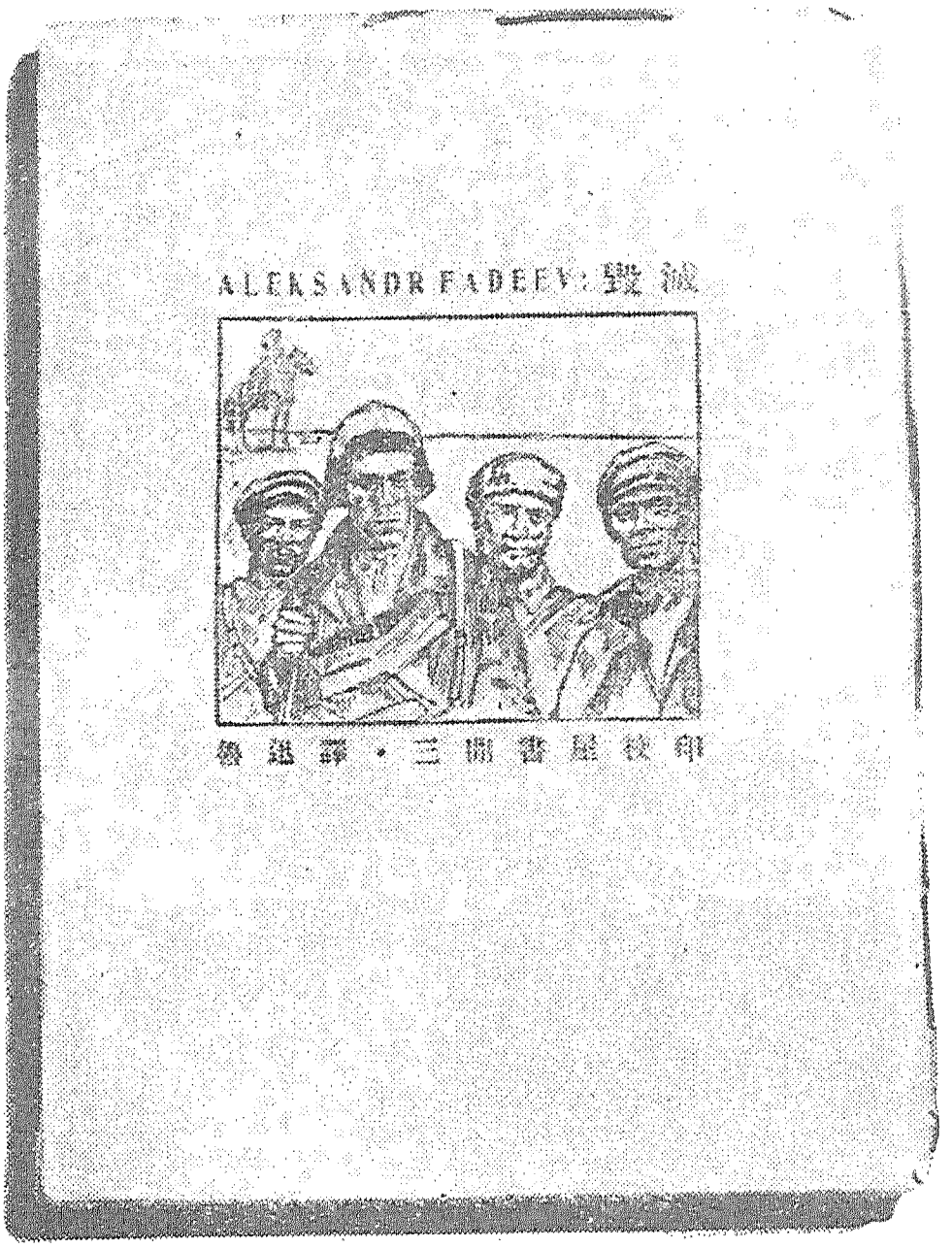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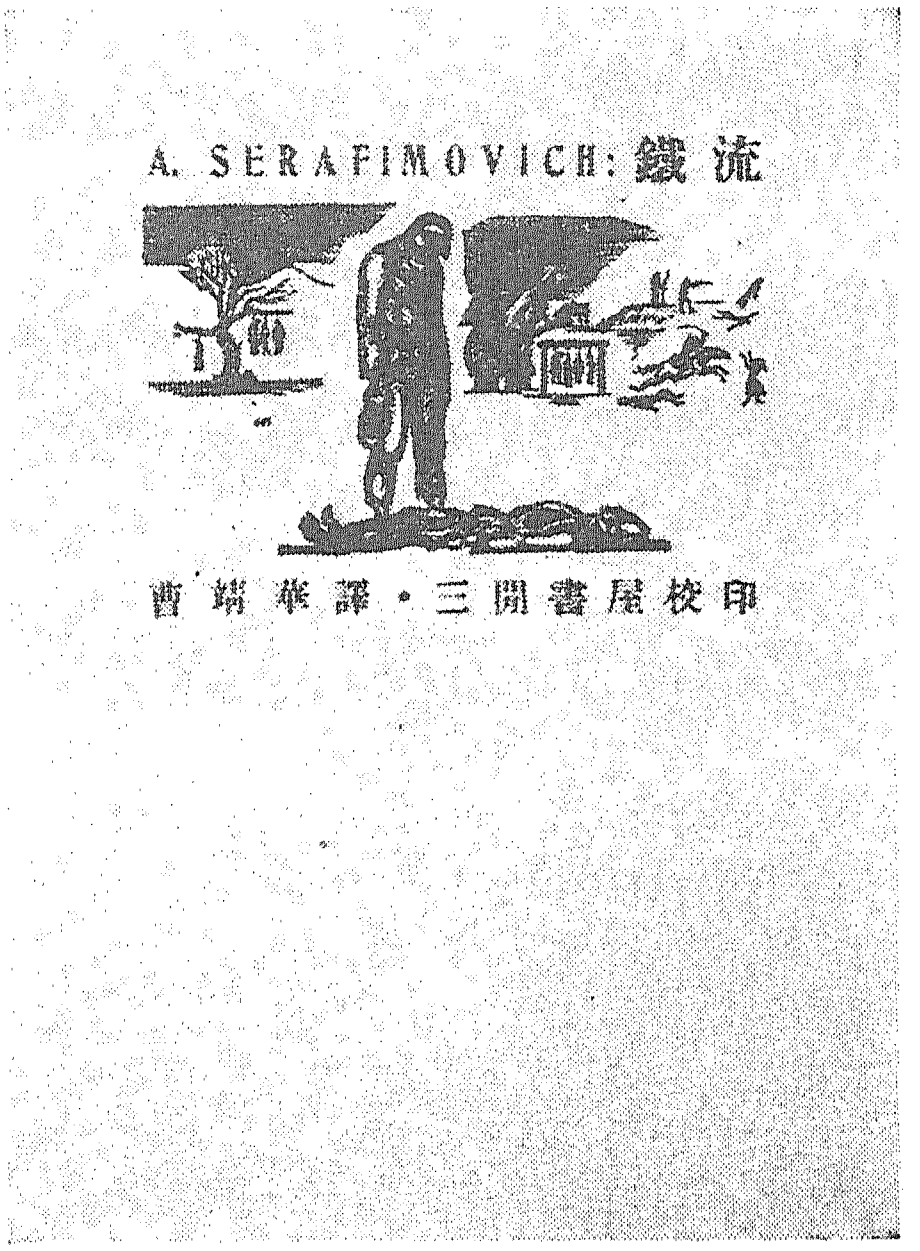




鲁迅保存的陈赓所画红军战斗形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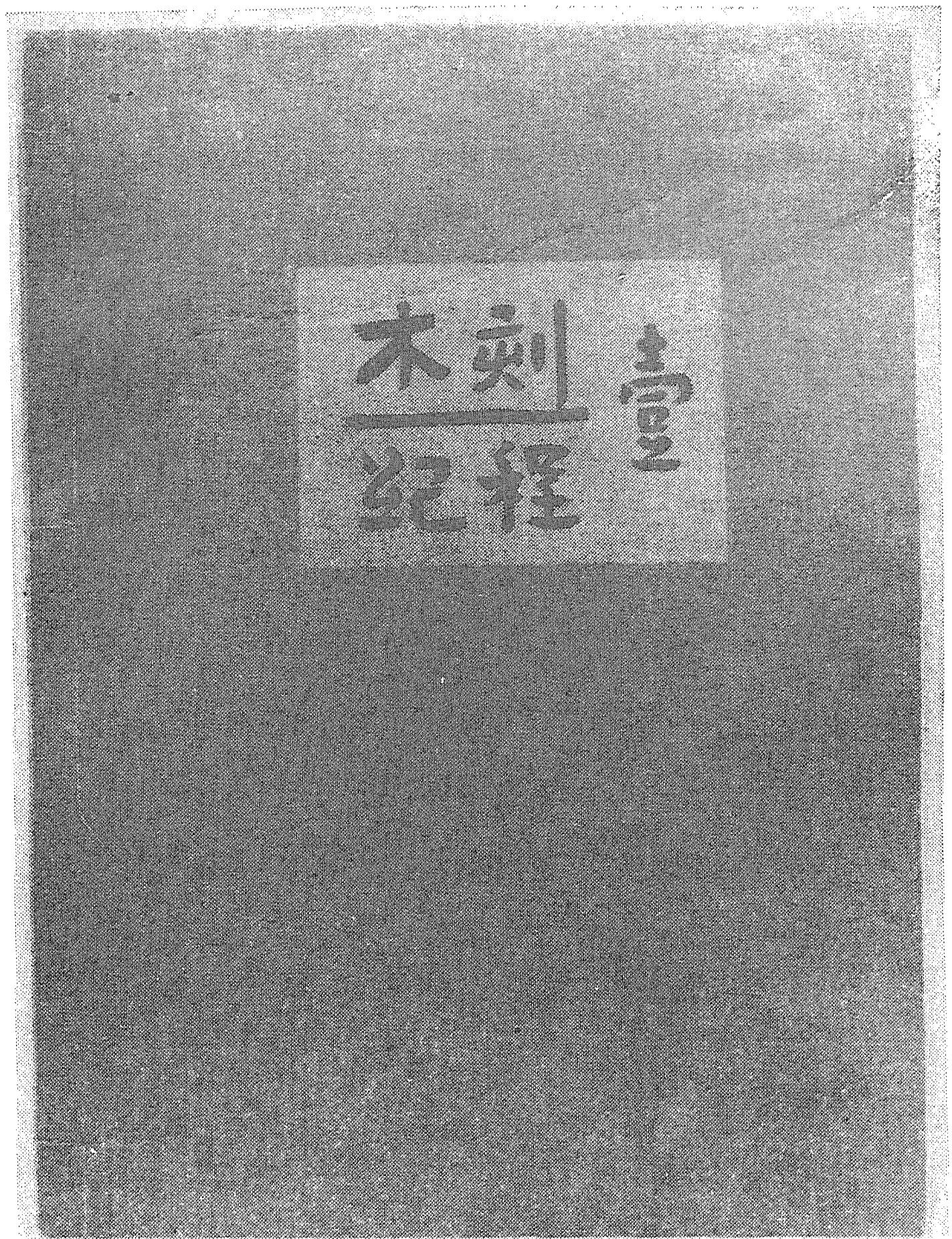
鲁迅译《毁灭》
初版书影



曹靖华译《铁流》
初版书影



鲁迅木刻像(曹白作)与鲁迅题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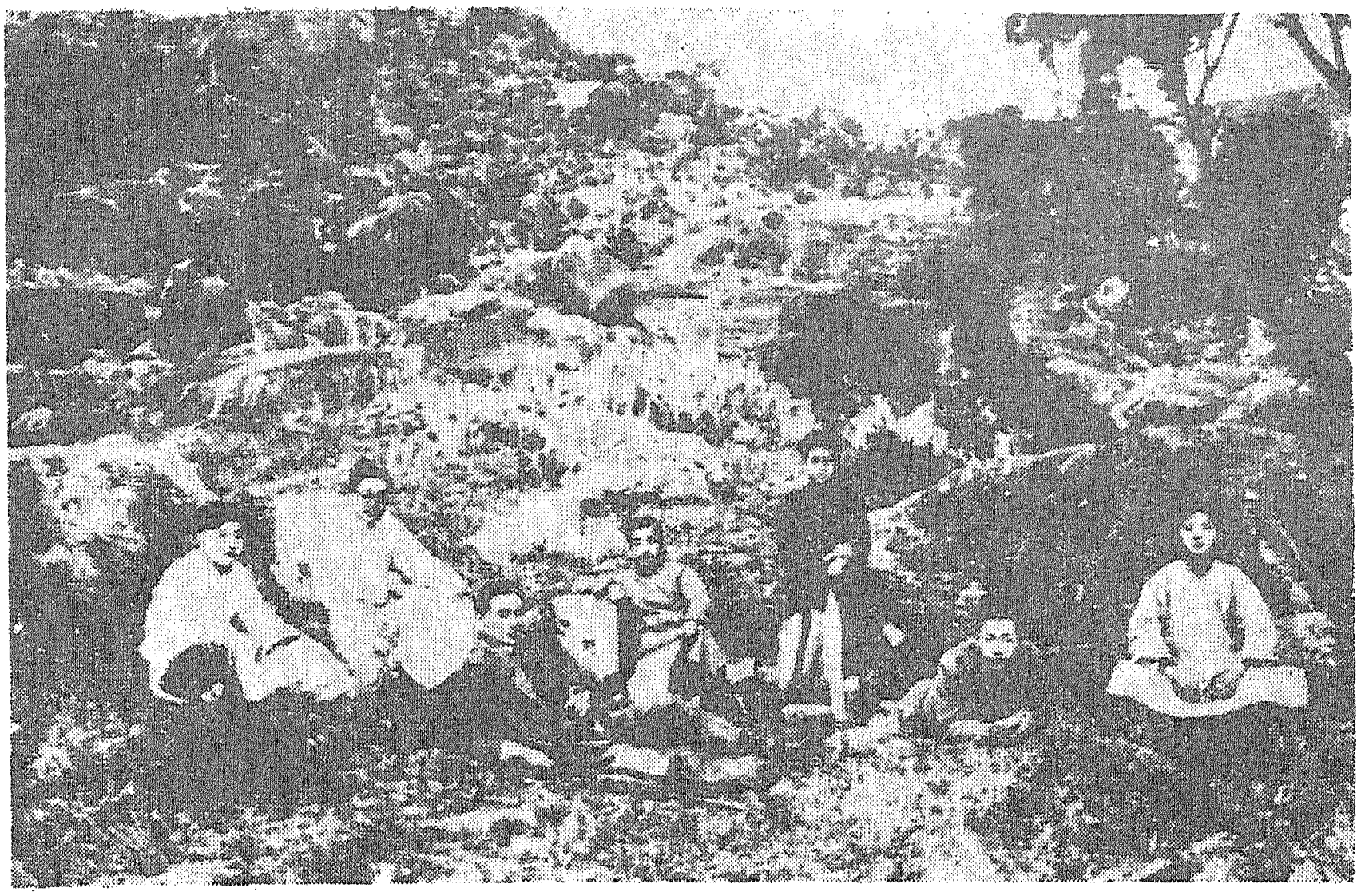
鲁迅编选并作序的中国新兴木刻选集

——《木刻纪程》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1932年11月27日）



鲁迅在厦门时与“泱泱社”青年合影



鲁迅编“奴隶丛书”之一：萧红作《生死场》

目　录

追忆鲁迅先生……宋庆龄（1）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茅　盾（3）
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周建人（7）
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陈望道（13）
"电工"鲁迅……曹靖华（18）
——往事漫忆之一
党最亲密的战友……邹鲁风（25）
——回忆鲁迅先生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徐彬如（32）
永不磨灭的印象……杜力夫（42）
读《永不磨灭的印象》……许广平（48）
陈赓将军谈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50）
一点往事……唐弢（53）
——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
琐　忆……唐弢（61）
鲁迅和韦素园……冶　秋（67）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巴　金（74）
"相濡以沫"……叶圣陶（80）
笑谈虎尾记犹新……冯　至（83）
永在的温情……郑振铎（87）
——纪念鲁迅先生
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孙伏园（94）
忆鲁迅先生和《语丝》……川　岛（98）

回忆鲁迅先生……靳　以（103）
有关鲁迅先生的几件旧事……魏金枝（113）
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李霁野（115）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
一　面……阿　累（137）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曹　白（142）
一木一石……赖少其（156）
忆鲁迅先生……司徒乔（161）
鲁迅先生买去的画……司徒乔（164）
忘却不了的教诲……陈烟桥（166）
——回忆鲁迅片断
一段回忆……张　望（173）
忆鲁迅先生……刘　岘（175）
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于　伶（181）
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木　将（200）
景云深处是吾家……许广平（208）
——《鲁迅回忆录》补遗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许广平（213）
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沈尹默（221）
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沈尹默（224）
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周建人（233）
片断的回忆……郑　奠（236）
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俞　荻（240）
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川　岛（248）
回忆鲁迅先生……萧　红（257）

编后……编　者（293）

追忆鲁迅先生

宋 庆 龄

鲁迅和杨杏佛曾于一九一一年同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职务，但直到一九二七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两人才有机会相识。一九三二年夏杨任中央研究院秘书时，请鲁迅先生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我都被选为该同盟执行委员。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和警察监视他。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

当时林语堂是同盟的会员，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会员都将遭到暗杀。

英国文豪萧伯纳，有一次来我家午餐时，同盟的几位会员都在座。他早已受到英政府的警告，因而他在我处很少发言。当

时林语堂和他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

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嗣后，鲁迅因患肺结核而不能再出门了。苏联政府请他到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去休养，但他婉言拒绝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在会上致了悼词，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记得当时在法新社工作的胡愈之亦在场。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茅　盾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象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

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期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七六年第六期）

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

周　建　人

一九三〇年前后，我正在读一些自然辩证法的书，到鲁迅家里去时，经常把学习中的一些问题作为话题，向他请教。有时他也到我那里去。那时，我把一些讲共产主义的书放在书桌上，正巧被鲁迅看到了，他严肃地说："你怎么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呢？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就是公开向敌人说我是左派，这是很危险的。"鲁迅不仅这样嘱咐我，他自己也是十分警惕的，他有很多马列的书，从不随意乱放。在离他的住处上海大陆新村九号不远的地方，租有一间房子，开门一看，只见满屋子都是书，书架全部是用粗糙的厚木板钉成的，钉得也比较结实。鲁迅介绍说："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成了书架。"

鲁迅为什么要这样的秘密呢？因为那时的社会非常黑暗，人民根本没有一点自由。蒋介石政府坚持反人民的政策，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强化法西斯统治，每天都发生极端残酷的镇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事件。在文化战线上，他们不但利用大批反动的御用文人，制造反革命舆论，来反对无产阶级

革命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兴起，而且用“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等手段，进行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因此，要追求真理，学习马列主义，不得不冒着杀头的危险。鲁迅为了学习革命理论，珍藏这些宝贵的书籍，与反动派的特务走狗进行了异常艰巨的斗争。他经过周密的筹划，为了迷惑敌人，在上海向“内山书店”租了一间他们职员住过的房间存放马、恩、列、斯的著作，设了这个藏书处。

鲁迅在这里珍藏着大量的马、恩、列、斯的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中文版的，也有外文版的。斗争的历史使鲁迅深刻认识到，只有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才能看清阶级社会纷纭复杂的现象，剖析其实质。他联系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实际，联系与混在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斗争的实际，联系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实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边读书边思索。他读书是很认真的，有时在书上做记号、加眉批，有时夹上一张纸条，有时把一些有价值的材料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应用。在那样黑暗的社会里，鲁迅从马列著作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这些书籍使他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为他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我到藏书处去的次数不多，但每到这里一次总给我解答不少革命的理论问题，为我们当时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刻苦认真地攻读了马列的书，弄懂弄通马列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成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在革命斗争中，十分着重对现状的了解。他学习马列，就是为了运用于革命实践，指导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集团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暂时的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残酷的反

动统治，对外公开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加紧对工人、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共产党人、革命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杀戮的事。有人失望了，害怕了，退却了，有人叛变了，黑暗笼罩着全国。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样的情形下，领导革命力量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聚集力量，发展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反革命占据的城市。这一条正确路线指引着革命向前发展，革命的红旗在井冈山竖起来了。一九三〇年春，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各派军阀的大混战，这种局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革命力量又在全国发展起来了。可是，就在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量，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不愿参加艰苦的持久的革命斗争，而要毕其功于一役，幻想着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下通过举行城市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来取得革命的胜利。

鲁迅曾和我谈过，那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为了组织这一错误的斗争，亲自找鲁迅谈话，要鲁迅发表适合于他们需要的文章，为其“左”倾路线出力。

他对鲁迅说：“你是教育、文化界很有名望的人，写一篇大文章，痛骂一下国民党反动派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鲁迅深知在当时的处境中，应该怎样坚持斗争，才对发展革命力量，对革命前途有利。鲁迅是坚决反对那种“左”倾行动的。他说：“写一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在这与反革命斗争的要地，就站不住了。”

可是，那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错误主张被鲁迅抵制后，仍不甘心，还坚持说：“黄浦江里有外国船，你就上船到

外国去嘛！”这明明是为鲁迅准备了一条逃跑的路。

鲁迅气愤地说：“叫我离开这个地方，到外国去，我就写不出文章了，也就无法参加这场战斗了！”

这时，那人才无可奈何地说：“那随你的便吧！”

鲁迅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最艰难的时期，运用马列主义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他既正视反动派反革命的残酷现实，又坚信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而且十分警惕机会主义的侵袭。他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① 鲁迅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把它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正确地体现了毛主席和党的政策思想。所以，不管情况多么复杂，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排除“左”右干扰，扎扎实实地为中国革命新的胜利而斗争。他分析机会主义认识论的根源时曾经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② 他反对盲目的空喊冲冲杀杀，他在一封信中曾说：“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③ 他主张：战斗“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④ 鲁迅在上海战斗的十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完全是靠他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结果。

鲁迅清楚地看到，当时反动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单枪匹马与这社会斗，力量是太小了，少数人分散的斗也是动摇不了它的。“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

① 《三闲集》：《铲共大观》。
②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③ 鲁迅致榴花社信（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④ 鲁迅致杨霁云信（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

能动摇它什么。”① 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建立似乎想要包庇几千年的一切黑暗。鲁迅积极主张：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要注重实力。第二，战线应该不断地扩大。第三，应该培养出大批新的战士来。要团结更多的人，组织更大的队伍，有组织地顽强持久地向反动派斗，“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②

鲁迅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积极参加和领导革命人民争取自由的各种活动，以集结力量，鼓动群众。一九三〇年二月自由运动开大会，鲁迅去演说，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个组织，定名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凡到会者均作发起人。可是，这个组织立刻就遭到严重的迫害。首先由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发起，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什么“罪名”什么“理由”，其真正原因在于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他写的文章，他编辑的进步刊物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地说：“我用硬工对付，决不声明……”。鲁迅对“通缉”漠然置之，越是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最危险的时候，他越是与革命群众一道顽强地战斗。

三月二日，由鲁迅和其他五十多位作家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鲁迅在“左联”对革命文艺工作和作家提出了战斗要求，指明了战斗的方向。“左联”成立以后，中国的革命文学曾有一度蓬勃的发展，但不久就遭到了极为严重的迫害。鲁迅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通过史沫特莱寄

---

①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②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到外国去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和屠杀革命作家的暴行。据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纸报道，仅一九三〇年八月至十月三个月中，即有十四万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横遭杀害。史沫特莱怕文章发表后反动派会杀害鲁迅，便关心地问他，你的名字签在这上面是否方便，可是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拿去发表就是。"

革命的人民并没有被牢狱、机关枪和血所吓倒，没有被侦探、走狗所征服，没有被刽子手所杀绝。鲁迅和战友们继续战斗着。为保卫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又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为这同盟的执行委员。他们不但直接援助了许多在蒋介石狱中的革命者，为他们辩护，或使他们得到自由，而且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了尖锐的抨击，揭露了蒋介石特务机关任意蹂躏人权，屠杀革命人民的残暴罪行。鲁迅积极参加和领导这个组织的斗争。他的斗争是很坚决的，当时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这个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长杨杏佛，鲁迅也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有许多人劝鲁迅应当顾到自己的危险，然而他还是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杨杏佛的追悼大会。鲁迅在当日归来后，便写了《悼杨铨》（即杨杏佛）："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充分表现了鲁迅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

（原载《中国建设》一九七三年第五期）

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陈　望　道

（一）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文章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和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不久，我就开始了同鲁迅先生的交往。一九二〇年，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就曾寄赠给鲁迅先生。也就在这一年关于《新青年》杂志如何办的斗争中，鲁迅先生明确地反对了胡适等人要《新青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企图，支持把《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这时，我为《新青年》杂志去信北京约请鲁迅先生写小说。不久，鲁迅先生就寄来了一篇批判反革命复辟派的小说：《风波》。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期上；而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杂志也即正式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了。

（二）

鲁迅先生曾在许多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留有种种战绩，有过种种极可纪念的正义行动。鲁迅先生在一九二八年就曾到复旦大学和江湾实验中学作过演讲。那时，文化教育界的黑暗势力极为猖狂，不但对于“五四”以后宣传的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围剿”，就是对于“五四”以后盛行的白话文也十分仇视，企图加以消灭。当时复旦大学和江湾实验中学的进步师生为了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得到指导和支持，就由我去邀请鲁迅先生作演讲。这次演讲就是在复旦大学现在的600号大楼中举行的。关于演讲的题目和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件事在《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有记载：“……往江湾实验中学校作讲演一小时，题曰《老而不死论》。”后来，鲁迅先生在一九三〇年他翻译《毁灭》的附记里也讲到了这次讲演所发挥的意思。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给复旦和实验中学的广大师生以有力的声援和激励。

（三）

一九二九、三〇年间，我在大江书铺担任过一点编辑工作，和几个朋友商量拟定编集一套文艺理论丛书，来介绍新进的科学文艺理论。当时鲁迅先生也应约为这套丛书翻译了有关的论著。同时，还由我约请他译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著《艺术论》。鲁迅先生谦虚地说恐译不好，我就说：我们把它译出来，就是一个胜利。鲁迅先生赞同我的意见，他承担了这个翻译的责任。书

是由日文本转译的，他采取直译的方法，极其慎重、认真和精心。译本由大江书铺作为甲等书籍出版。这本书，后来竟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所查禁。当然，鲁迅先生的业绩和影响是反动派所"禁止"不了的！鲁迅先生在当时反对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论战中，翻译了不少介绍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理论著作，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他的这个不朽业绩，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四）

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鲁迅先生的最可宝贵的性格。他对于那些买办文人崇洋媚外的奴才相、"西崽相"，总是投以极大的鄙视和憎恶。我记得，有一次是曹聚仁先生请客，请了鲁迅先生；林语堂也来了。席间，林语堂夸夸其谈，得意地说到："有一次在香港，几个广东人讲广东话，象讲'国语'似的，讲得很起劲；我就同他们讲英语，就把他们吓住了……"鲁迅先生听到这里，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站起来指斥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当众出丑。当时，我，还有几个朋友，都觉得鲁迅先生对，在感情上和他共鸣的，而讨厌林语堂的那副"西崽相"。在和鲁迅先生的交往中，我实在是没有见到过他这样地对人发火。我想，这是一个伟大战士饱含民族自尊心的愤火！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于那些丧失民族尊严的洋奴买办文人的批判是鲜明尖锐，毫不容情的！

（五）

《太白》杂志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创办的。一九三四年创办这个杂志，是想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讽刺和批

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并反对林语堂之流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而主办的《论语》和《人间世》鼓吹所谓“幽默”的小品文的。鲁迅先生是参加了《太白》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根据当时斗争的条件和需要，鲁迅先生提出在《太白》编辑委员的名单中他不要公开列名。正是遵从了先生的意见，在《太白》杂志刊登的编辑委员的名单中也就没有公开列出他的名字。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减少他对于《太白》杂志的关心和支持，《太白》杂志有关重要事宜的讨论决定都同他商量过。《太白》杂志的这个名称，就是经我和鲁迅先生讨论决定的。记得当时似乎曾拟了几个名称。鲁迅先生说：“我赞成用‘太白’。”取名“太白”，含义有三方面：

一是，根据当时我们提倡“大众语”的动议，认为对于当时已经有脱离群众语言倾向的“白话”必须进一步加以改革，使文学语言更加接近民众，更加有利于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太白”，也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还要白”的意思。

二是，“太白”这两个字笔画简单明了，合起来不满十画，易识易写，便于杂志的普及。

三是，可以说是当时主要的真实的含义，即“启明星”的意思。我们中国在传统上把天亮前后出现在东方天空的金星，称作“启明”，又叫“太白”。当时，正处在旧中国浓重的黑暗之中，但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战斗，我们是为着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

鲁迅先生说：“这几层意思，我都赞成，但不必对外界讲。”所以当时我们对外界也就什么都没有说明。同时，我还同鲁迅先生商定：杂志的刊头不请人题字，而就从字帖中掇取“太”、“白”两字。

战斗中，鲁迅先生指示着我们，支持着我们。他为《太白》杂志写了许多富有批判力和斗争性的杂文，他是《太白》杂志的一

位主要撰稿人。《太白》杂志共出两卷廿四期，鲁迅先生就为《太白》写了廿二篇文章；还为《太白》杂志特辑《小品文与漫画》写了两篇文章。《太白》杂志创刊号登载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鲁迅先生锋芒犀利的批判尊孔的战斗杂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他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人言可畏》、《名人和名言》等文，也都是刊登在《太白》杂志上的。当时，凡是鲁迅先生的稿件，都是排印了以后再送校的，为的是防范反动当局走狗对先生的追踪和迫害。记得，当时为了叱责那些走狗，还由周建人同志专门写了一篇科学小品《讲狗》，来含蓄地加以讽刺抨击。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进步刊物的"审查"、限制和迫害，《太白》半月刊的出版也越来越困难了。但是，越是困难，鲁迅先生却越是坚定有力地关心和支持我们，来稿更多，有时一期多至四篇，在《太白》杂志的最后一期里就有先生的《论毛笔之类》、《逃名》等三篇文字。鲁迅先生这种韧性战斗、永远进击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永远是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一九七六年九月写于上海

“电工”鲁迅

——往事漫忆之一

曹靖华

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总感到人的生命是短促的。这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即使活到一百年，也作不出什么事来。那么，在短促的生命中，如何才能更好、更多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更多更好地对党、对社会作点有用的事呢？办法之一，也许是把一天当作几天用，也就是常言说的“夜以继日”吧。太阳是拴不住的，到时候，它就落山了。那时，光天化日，顿成漫漫长夜。要工作，就得开灯。有时在灯下正工作得欲罢不能时，忽然电路断了，人又处到黑暗世界里。这时，人们多么热切盼望电工来“接线”啊！线路一通，又大放光明。这时，在黑暗中无可奈何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称心的欢呼：“啊！”光明驱除了黑暗，于是，又放手工作了。

“接线”，这是黑暗世界多么“得人心”的平凡而庄严的工作啊！

当年地下的革命“接线”工作，也不例外。鲁迅先生和S夫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夜弥天中，正是这样“接线”的好“电工”啊！长期间，他们任劳任怨，不声不响，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国民党严酷统治的刀光剑影里，替党作着革命的“接线”工作。

*　　*　　*

《鲁迅日记》及书信中，常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鲁迅日记》：

“……得陈蜕信并靖华所赠小米一囊……”

同年同月五日夜，《鲁迅书信集》：

“……黄米已收到，谢谢；陈君函约于八日上午再访我，拟与一谈。”

同年二月十日，《鲁迅书信集》：

“……×、陈二兄尚未见过，想还在途中。”

同年二月二十九日，《鲁迅书信集》：

“陈、×二兄皆已见过，陈有小说十本，嘱寄兄寓，日内当寄上，请暂存，他归后去取也。”

同年五月三日夜，《鲁迅书信集》：

“陈君款未还，但我并不需用，现在那一面却在找他了，到现在才找他，真是太迟。而且他们还把前信失去，再要一封，我只得以没法办理回复。”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鲁迅书信集》：

“如见陈君，乞转告：我只得到他的一封信；款不需用，不要放在心上。”

同年七月十七日，《鲁迅日记》：

“上午得靖华信。得陈蜕信并还泉五十。”

同年八月二十七日，《鲁迅书信集》：

“陈君款早收到。”

……

这类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的话，究竟指什么呢？

盖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施虐，言语道断”的严酷时代，通信可不那么简单了。提笔之前，首先要“设防”，也就是鲁迅先生一再对革命青年所劝告的，不要“赤膊上阵”，而务必采取“壕堑战”。否则，革命工作尚未着手，自己的脑袋已经丢了……

多年来，相识的和不相识的，研究鲁迅先生著作，遇到这些地方，如置身五里雾中，困惑不知所措。消除这些困惑，让读者认识鲁迅先生和S夫人，当年不顾敌人血淋淋的屠刀，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事业，这精神，我们应该永远奉为楷模的。

*　　*　　*

“一二·九”风暴中，我在北平（当年的北京）几个大学教书。其中之一，是东北大学。提起东北大学，不禁想起当时最风行的一首革命歌曲，也是当年东北大学同学最爱唱的一首歌曲。有时唱得悲从中来，互相抱头痛哭，悲愤难抑。现在姑且引几句吧：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当年的东北大学，就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北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青年，收容起来，给以受教育的场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血的现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毅然走上抗日、反蒋（反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卖国投降的法西斯政策）、救亡的道路。

东北大学，是当年北平学生运动中反蒋、抗日、救亡的堡垒。北平之大，党所领导的旧学联，在任何学校都不能立足，可是它却公开设在东北大学。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妄图拔除这个革命据点，却屡被学生击退。当时，北平还有一个与旧学联对立的“新学联”，是国民党的御用工具，由国民党的一个不学无术的打手操纵，专事破坏革命学生运动，可是受其欺骗、利用的人，为数极少……

上边所引鲁迅书信及日记中的陈蜕，就是“一二·九”风暴中，东北大学同学中最活跃的同学之一。

他本名邹素寒，当时在西直门内东北大学边政系挂名，是地下党员。他平时忙于党的工作，极少上课。当时地下党派他到上海执行一项任务，临时用了陈蜕这名字。

解放后，他又改名鲁风。我问他为什么又用这名字？他说：“山东不是简称‘鲁’吗，抗战期间，我在山东打游击，为纪念这段生活，故改用这名；其次，‘一二·九’风暴中，我到上海请鲁迅先生帮忙替党办点事情，鲁迅先生对我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切，使我深受感动。为了仰慕他、感念他这无比崇高的革命风格，故称‘鲁风’，也就是说，以鲁迅先生的风格为典范，向他学习吧。”

素寒是当年和我来往最多的一位同学，一有空就到家畅叙，如同家人，毫无拘束。

有一天，他匆匆忙忙到我家里，刚坐定，就郑重其事地问道：

“老师，上海你有没有政治上最可靠的熟人？”

话未落定，我就了然他的来意。便答道：

“政治上最可靠的莫如鲁迅先生了。”

“那么，你能不能把我介绍给他，请他帮点忙？”

“当然可以……”

我当场写了一个简单的字条交给他，并告诉找鲁迅先生的详细手续。

他带着字条走了。我即刻给鲁迅先生发了一封信，通知他，将有人去找他，请他帮忙。

素寒带着党的信件，到了上海，把信件交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交给S夫人。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鲁迅日记》载：“得陈蜕信并靖华所赠小米一囊。”这就是说他已到上海，事先未约定见面时间，只得留一封信，约时间见面的。

同年一月五日夜，鲁迅先生来函：“陈君函约于八日上午再访我，拟与一谈。”

鲁迅先生把信代转了。素寒住到旅馆等回信，没等着，就暂回北京了。后来，第二次再去取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夜，鲁迅先生来信说：“那一面却在找他了，到现在才找他，真是太迟……”这里说的“那一面”就是指上海地下党组织。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所称道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

家。”他一贯本着“甘为孺子牛”的满腔革命热情，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那样异乎寻常的恳挚，以及无微不至的关切，使素寒感动至极，敬佩无已，使他后来连名字都改用“鲁风”，可见其铭感之深。

鲁迅先生不仅把党所托之事，耐心、细致、周详地一一妥办，并且还嘱广平同志亲往客栈探望，送他一批当年购不到的半公开或不公开印行的革命书籍，须知这不是一般读物啊，这是革命的播种机。这就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鲁迅先生来信所说的“陈有小说十本，嘱寄兄寓，日内当寄上，请暂存，他归后去取也。”素寒当时考虑到这些在国民党特务眼中，视为比“恶魔还可怕”的革命书籍，在路上不但要被检查没收，而且也定会影响到安全，所以才托鲁迅先生邮寄。

鲁迅先生不但送他一批革命“火种”，而且关心到一个“流亡”学生的生活，还送他五十元大洋。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所谓五十元大洋啊！这是鲁迅先生在暗无天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窘况中，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稿费，是他从拮据生活中“挤”出来的生活必需费啊！要知道，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作家实行杀人不见血的所谓“经济封锁”时期最严重、最艰险的关头啊！

大家都晓得，自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国民党特务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杀害以后，国内外掀起了怒斥国民党暴行的浪潮，把他们用手枪才维持的纸糊的骗人的“民主”招牌撕得粉碎。这对国民党暴政统治是极大的不利。迫不得已，把手枪政策换为“经济封锁”政策，就是说，严令各报刊及出版单位，禁止刊载及出版左翼作家的文章和书籍，以根绝作家稿费来源，使作家困死、冻死、饿死。

当年左翼作家，以在国民党机关供职为奇耻大辱，故生活来

源，全仗稿费。“经济封锁”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左翼作家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当时我得知鲁迅先生送钱之事，深感不安，同素寒计议，这钱应早日归还。可是，鲁迅先生在信中却一再说：“款不需用，不要放在心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鲁迅日记》：

“上午得靖华信。得陈蜕信并还泉五十。”（“泉”，是古时钱币的称呼，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常用此称。）

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信：“陈君款早收到”，即指还款一事。

*　　*　　*

几十年过去了。鲁迅先生和S夫人在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不避艰险，毅然从事平凡而伟大的革命“接线”工作的光辉形象，至今深印在脑际。“线”接通了，革命工作得以正常进行了……

鲁迅先生有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鲁迅先生和S夫人，长期间，就是在敌人的荒淫无耻的暗无天日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事庄严的革命工作的。

一九七七年三月

党最亲密的战友

——回忆鲁迅先生

邹鲁风

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正是“一二·九”抗日救亡的风暴迅速地扩展到全国的时候，北平学联决定派我到上海去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但上海对于我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唯恐在初到那里，当工作关系还没有接上的情况下发生什么意外，遭遇到敌人的罗网。于是我去找曹靖华先生商量：请他介绍一位熟悉上海情况的可靠的朋友，在必要时给我一些指导和帮助。曹靖华先生在略一沉思之后就说：

“把你介绍给鲁迅先生，这是再可靠不过的，一切他都会帮助你。”

这使我感到意外的高兴。不仅仅是由于象曹靖华先生所说，“这是再可靠不过的”，而还在于鲁迅先生是我长期来所熟悉和崇敬的人，我为可以见到他而感到更大的高兴。当我起身向曹靖华先生告辞的时候，他却要我稍等一下，他说：

"给鲁迅先生带点小米去——鲁迅先生是很喜欢用小米煮粥吃的，这东西在上海不容易买到。"说着他走进厨房，提出了半面袋小米交给了我。曹靖华先生对于鲁迅先生生活上这种细微的关心很使我感动。几斤小米当然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正是这样却越见出他们间的超乎世俗人情的真挚而深厚的友谊。以后我才知道，鲁迅先生对于曹靖华先生的关心也正是这么细微备至。

到上海后，我就按照曹靖华先生的指示，到内山书店去访问鲁迅先生。因为怕在路上遇到检查的麻烦，曹靖华先生没有让我亲自携带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件，信是由邮局寄出的。我手里提着半袋小米，向一位青年店员说，我是从北平来的，想找鲁迅先生，请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的地址。那青年打量一下我的样子，大概是不怎么放心，于是说："不知道。"这回答使我不免有点窘，但我了解，他这是为了鲁迅先生的安全而应该持有的警惕。我只好退一步地向他说："那么我留下几个字，还有这半袋小米，请你一并转交给鲁迅先生可以吗？"他再一次打量一遍我的周身，又用眼扫了扫室内的别人，然后才点头说："好吧。"我匆匆写了张字条，就向那位青年店员告别了。心里微微有些失望但又怀着希望。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再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已经坐在那里和内山先生谈天了。我兴奋地走到先生的面前，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象是早已很熟的相识，鲁迅先生没有丝毫客气地就让我在他的身边坐下，同时低声地说了一句："回头到外面喝茶去。"就又继续和内山先生去谈天了。我知道他这是在警告我：这里还不是宜于谈话的地方，因为在两边的书架前已有许多看书的顾客。待喝完了内山先生倒给我们的两盅茶，鲁迅先生才向内山先生告辞，我们一起走出了书店。在横过电车道的时候，鲁迅

先生告我说：那站在书架前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装的人，就是日本领事馆的特务。

这不免使我有点为鲁迅先生担心。在鲁迅先生领我进了一家咖啡馆，坐下之后，我就问鲁迅先生，他这么公开地走动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而我这样贸然地来访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鲁迅先生笑了，他说："没有什么。看情形，他们（指国民党）目前似乎还不想下手，他们的吵吵嚷嚷，目的是想吓得我不敢说，不敢动；真正危险倒在他们不声不响的时候——蒋介石这东西就是个流氓。"这最后的一句话鲁迅先生是用极大的轻蔑和激忿说的，虽然声音并不高，但却显得特别鲜明而响亮：仿佛是漫画家的一笔，就勾出了一个神似的肖像。

我想，鲁迅先生的估计是正确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把鲁迅先生看作眼中钉，在千方百计地加以迫害，但鲁迅先生在人民群众中的长久而广泛的影响以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使得希特勒式的流氓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谈话继续下去，鲁迅先生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极大的关心，他问我北平学生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我向他详细地讲了两次示威的准备、街头上群众和军警的搏斗以及当前运动的趋势。在追述到"一二·一六"的傍晚一部分同学被大批军警围困，而许多群众却自动地给同学们送来开水和馒头的时候，自己不禁流下了几滴悲愤的眼泪。仿佛象幼年时代在外边受了强暴的欺侮，回到家里向父母诉苦时的感情。

鲁迅先生沉默地看着我，没有表示什么安慰，也没有说什么教训，只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吸纸烟。我想：他也许是回忆到"三·一八"的惨剧而又一度感到极大的愤怒吧。从他那无言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种异常炽烈的同情和比语言更为有力的安慰和鼓励。

大概鲁迅先生有意识地想转变一下我的过于激动的感情，他开始把话题引到学习方面。他问我俄文学习得怎样，是不是可以看书了。我说：还差得很远，看书须化费大部时间去查字典。鲁迅先生爽朗地笑了，他说：这是必然的；在学习的过程肯于常常翻字典已经是很好了。接着他又告诉我：他正在译《死魂灵》，有时也感到很吃力，也常常要去翻字典的。从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鲁迅先生对我的诚恳的教诲，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工作的辛苦。但接着我也感到非常的惭愧：当鲁迅先生问我："曹靖华先生不是正在给你们讲苏联小说《远方》吗？"我竟瞠目不能回答。在"一二·九"的前后我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不曾上课了，因此也就丝毫不知道曹靖华先生在给我们讲授的《远方》。鲁迅先生似乎马上也就看出了我的迟疑，他说："这篇东西已经翻译了出来，不久就可以出版的。"

这一次和鲁迅先生的谈话时间很长，差不多有两个小时，这中间带来的纸烟吃完了，鲁迅先生曾走出去又买了一包。虽然和鲁迅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丝毫未感到有什么拘束或顾忌，我好象面对一个慈爱、热情的长者，自由地谈着家常。鲁迅先生也没有象他在一篇作品里所说的那样：和一个初次见面的青年常常是他谈得很少；相反地，他这天是谈得很多，而且是谈得那么坦率。这次谈话是怎样结束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还记得，他劝我安心地在上海住下去，他告诉我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但又教我各处跑跑玩玩，不要一个人闷在旅馆里。因我告诉他，我的工作需要等另一个同学到来才能开始，已经等了三、四天还不见来，我开始有些着急了。他诚恳地说：有什么事情尽管去找他——办法呢，留一张字条在内山书店。

这一次，我在上海停留了将近半月，恐怕影响鲁迅先生的工作，有五、六天的时间没有去看他，但鲁迅先生却要许广平先生

来看我了，看我所等待的同学是否已经到来，同时带来了几十块钱，要我一定收下，因为鲁迅先生想到我所住的那个旅馆是很贵的，而为了等人又不能移动，恐怕我自己带来的钱快用完了。这几十块钱我终于收下了，直到我回到北平以后才托曹靖华先生寄还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于青年的关心是真诚动人的，但正是这样，我没有向鲁迅先生说过感谢的话，我总觉得向他说“感谢”两个字是不恰当的。

我回到北平后不久，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同志要我把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鲁迅先生那里，请他转交给党中央。信是密写的，表面上是几张空白的信纸装在一个空白的信封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仍然拆开了手提皮箱的里层，把它糊在里面了。我想这封信一定与当前的运动有关，我是在担负着一次重要的交通，我应该用生命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关于这封信，直到去年和一位同志谈起才知道是北方局写给中央的报告。因为当时北方局和中央失掉了联系，所以才请鲁迅先生设法转交。）

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见到了鲁迅先生。依旧是在内山书店小坐之后又到了那个熟悉的咖啡馆。这时虽然静悄悄地没有别的客人，我还是小心地问了鲁迅先生我们在这里谈话是不是安全，等到鲁迅先生答复说：没有什么，我才说明这次来是带有一封重要的信，请先生转交给党中央。鲁迅先生马上说：“可以的。”于是我从衣袋里拿出信交给了鲁迅先生，他打开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包袱，把信放在一本书的上面又包了起来。

这一次我们没有谈得很久，因为这一封信是应该尽快地放到最安全的地方的。

过几天我去向鲁迅先生问回信，鲁迅先生说：信是转了过去，但回信可还是没有。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疏忽：来时竟没有

问清楚，是否一定要在这里等回信，而交给我信的同志也没有把这一点向我交代。于是，我请鲁迅先生追问一下：是不是有回信和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有回信。鲁迅先生说：这不大方便。看来鲁迅先生当时转递这样一封信也是有着很大困难的。

我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苏联版画正在上海展出。我去参观的那天，遇上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我们在同一面墙壁下相向地走近，这使我颇为踌躇起来：在这样的场合，我能够和鲁迅先生说话吗？但很快也就想到了回答：看鲁迅先生的吧，如果不妨事的话，他会先向我打招呼的。几分钟后，果然也就证明了我的想法不错：我们走得很近了，鲁迅先生迅速地接受了我的注目礼，就转向着墙上的版画了，我们当作互相不识地擦肩而过。我知道这里还不是我们可以自由说话的世界。

没有想到，这一次就是我和鲁迅先生的最后一面，过了几个月鲁迅先生就在这个不能自由说话的世界里和我们永别了！

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是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当时，我们几十个青年正搭上停在北平西车站的军用货车，等待开往西安。当这消息在我们中间传遍时，火车也就开动了。大家挤在一个车厢里举行了临时的追悼会。几只口琴奏起了哀乐，大家不禁都热泪盈眶，缓缓地低下了头，震荡的车响声也压不过哭泣的声音。但随着也就有人用鲁迅先生的名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来抹去了大家的眼泪，悲泣变成了壮烈的救亡歌声，随着疾驰的火车飘散在广阔的原野。

我们到了西安，那里正在准备大规模的追悼。我特地走到城郊十里外的花圃里，选购了鲜花，并急忙赶制了花圈。我想：鲁迅先生是非常爱好艺术的，纸扎铺里的花圈他一定不会喜欢，甚至感到不快。但自己制成的花圈，手艺也实在不大高明，如果

鲁迅先生真的看见，也一定会要笑我的。但又想：这些自然的花朵，总比纸扎的花圈要自然生动得多，于是我好似对于鲁迅先生略尽了一点忠诚，又稍稍感到安心了。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的二十周年。但鲁迅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是永生的，鲁迅先生的精神将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越来越大地发着灿烂的光辉。

中国青年的导师，我们党的最亲密的战友，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写于一九五六年

（原载《中国青年》一九五六年第二十期）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徐　彬　如

一、鲁迅来中山大学前的背景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广东高等师范，后改称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演说，就是在广东大学钟楼礼堂做的。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北上，次年三月病逝北京。一九二六年秋，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广大原来的校长邹鲁（邹海滨，广东大埔人），是孙中山的秘书，后来参加了西山会议派。一九二五年秋季开学时，学生把邹鲁赶走了。当时校内两派斗争很激烈。左派学生组织叫新学生社，郭瘦真当社长，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的。还有国民党领导的学生组织叫民权社，头头是毕磊和刘范。最初右派势力大，后来我们做了分化工作，一九二五年八月间把毕磊争取了过来（他在二五年初思想就已经有了转变）。他随即参加了共青团，年底入了党。民权社被分化后，其中右派为后来成立孙文主义学会的基础。新学生社在斗争中发展很快，逐渐占了上风。

在邹鲁当校长时，广大文学院一直是被广东的旧文人把持着，到一九二五年秋开学前，学生要求文学院改组，聘请郭沫若当院长。这时中大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由褚民谊（先是医学院院长）当主席。在此期间，学校里的斗争还很激烈。毕磊被争取过来后，民权社瓦解了，但在文学院的教授、讲师中，右派力量仍大，他们反对郭沫若当院长。由于左派学生的积极斗争，代理校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不敢不支持，郭沫若还是当了文学院院长，创造社的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也来了。医学院、农学院也来了不少左派教授。

郭沫若来后，文学院进行了大整顿，腐败的老文人都给清理了出去。新学生社这时已发展到近千人，学生运动大发展。文、理、法、农、医各学院都成立了党的分支部。整个广东的形势很好，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大都是共产党人掌握工作，左派势力很大。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间，中大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戴季陶，副委员长是顾孟余，朱家骅还是个委员。可是戴季陶在上海，一直没有到校（由褚民谊临时代理其职务）。因当时中大我党势力大，戴季陶不同我们接头，不得我们允许，是进不了中大的。暑假前后，戴季陶在上海与陈独秀见面。这时正是戴季陶写了《孙文主义哲学基础》一书，我们和他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时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很注意对敌思想斗争。陈独秀在理论斗争上退让，而陈延年则很坚决。中大总支书记原是邱启勋，一九二六年初，他突然消极（次年三月登报叛党），陈延年和穆青（当时的广东区委组织部长）便决定让我当中大总支书记。这是在“三·二〇事件”（即“中山舰事件”）以前的事。以后陈延年就直接抓中大的工作，抓得很紧。陈独秀与戴季陶在上海见面后，妥协退让，错误地通知广东区委说：戴到广东后可以和他谈判、提

条件，让他进中大当校长。

右派在广大被打下去之后，毕磊当了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学委会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夏秋成立的，和军委会、工委会一样，也是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负责管理广东的文化教育工作、青年团工作，也管黄埔军校的青年工作。学委会书记是恽代英，萧楚女和我都是委员。邓中夏也参加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这时郭沫若已由恽代英向党建议，决定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作宣传工作。郭去后，文学院院长就暂时空缺了。

广东区委接到陈独秀的通知后，陈延年便部署学委会去和戴季陶谈判，由恽代英、邓中夏、毕磊出面。陈独秀在上海决定推荐施存统(施复亮)当中大的秘书长。此人思想右倾，陈延年对他印象很坏，几次对他提出严厉的批评。后来由陈延年建议，决定在中大成立政治训育部，训育员要共产党员，有邓中夏、恽代英、苏兆征、罗绮园等人；主任则让李济深担任，副主任甘乃光，是李提名的。政治训育部编写小册子，作为学生训练的课本，组织训练由共产党员担任。陈延年一再强调工作必须独立自主。这时鲁迅正在厦门，我们提出要请鲁迅来中大当文学院长。我们与戴季陶谈判了两、三次，提出许多条件，聘请鲁迅便是其中一条。最后一次是恽代英、邓中夏、毕磊和我四个人一同去的。其时实际上条件都已谈好，因为我是中大总支书记，让我去见见面的；恽代英、邓中夏、毕磊是代表区委。去前陈延年很严肃地告诉恽代英，要和戴季陶斗，要大骂他一顿，思想斗争是不能让步的，界限必须划清。记得戴季陶住在东山中大医学院内一座小洋楼里，他假装很诚恳的样子，向我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我听共产党的话。还说：现在国共合作，你们多多帮助国民党呀！你们要有人专做国民党工作，不然国民党要垮台啦！其实他是要我们挂名跨党，为国民党服务。恽代

英严厉批评他说：你那本书(按指《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全是胡说八道，欺骗群众！把他骂了一顿。戴接着又假惺惺地说：现在还有什么别的理论呢，只有马列主义才是理论，我是瞎胡说的。我们一起骂他是"自觉的反革命"。最后他和他的老婆把我们送出来。

这就是鲁迅来中大前的情况。

二、鲁迅来中大及我们党和他的接触

在鲁迅未来之前，施存统先到广州，向广东区委报到后转来中大当秘书长。邹鲁当校长时原有一个秘书长，因为秘书长可以决定教材，所以我们就叫他离开了。施到中大后住在大钟楼，代表校长，权力挺大。他大摆架子，好象他是陈独秀派来的，应该由区委管，不能由中大党组织领导。后来陈延年说：他应该由中大总支管，章伯钧也是这样，都是单线联系。所以他们向陈延年汇报工作，每次都由我带去。

鲁迅在厦门接到中大的聘书，决定到广州来了。我们听到消息，陈延年就立即部署工作，决定由毕磊公开和鲁迅联系，作好宣传工作，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学生，进一步开展斗争。当时广东党组织编有三个刊物：《人民周刊》，先由张太雷主编，张太雷去了武汉后，由任卓宣(即后来成为托派的叶青，当时是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接编；《少年先锋》，李求实(当时的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主编；《我们的生活》(党内刊物)，任卓宣主编。区委还决定让中大也出一个刊物，由陈延年、恽代英、李求实、任卓宣、毕磊和我一起研究如何办，取什么名称。最后由陈延年定名为《做什么?》(英文名《What to Do?》)。陈延年、李求实、毕磊还专门研究了欢迎鲁迅的工作，写什么文章。总支有个《支部生活》(由我主办)，也配合写了我党与鲁迅联系的报导。我们写文

章欢迎鲁迅，是为了团结鲁迅，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做什么?》要出刊了，应有一篇发刊词，陈延年指示应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北伐以及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来写。最初由施存统和任卓宣写了一个初稿，陈延年一看，不成。讨论时，陈延年当面批评施存统的思想和戴季陶一样；又批评任卓宣教条主义，说瞿秋白是他的老祖宗(指句式欧化)。陈延年还批评了施存统的文风，说是“老古董”，他念了稿中一句后问道：“三十一个字才一个逗号，谁看得懂?”初稿被推翻了。后来写了第二稿，毕磊看完交给我，我再送给陈延年，最后由陈延年作了较大的修改后定稿，题目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做什么?》由毕磊主编，做具体编辑工作的还有许杰。许是从上海来的党员学生，南方人，笔头还流畅。这个刊物出了三、四期就不出了，我们送给过鲁迅，《鲁迅日记》上有记载。

国民党右派也企图争取鲁迅，写欢迎鲁迅的文章。他们也搞了一个组织，叫做“左派青年团”，其后台是国民党的青年部长甘乃光。甘原是岭南大学的学生，一个投机分子，最初以左派面目出现，取得廖仲恺的信任和器重，爬了上去。廖死后，他就变了，反对我们，右派原形毕露。“左派青年团”还纠合一伙共产党的叛徒组织所谓“革命文学社”，办了一个刊物叫《这样做》，和我们的《做什么?》唱对台戏，污蔑攻击我们。“革命文学社”的头子、《这样做》的主编孔圣裔是二七年初便在报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叛徒。当时斗争很激烈。右派学生的头子是沈鸿慈，他们很野蛮，经常拿棍子打我们，我们叫他们“树的党”，几个右派女学生也很凶，被称为“树的婆”。“树的”是英语 Stick(手杖、棍子)的音译。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又译为棒喝党，所以“树的党”也是法西斯党的意思。对于“树的党”的野蛮行为，我们当然也不客气，是坚决反击的。

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来到广州后，区委除指定毕磊和他联系外，又加派了一个陈辅国，记得是我提出的。陈很不错，年轻，聪明，后来在“四·一五”大屠杀时牺牲了，死时才二十二、三岁。他们两人是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同鲁迅接触的。

鲁迅在广州时，我到他那里去过十多次，《鲁迅日记》只记了三次。一月二十四日记着我和潘考鉴（此人后来消极叛变）到访，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毕磊带我去的。鲁迅好象事先已知道我的身份，对我非常诚恳、热情。我去时他正在房子里（大钟楼）翻书，床上桌上都是书报杂志，地下堆着线装书，还有蓝花土布的行李。许广平站在他身边。鲁迅向我介绍许广平时，说是他的学生（这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我们谈了些政治形势，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毕磊和陈辅国几乎每天都和他见面。“左派青年团”的人也去找鲁迅，开头鲁迅对他们也很热情，因为都是青年，后来知道这伙人不好，对他们就冷淡了，而对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毕磊经常同鲁迅去“陆园茶室”吃茶，我有时也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每次去都见他在看书，连上茶馆也把刚收到的书报杂志带去，一边喝茶谈话，一边拆阅书刊。他的这种学习精神，实在使人感动。

鲁迅来后，学生要开欢迎大会，最初他说不必了，后来支部几次派人去和他谈，他才同意了。欢迎会是以学生会名义开的，朱家骅却跑去主持。我和毕磊还有一位“杂务公社”的校工等人都上了台。朱家骅致词时别有用心地吹捧鲁迅，说他是战士，是思想先驱者，反封建不妥协，始终和章士钊（章那时站在北洋军阀一边）斗，和高长虹斗。鲁迅听了很反感，很不满意朱家骅的吹捧。鲁迅接着讲话，说自己并不是什么战士、先驱者，如果是战士，就应该留在北京和军阀斗；还讲到因为听说广东很革命，赤化了，所以决心到广州来看看，来到后果然满街都是红标语，

但仔细一看，那些标语却是用白粉写在红布上的，“红中带白”，有点可怕！

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出面拉拢鲁迅。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官僚政客都送帖子请鲁迅吃饭，鲁迅一概拒绝。请帖送来很多，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写了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陈延年非常注意做团结鲁迅的工作，指示我们把党主办的刊物经常给鲁迅送去。我到鲁迅那里去，主要就是送刊物，记得送有《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陈延年最初对鲁迅是有分析的，他说鲁迅是“自由人”（就是知识分子的意思），但不是一般“自由人”，而是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同右派斗争。有一回，鲁迅和我谈起党的事情，问陈延年是否负责广东党的工作，还说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人很聪明。这件事我向陈延年谈了，陈延年也说鲁迅是他的父执。不久，鲁迅向毕磊表示希望与陈延年见面，陈延年听到毕磊的反映，立即同意了，后来鲁迅和陈延年就作了一次秘密会见。这事是由毕磊和陈延年的秘书任旭（此人后是托派，改名任曙）安排的，所以他们在什么地方（不知是在区委机关还是在陆园茶室）见的面，谈了些什么，我都不清楚。

鲁迅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对代表共青团和他接近的青年特别热情。我们和他接触，一次比一次感到亲切，很快建立了感情。他对我们送去的刊物很重视，常拿我们的《做什么?》同反动分子的《这样做》对比，对各种青年进行分析，很快就看出所谓“左派青年团”是什么货色，他们鼓吹的“革命文学”是什么东西。当时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武汉早已打下，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加紧进行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到处制造事端，广东的右派也很嚣张。有一次我们开会，“左派青年团”来挑衅捣乱，双方

争了起来，他们竟把礼堂周围的小树都拔出来打我们。鲁迅看见非常气愤。鲁迅对我们的感情是很真挚的。由于毕磊不断向他介绍党内情况，他对我们党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毕磊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牺牲后，鲁迅感到异常悲痛，后来写了《怎么写(夜记之一)》来纪念毕磊。这充分表达了鲁迅对我们党的感情。

三、“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广州发生了“四·一五”血腥大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这一切，鲁迅都亲眼看到，感到极大愤慨。当时，中大师生先后也有三百多人被捕。鲁迅激于义愤，不顾个人安危，于“四·一五”当天下午，冒雨从白云楼寓所赶赴中大，召开各主任紧急会议，商量营救被捕学生。会议要求学校当局立即释放被捕者，并阻止反动军警搜查教授宿舍。营救无效，鲁迅愤而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向反动派表示强烈抗议。

反动派要搞政变，我们是知道的，但准备不足，事前只通知少数负责同志转移驻地。当时萧楚女因病住在东山医院，毕磊在中大宿舍，都没有搬家，结果都被捕牺牲了。

“四·一五”那天，我也还在中大，我原住在二楼学生宿舍，后来为了避免敌人搜查，搬到三楼教授宿舍许德珩教授房里去(许当时去了武汉)。原和我在二楼同住的几个党员，一个夏占元，一个刚从北大调来的金某，还有一个记不起来了。夜里两点多钟，敌人包围了二楼，金某跑了出来，上楼告诉我夏占元被捕了，叫我赶快躲开。我也听到楼下右派学生头目在嗥叫抓人，立即光身跑到隔壁王若怡教授那里去。王说朱家骅认识他，知道他是

共产党员，他那里不能呆，于是把我带到另一位教授房间去。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刚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来的，和郑振铎相识，这位教授人很好，很同情我们，同意保护我。他叫我躲在帐子里，便出去把门锁上，等到外面枪声不响了，他才回来。他告诉我鲁迅召开营救会议的事，说鲁迅要朱家骅去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现在布告已贴在三楼，大概不会来搜查了，叫我安心。接着他又出去打听消息，天快亮时他带回一些传单，告诉我萧楚女、毕磊被捕了，外面正在捉我。不久他又去买点心给我吃，这时天已亮了。他说楼下已有标语说我已经被捉到，这样情况可能会好些，叫我呆着，他再到外面去探听一下。直到下午两三点钟他才回来，说大街上传说确已抓到了我，也捉到了澎湃，并说准备把我送走，要我考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商量了一阵之后，他便用棉花、绷带把我的头给包上，把他的西服给我穿上。刚好外面下雨，他又给我穿上雨衣，还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并把他仅有的六十元钱送了给我。这时已是四五点钟了，街上开始戒严。他已雇好了一辆汽车等在中大后门。我们事先商量好，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情况，我就自己走路，他上汽车。我下了楼，真的看见捉到徐文雅的传单。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比较顺利地到了柯麟（柯辉鄤，中大医科部党分支部书记）朋友的姐姐家里，和柯麟接上头，脱险了。我和鲁迅的关系也从此中断了。

陈延年和我都是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大约在二七年三月间，陈延年去武汉，让我留下来。他走前把毕磊和我找去，指示如何继续做鲁迅的工作，并总结了前一段做鲁迅工作的经验。他已经改变了过去认为鲁迅是“自由人”的看法，谈到他和鲁迅见面的情况，认为鲁迅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我找到柯麟处接上了党的关系，党决定我还是去汉口参加“五大”。等了半个多月，五月初，我坐船到了上海，见到陈延年，陈说大会已开完了，便把我留下来做军队工作。大约在五月十号以后的一天，我去四川路安慎坊和周总理、陈延年见了面。以后总理去汉口，又打电报来要我去，是陈延年通知我的。六月二十六日，陈延年和我谈了话，我就离开他到汉口去。当天，陈延年就被捕了，这是因为叛徒出卖，机关被破坏了。

永不磨灭的印象

杜　力　夫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后，我跑到武汉，七月间看武汉的形势恶化，又跑到上海。我徘徊在十字街头，不知走向何方。由于经济的困难和一些糊涂幻想，我考入了“半工半读，供给生活”的劳动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易培基，其政治后台是李石曾、吴稚晖①，因之这个大学以无政府主义为旗帜来迷惑青年。由于这个大学除了从湖南逃来的一些中等学校教职员②和一两个从法国回来的蒲鲁东主义者外，没有一个大学教授。许多学生对所谓无政府主义怀疑、厌恶，并且因无机会读书、求知，很不安心，时常向学校和教员“打麻烦”。易培基一再答应学生请些教授和名人来教书、讲演，以便欺骗学生，维持他们培养党羽的基地。

十月下旬，有一天下午阳光温暖如春，大礼堂坐满了学生和

---

① 当时蒋介石“下野”，他们为之在南京“看摊子”，和其他群魔一起乱舞。——作者注。

② 显然为地主豪绅阶级分子。——作者注。

教员，人们的眼睛朝着门口或窗外，期待着鲁迅先生的莅临。二时许，易培基伴着鲁迅走进礼堂，人们立即站起来，掌声雷动。鲁迅在讲台旁坐下来后，易培基向听众开口便说："我和周先生在北京系老同事。周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不久，我们就请他来讲演并且约定以后每周担任'文学讲座'两小时。"大家鼓掌表示欢迎。鲁迅走向讲台，又一阵热烈掌声。鲁迅站在台上稍稍停顿了一下，便说："讲演近乎做八股，我是不会的。今天只能随便说说。"接着鲁迅讲了"关于知识阶级与革命的问题"①。

鲁迅讲了一些关于知识阶级跟统治者的矛盾、本身缺点、矛盾之后，说道："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现状永不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这是旧社会传下的遗物。……诸君在劳动大学一面读书，一面做工，这是新的环境，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鲁迅加强了语气说："但是社会环境仍是老样子，倘不与这旧社会奋斗，终究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指上文所谓知识阶级的痛苦——杜注）

鲁迅紧接着说道："可是现在许多青年因苦闷、痛苦而对旧社会奋斗的，都被指为共产党或准共产党，抓的抓，杀的杀……，这样就更迫着人们去参加共产党了。否则，他们徒负空名，岂不冤哉！"②

鲁迅正式在劳动大学开始讲"文学讲座"，是在11月初。首先讲的是"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道："真正革命家也是革命文学家，但现在顾不着做文艺，而现在的文艺家呢，只能喊喊、叫叫，还不能作出革命文学来。革命文学只能在革命以后出现，有了苏俄十月革命，才有无产者革命文

①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四五一页所收集的《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记录，据我的记忆，有失原意之处不少。——作者注。

② 这样一段在发表记录时就完全被删去了，以致上文不接下文。——作者注。

学。革命以前的好文学，也只是揭露社会黑暗，诉说民众苦楚，鸣鸣不平。……”

他还说道：“至于说到创作方法，是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我看还是首先写人生、为人生、为改造这人生……怎样写？是复杂的问题，说起来也简单。你有苦闷，就发牢骚；有希望，就去幻想；你痛苦了，就叫唤；看见可哭的，就写可哭的；可笑的，就写可笑的；可恨的，就写可恨的！ ……”

我以前读过些鲁迅的著作，加上听这两次讲演，更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对文学感到浓厚的兴趣。

十一月六日的午夜间，噪声把我惊醒，那是训育长李某带领着几个校警和一些反动学生荷枪持棒进入学生宿舍，大声叫道：“都不许动！ 根据情报明天共产党要暴动，现在要搜查武器，……”但那些反动家伙在居住数十人的大宿舍中只是有目的地搜查了四五个学生。我除了修铅笔刀之外，并无任何武器，他们翻来翻去最后拿走了我的文稿、诗稿和所有零碎稿件。早晨，他们把我押送到图书馆一间阅览室，我看见了张楚鹃、乔其美同学已在那里（他们也是从武汉来到上海，跟我同样情况考入这个挂着劳动招牌的大学的），我们相顾惨笑，但也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在课堂上跟反动教员辩论中和在学生会与反动学生斗争中相互认识而今天有了共同的遭遇。上午约八点多钟，易培基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报告学校发生的事件，会后把张楚鹃、乔其美押送到江湾国民党军团部，把我开除学籍，立即驱逐出校。有一个山东同学送我离校时，对我讲了上午开大会的详细情况。我怀着十分气忿和沉重的心情跑到青年会宿舍一位复旦大学同学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到闸北景云里去访鲁迅先生。一个青年妇人来开门：“找谁？”我说：“我是劳动大学学生，有要事告知周先生。”她说：“周先生刚出去不久，大概是到‘北新

书局’去了。”我立刻赶到“北新”说：“我要见鲁迅先生。”鲁迅听说有人找，便从里间走出来了。我向他表示有话要说。他说：“好，我们到外面去说。”

我跟鲁迅在福建路上，边走边说，我曾向他汇报了劳动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学校的背景与学生斗争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思想变化，着重地陈述了易培基召开大会硬说：“学校不稳定，完全因为共产党捣乱，已经查出两个共产党员，有他们的文件和某些行为为证；还有一个准共产党有文稿、诗稿与平时‘捣乱’为证。”鲁迅默默地听着，但他的阴郁的脸色越来越显出激怒的神情。我谈了后，他喃喃地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查……，信稿，诗稿……扣押，开除，驱逐……。”

我说：“劳大当局，请周先生讲课是为装璜门面的。虽然同学很欢迎，可是学校现在竟这样反动，周先生今后是否还到那里讲课？”鲁迅毅然决然说：“我不再去了。我到上海来并不想再教书的。易培基硬要我去讲课，我当时想这也好吧！但他们标榜着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也竟然作了这等事！我不再到那里讲课就是了。”

鲁迅转过脸来很关心地问我：“你打算作什么？”我说：“我本来不是共产党，他们却说我是准共产党，那末我就真的参加共产党，看他们怎么样？周先生能否为我找到参加共产党的线索？”鲁迅会心地微笑了，但回答说：“线索，我还不知道；我想你自己也许已经有了，或者你在奋斗中一定会找到的。”我那时立刻联想到张楚鹃他们，说：“我打算营救那两位被扣押的同学。但不知该怎么进行。”鲁迅说：“营救他们那是好事！可运用一些社会关系，看怎么样？我此刻所能做到的只是不再到那儿去讲课，不为他们所利用，以示不与之合作而已！”

我当时决心投入革命，又因对文学已感到浓厚的兴趣，顺便

对鲁迅说："我今后定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打算学习创作，请周先生多多指教。"而鲁迅却从实际出发地对我说："失学失业，日子长了也不是个办法。总得先弄个立足的地方，生活下去，才能战斗下去，才能有条件去创作。"

我们边说边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外滩。秋风呼呼地掠过黄浦江面，波涛汹涌，寒气有点袭人。可是我的精神振奋、充满自信，站在江岸向鲁迅告辞。鲁迅欣然说："以后有需我之处，就请来吧！"我们道了"再见"，鲁迅慢慢地走回"北新"去了。

我当晚在周耀武① 老汉处住了一宿，次日租了一个亭子间，暂住下来。每天奔波，终于通过周老汉在一个公寓找到一位山西同乡国民党军官（对现状不满），他认识江湾驻军团长。我跟他昂首阔步地走进劳动大学，找到崔华女同学② 问明张楚鹃他们牢押的所在，一直奔向那里，军官去访团长并安排我去看张楚鹃他们。我和张楚鹃互通了情况并说到我会见鲁迅先生的情况，大家都非常愉快。我观察了那里的环境，暗示他们伺机夜奔。果然他们在一个阴沉沉、黑黝黝的子夜里扣敲我的小门。我们如同火线受伤，今又重逢，高兴异常。清晨起来，张楚鹃去找党的关系。他下午回来带来一张表，介绍我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次我在"北新"阅览新书遇见鲁迅，他关心地问："那两位同学怎样？"我告诉他：我已见了那两位同学，并且他们已飞出牢笼了。鲁迅当时喜形于色连声说好，并且说："那以后你就有方向，有办法了！"我们又会心地笑了。

不久，我被派到一个店员工会作宣传工作，兴致勃勃。一九二八年一月我根据参加"广州暴动"同志所讲的真实景况和勃洛

① 山西辛亥革命遗老，彻底反对阎锡山，痛骂蒋介石。——作者注。
② 也系从武汉到上海，为张楚鹃的朋友。——作者注。

克所写《十二个》长诗的体裁，写了《血与火》的诗篇①，歌颂革命打击反革命。一个春天，我在北新书局偶尔又遇到鲁迅，顺便向他说了一些我学习作诗的情况，他那次很沉默，最后说："关于革命文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你的诗作已走出了'象牙之塔'，越过'十字街头'，方向似乎是对的。可以努力前进吧。"

我初期学习写作、踏上革命道路和以后无论在任何恶劣环境下找寻光明，坚持斗争，从思想历史根源上说，也多由于曾经受到鲁迅的启发、诱导和鼓舞。自一九二八年夏离开上海后直到鲁迅逝世再也无机会向鲁迅亲自领教，也无机会再去从事写作，我时常感到遗憾。

我和鲁迅仅仅几次接触，而所得的印象虽然时光过去了这么久，却永不会磨灭的！

（原载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

① 刊钱杏村主编的《太阳月刊》。——作者注。

读《永不磨灭的印象》

许　广　平

今天我读到《永不磨灭的印象》（见十九日本报第八版），使我又明白了一件事：

鲁迅到劳动大学讲课，确是被易培基两次三番亲自到寓恳请的。当时鲁迅初到上海，原想专事写作生活。教书的事，就不想了。不料易培基再三邀请，以“劳动”为招牌，而易与鲁迅，又经过在北京反抗黑暗统治，恢复女师大学的一段生活，这时易还没有暴露出他的劣迹给鲁迅看到，又不知他请鲁迅去是有阴谋的，就上了敌人“可欺以其方”的大当，答应每周去讲学一次了。

从虹口区到劳动大学相距较远，鲁迅怕搭车时间掌握不好，教书会有失误，令学生久候不妥，这和他的守时习惯不符合的，于是要求每周学校从江湾派车到景云里来接。易培基怕此事发生变化，赶着说：“那好办，到时派我的车子来接好了”，就这样算是说妥了。

鲁迅到劳动大学讲课，每次我都跟着去听讲的，目的是得便

领教一些。记得曾经去过两次：头一次是用易培基的专车来接的；第二次也来了，但稍为迟了些，令鲁迅好焦急地等待了一番；到第三周，车子干脆不来了，易培基也一直没向鲁迅查问一下为什么不来，鲁迅从此也再没有到劳动大学去教书。当易培基逮捕学生时，把用完的“招牌”就这样无理地撕去，在他是无足奇怪的。这不明不白，没头没尾的事件，却还是鲁迅第一次遇到。每一提起江湾有个劳动大学，鲁迅就想起这件不愉快的经过来了。

杜力夫同志这篇文章，揭发了劳动大学在易培基手里的黑暗残害，也告诉了今天我们的青年不要忘却在反动统治下的学校生活是无时无地不处在荆棘丛中般的，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不屈不挠的张楚鹃和无数的象杜力夫同志一样的人们，亲自看到了新中国！看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事业，有他们这一批人去创造，去担当，去努力，去建树，去开花，去结果，该是多么幸福而愉快！他们显示出来的力量永远教育着人们！

写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陈赓将军谈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

我们听说过，鲁迅先生曾经想写一本关于红军的书，这是由于和陈赓将军的一次会面引起的。在那次会面时，陈赓将军为鲁迅先生讲了许多红军的战斗故事，这些事迹深深的打动了鲁迅先生。后来，不幸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没有写成。但是，这些材料鲁迅先生一直珍惜的收藏很久。在白色恐怖下，保存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这些材料经常要移动地方，但是鲁迅先生一直未舍得焚毁。听说甚至当年陈赓将军在介绍战斗情况时，随手所画的地图，鲁迅先生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幸运能读到鲁迅先生描写红军的书，但是从这件事里所体现的，先生对红军的关怀、期待、爱，是令人感动的。我们曾为此事去访问过陈赓将军。

陈赓将军在公务万分繁忙中，特别抽出时间接见了我们。我们请他谈谈和鲁迅先生那次会面的情况。陈赓将军追忆了一下，可惜时间相隔太久，很多细节和谈话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追忆了。但是一些深刻的印象，虽然经历了这样动荡的二十多年的战斗生活，陈赓将军回忆起来，仍然清清楚楚。他一边思索着一边说：

“那是在一九三二年，大约夏秋之间，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去四川，当时我的腿负伤了，不能再行军，党便让我到上海去医治。

“到上海后，我住在一个私人开设的医院里，这个医生很同情我们，他收留了我，愿意替我医治。当时我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苏区的情况，我曾给他们讲了一些我们红军在反国民党‘围剿’时的战斗故事。那些战斗的艰苦和剧烈，我们红军所表现的忠诚和勇敢，真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要是比起当代那些描写战争的作品里所表现的，不知要超过多少倍了。我们当时很希望人民能知道革命和红军所经受的这一切艰难和困苦。

“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同志，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后来他们送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我正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我到他家去谈谈。我们党也很希望鲁迅先生能把苏区的斗争反映出来，以他的才能、修养，一定可以写得好的，在政治上会起很大的宣传作用。党同意我去见鲁迅先生。”

陈赓将军谈到他还在未到中央苏区之前，曾读过鲁迅先生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曾给予他很强烈的感动，陈赓将军说：就是鲁迅先生那些早期的作品，也都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可惜后来到了苏区，国民党封锁苏区，和当时在上海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左翼文艺战线隔绝了，不过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还经常在许多干部手中传阅着。

这次在上海能有机会去见鲁迅先生，陈赓将军说他是很高兴的，他还记得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由冯雪峰陪他一起到鲁迅先生家里去。陈赓将军说：鲁迅先生那天兴致很好，特地请他的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我们在那整整谈了一

个下午，直到夜深了才离开。鲁迅先生讲话很少，只是注意的听我谈，不时的提出一些问题，我和他谈到我们反击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战斗，谈到苏区的人民生活、文化建设。我记得鲁迅先生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苏区的群众生活，他提了很多问题，例如苏区的土地改革。鲁迅先生是很熟悉农民的，他听到过去那些屈辱的、受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都伸直腰站起来战斗了，他是很兴奋的。他也问到地主怎样进行反抗，人民支援红军的情况。我告诉他，人民怎样亲自去送子弟参加红军，那些热情的参军大会，都使鲁迅先生感到特别新鲜。

陈赓将军特别提到一件事，他直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晰。当他和鲁迅先生谈到苏区某些房子，在四面都开了窗子时，鲁迅先生立刻就注意了这件事，而且很高兴。鲁迅先生说：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好了，已经知道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四面都开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了，这是一个进步。陈赓将军说：“就是因为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特殊注意，所以留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鲁迅先生当时的兴奋和愉快，直到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陈赓将军谈到从这次和鲁迅先生会见以后，对鲁迅先生了解的更多了，“鲁迅先生对革命的各个方面都是很关心的，他也很关心军事，当时在上海白色恐怖统治那样残酷的环境里，鲁迅先生不顾危险，一定要找我这样一个被国民党到处追捕的人去他家，也证明了他对红军的关心。他本来约我再去谈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从陈赓将军跟鲁迅先生这次会见里，又使我们从一个新的方面认识了鲁迅先生对革命、对我们党的关怀。

（张佳邻记录、整理）

（原载《新观察》一九五六年第二十期）

一点往事

——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

唐弢

一九三六年初，左翼各团体无形解散后，一度筹备组织中国作家协会，不久，又将这个尚在筹备的团体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根据当事人的解释，“文艺家”含义比“作家”宽，这一改，目的是要团结更多的人，让大家都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起来理由很充足，动机很纯正。

不过鲁迅先生却有另外的解释。

有一次，谈到杂志《作家》的时候，鲁迅先生认为这个名称有点自大，似乎在刊物上写稿的都是作家，容易将新起的青年作者吓跑，连读者也难免望而生畏，这样就把自己封锁起来，孤立了。所以，他倒是赞成比较笼统的名称，例如《莽原》、《奔流》之类，不着实，但也没有太大的流弊。

“不可以换一个吗？”

“不换了，不换了。”鲁迅先生连声说，“原先有人筹备作家协

会，因为这刊物，害怕读者误认是他们的机关刊，让它沾了光，听说现在改作文艺家协会了。换一个，弄得又要改名，岂不是逼人太甚吗？”

说着他笑了起来。

这是我当时听到的第二种解释。

一九三六年筹备的作家协会，中途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大家都不清楚为什么。我个人知道的有这样两种解释。不过事情是经不起推敲的。即如那第一种解释吧，中国文艺家协会于同年六月间成立，接着出版了机关刊《文学界》，并没有象当初说的那样，采取较宽的含义，将刊物命名为《文艺界》。看来，似乎又不主张为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人了。

从这点判断，加上四十年来文艺斗争和思想斗争中风风雨雨所昭示的事实，说实在话，我宁愿相信鲁迅先生的解释，并且认为那第一种解释不过是遁辞。

当两个口号论争展开的时候，文艺界还出现了两个宣言：一个是《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一个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从宣言表面考察，好象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却又代表着两种思想倾向，反映了两种论战立场。宣言也和口号一样，是当时文艺界激烈斗争的产物。

我所知道的情形是这样：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巴金、黎烈文等几个人商量后起草的，后来又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同意。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信里谈到自己半年来的言行，说是“签过一个名”，指的就是这事情。宣言的底稿拟定后，再由人分头联系，说明原委，征求同意和签名，基本上采取了协商的办法。

当时负责和我联系的，是一个刊物的编辑，却已经记不清是

谁了，总之，他告诉我：鲁迅先生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含糊，没有阶级性，已经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现在为了进一步说明对当前民族危机的态度，准备发表一个宣言。他还谈了一些“左联”内部的纠纷，特别是关于徐懋庸的事情，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则是第一次听到。

自从一九三五年上半年，鲁迅先生劝我暂时不必加入“左联”以后，我对“左联”有意回避，有时听到一些消息，虽然有几个熟人在里边工作，却从未向他们问讯，没有一次主动地和他们交谈过“左联”的事情。我避开它，但又祝愿它健康地存在和成长。那位编辑对我谈到徐懋庸的事情，因为我认识徐懋庸，他是“左联”常委会最后一任秘书，经常和我以及别的几个人一起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杂文。“左联”有什么临时任务，他也找过我。不过我是业余写作的，因为职业关系每天得上班，没有时间串门聊天，平日的接触其实并不多，听了编辑的话，不免有茫然的感觉。我十分吃惊于分歧的深刻，而且朦胧地想：这不是几个人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大局的极其严重的思想上的分歧。

那位编辑拿出随身携带的宣言来，上面已有几个人签了名。我读后，一面准备签名，一面告诉那位编辑：徐懋庸邀我参加了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大会，不知道鲁迅先生会不会有意见。编辑不假思索地说，参加成立大会的不止你一个，鲁迅先生的意见是：既然是以抗日为号召的团体，有的人可以参加，问题要看具体做的怎么样。我听了为之愕然。不是说鲁迅先生反对加入文艺家协会，还因此被戴上“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吗？为什么倒说可以参加呢？直到《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后，我才真正懂得了这道理。

至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的产生，时间却要早一点，据我记忆，大约早了一个星期左右。情况也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

言»不一样，它没有采取个别协商，而是用在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

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是六月七日下午召开的，地点在上海福州路大西洋西餐馆。到会约八九十人。的确，后来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的人，有几个也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因而同时列名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

会上宣读了章程和宣言，选出了理事。右倾迁就的倾向愈来愈鲜明了。关于章程，鲁迅先生指出："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阀"的表现，不仅在于用资历表和经济条件，摒除大批穷苦青年作者于抗日阵线之外，同时还在章程草案里，规定设立"交际科"，以商业社会自由社交的方式迁就那些经常翻版、偷税、盗印的资本家。因此，在思想实质上，这个章程既迎合了民族投降主义，又迎合了阶级投降主义，它是当时国际右倾思潮辛勤抚养起来的遗孤。

在宣读宣言的时候，有人还片面地提议把"国防文学"口号写进去，作为出席者共同努力的目标，经过一些人的抵制，未能实现。最后，主席宣布一致通过慰问在病中的高尔基的通电，难得的是，又一致通过了慰问在病中的鲁迅先生的信件。结局是圆满的。战线总算成立了，不过我同意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作不得战"的"吓成的战线"(《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想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尽管两个宣言表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这里留下的则是掩盖在文字底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是真实。

那是一九三六年五月间的事情。

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青年来找我，他是我的老乡，“左联”盟员，曾经担任过《春光》的编辑。来访的目的是约我合编一个刊物。当时两个口号论战已经展开，文艺界斗争十分激烈。据说书店的要求是：一、在当前文艺论战中，反对行帮意识，编者严守中立，不属于任何一面；二、采用稿件，编者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书店约束；三、对各方来稿一视同仁，创作与理论并重，……等等。

那时出版刊物，订立合同，书店的条件十分苛刻，我是知道的，所以对于这样那样的要求，并不感到意外。稍稍使我觉得奇怪的是：从来都是偏于经济方面的条件，现在却转向了政治，而且很具体，很实际。这是什么道理！莫非老板忽然进步起来，准备舍钞票而别图了吗？

我向老乡提出心底的疑问，他也回答不上来。大家决定再研究研究。

在工作或者生活中遇到疑难的问题，写信去请教鲁迅先生，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何况这回是办刊物，如果真的出版，少不得还要请鲁迅先生大力支持呢。我便决计抄下条件，写信给鲁迅先生，向他请教。

复信是五月二十四日收到的，鲁迅先生在信里说：

> 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
>
> 我看，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条件，还是不编干净罢。

其实，同样的思想，鲁迅先生在文章里不止一次地表达过，

我早就应该知道，毋须迟疑。不料在具体环境下竟又忘却了。我把信里的话看作是对自己思想的鞭策，立刻写信给我的那位老乡，通知他我不编，书店的条件不能接受。那位老乡也和我采取一致步调，谢绝担任编辑工作。于是，我又将这决定告诉鲁迅先生，复信很快来了，信里说：

……刊物不编甚好，省却许多麻烦。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也许就会好起来。……

信是鲁迅先生口授，由许广平同志代笔的。刚刚收到的时候，我心里很沉重：鲁迅先生正在病中，我却一再打扰，使他不能安心静养。转念之间，却又觉得这样做并不错，看来信的口气，似乎深以不编为然，为了省却今后麻烦，目前的专函请教，在鲁迅先生眼里，也许还不算是琐屑和多事吧。

不过，我对鲁迅先生所说的“麻烦”，体会不深，当时只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我们拒绝编辑的那个刊物，书店另外约人，不久便正式出版，这就是《今代文艺》——一本从篇幅到形式都相当于《作家》或《文学界》的月刊，模样很不错。从内容看，第一期是平稳的，第二期也过得去，到第三期，图穷匕见，真相终于大白了。因为就在这一期里，《今代文艺》发表了徐懋庸的《还答鲁迅先生》，强词夺理，横暴恣肆。同期又刊出其它一些讥嘲鲁迅先生的文字。自从论争开始以来，还没有一个刊物登载过态度如此不好的文章。当我读到这一期《今代文艺》的时候，回想先前的交涉——“不属于任何一面”呀，“绝对的自由”呀，“一视同仁”呀，象是一桶冷水从头顶浇灌到脚底。我不觉打了个寒噤：摸摸头皮，毛骨悚然。

直到如今，我还不明白那位书店老板玩的是什么把戏！我想

说的是，鲁迅先生是富有预见的！看来，三十年代文艺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盘根错节的阶级关系，他早已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当《现实文学》发表O. V. 笔录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时候，文艺界纷纷传说：笔录者O. V. 是胡风，文章违反了鲁迅的原意。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辟了谣，然而没有用。文艺界进一步传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O. V. 笔录的，虽然发表时没有注明。这个手段很巧妙。你辟谣吗？连辟谣的本身也是谣。

老子说得好："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真教人没有法子想。

记得八月底或者九月初，徐懋庸从家乡回到上海，写信约我面谈，我们在瑞金路（那时叫金神父路）一个冷饮店里见了面。他脸色憔悴，神情颓唐，自说以后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因为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我埋怨他不该写那样的信。他辩解说，这本来是私信，没有想到会发表。接着讲了"左联"解散的经过，两个口号论争以来内部的分歧。他说要写信公开答复鲁迅先生，我劝他不要写，鲁迅先生病很重。徐懋庸也突然提出信系胡风代笔的问题，并说O. V. 是"胡风"两字的拉丁化拼音头两个字母。我告诉他这是谣言，不要轻信。

我这样说，因为我确实看到过这封信的原稿。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于《作家》八月号。这一期稿子排齐后，刊物留出篇幅专等这篇"万言长文"。大约就是八月六日的晚上吧，编辑部在上海湖北路鸿宾楼宴客，到席的八九人。本来也邀请了鲁迅先生，但他因为病体衰弱，又刚刚赶毕那篇长文，临时中止赴宴。文章由别人带来。当捎稿的那位客人到达时，宴会已经进行了一半，大家忙着抢阅稿子，我

因此也得到先睹的方便和愉快。

原稿全文经许广平同志用钢笔誊清一过。个别字句由墨笔添加的，则是鲁迅先生的手迹，题目也为鲁迅先生所书，后来铸版印在《作家》上，文末“八月三——六日”，同样是鲁迅先生加上的。这说明，鲁迅先生不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还一丝不苟地从头到尾校读过，这篇“万言长文”是鲁迅先生病中的力作，象他自己所说的从高处投下的一道无比灿烂的光辉。

正因为这样，有人要将它和胡风的文字混为一谈。那天晚上读到的是《作家》月刊的发排本，也是现存鲁迅博物馆的初稿的誊清本。可惜现在已无法弄清它最后的下落了。

岁月如驶，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当晚一度聚首的人，仍然健在的还有好几位。对于这一件公案，弄清是非，说明真相，我想，这是大家都有责任的吧。历史是有力的见证！

一九七六年八月写于安徽黄山疗养院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核对材料后改于北京

琐　　忆

唐　　弢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意在说明舆论的力量。好话使人增光，反过来，伪造的"众口"也可以吐出污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有过一个时期，很想见见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变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而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用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一面施展叭儿狗的

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会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我在心头积聚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深沉，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

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头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彻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但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会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起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什么呢？”

“进化论吆！”鲁迅先生微笑着打趣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是不是？”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思想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

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的。”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耀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然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

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仰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好几次会心的微笑，我想，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你看，还给我加批呢。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象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代看一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留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凶，越暴露了他们的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在过去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说话时态度镇静，亲切而又从容，使听的人心情舒畅，真个有“如坐春风”的感觉。“如坐春风”，唔，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话，我大概会呼喊起来。真的，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写于鲁迅八十诞辰之时，北京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九月号）

鲁迅和韦素园

冶　秋

约在一九二五年，北京东城贡院附近一所破旧民房里，住着一群穷学生；当时有钱的学生，是住着所谓“公寓”的，那里常常“麻将”声不断，门口有带着水电灯的“包月车”，拉那些阔学生到“城南游艺园”看戏，八大胡同吃花酒，……。而一些真正用功的穷学生，大多住在学校附近的“民房”里，过着八个铜子到一二十个铜子一天的生活，韦素园就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素园住的这所小院子就是南北两排房间，在东面有两间厨房厕所之类的小灰棚。当时住北房还是身高一等的；冬天阳光照在窗纸上，照在屋里，住在南房的人看着好象身上也暖和了。而素园只能住在南房一间阴湿的小屋里，整天埋头翻译着俄国文学。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西伯利亚辽远的旅途上，一边是赤卫队，一边是白匪，战争正在进行着；“红胡子”在边境一带杀人抢东西。素园曾经这样历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失了性命，到达了所谓“赤都”，他学会了俄文，又爱上了俄国文学。——这时，他算是在北京安居下来了，苦苦地、认真地在译书。他是附

近总布胡同俄文法政学校的学生，仿佛又是这学校的教员，因为他没有当教员的“资历”，也就没有什么报酬。

就在这时吧，他认识了鲁迅先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记得常常在晚饭后，他就带着稿子，徒步向西三条走着——这是一段几乎是东城根到西城根的很远的路程。他从来没有坐过车，总是走到沙滩附近，约上同去的朋友，然后一边走一边谈着：向鲁迅先生请问译书中的困难；或者是想把一篇散文、小说的“腹稿”，向他谈出来，征求他的意见；或者是打算办个“同人”的小刊物，由此发展起来，成为一个认真介绍一些东西给读者的出版社，甚至谈到第一本书的印行，封面的设计，什么纸张，……谈着谈着，仿佛已经在惨淡经营起来的出版社的编辑室中了。也就是在这样充满希望的心情中，他们走完了这长长的路程。

当时的西三条胡同晚上几乎是没有灯光的，道路也很不平，他们摸到了二十一号，轻轻地拍着门上的铜片。女工出来开门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从北房拿着油灯站在院里等着了，然后引着他们在南房里或者“老虎尾巴”中坐下。最初还有点拘谨，越谈就越在“师、友”之间了。素园确实如鲁迅先生所说，给人的印象是：“笑影少”。但是遇见熟朋友，那种忠厚诚挚的笑容是最让人愉快的；他把鲁迅先生当作师长来尊敬，然而他们也是最好的朋友。

每当素园他们兴尽归来，一路上总是重述着刚才的谈话，说得那样津津有味，以致忘了这样长的路程和深夜。

约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季，素园搬到沙滩红楼对面新开路五号去了，同样是破旧的小南房，潮湿的砖地。鲁迅先生在《忆韦

素园君»一文里说到：

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这一间小房子，也就是新开路五号。有时候，鲁迅先生在北大下了课，夹着一个灰布书包，从红楼出来，走进对面的胡同来找素园。这年十二月，未名社招牌虽然没有挂出来，第一本书却出版了。记得就是鲁迅先生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这时已把素园隔壁的一间小房子租下来，房子里空无所有，只是一副铺板，上面铺着几张报纸，放着这新出版的书。

在想象中这部书一出版，会销售一空的；谁知却不是如此，第一，因为这是翻译的东西，当时对于译书，还不大“时行”；第二，书名很怪，大多不了解是怎么回事；第三，素园等几个人都是书生，不懂得生意经，既不会弄广告，又不了解发行的路子。记得头一两天，只卖出去了几本，于是想法子在对面红楼的广告牌上贴了广告，又委托“号房”代售，又在《国民新报》上登了广告，慢慢地才把局面打开。

鲁迅先生常常到这里来，计划着出版，而且筹措着印刷的费用。一个小小的文学出版机构，就在他的扶掖下诞生、发展起来。

记得素园在这以前曾得到鲁迅先生转托徐旭生先生的介绍，到了《国民新报》当副刊编辑，但似乎为时不久（约在一九二五年的十一、十二月间）就到开封去了。

这期间，未名社逐渐成长起来，出了书，并把《莽原》改为半月刊在未名社编辑发行（第一期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素园约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也回到北京，这时未名社似乎已搬到马神庙西老胡同一号。居然有了三间北房，而且有了柜架之类的陈设了。

《莽原》在鲁迅先生的主持下成为当时青年最爱读的刊物之一，先生的许多回忆文章象《弟兄》、《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范爱农》……等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

这年三月十八日在铁狮子胡同门前段祺瑞屠杀了大批青年，报上传说第二批通缉名单上有鲁迅。先生曾暂时出去避难，五月间才回到西三条的家中，八月就又出走厦门了。

记得鲁迅先生避难的地点之一是德国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医院后半部——一间小木板房里。那时候，素园还去看过他，回来述说着鲁迅先生还在写作。

这期间未名社的出书、校稿和《莽原》的编辑，大多是由素园负责的，鲁迅先生所说“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也就是指的这一个时期。

大约这年冬季——也正是如鲁迅先生所说：“……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素园终于在一个夜晚忽然大口吐血了，好容易请来了一个外国医生，但他宣布了他的死刑。许多的医院都拒绝接受这个又穷又是垂死的病人，费了许多交涉，才送到法国医院，居然没有死去，过了年才送到西山福寿岭肺病疗养院。在这里一直躺了六年，才死去。

鲁迅先生非常关心他的病，无论是在厦门、广州和上海，来信总是问他的病情，劝他不要忙于译著，“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并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给素园的信中说道：

……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并希　兄也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

素园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担心的那样，只要身体略好一点，他就在床上，把一本厚厚的俄文书压在胸口，一面看，一面翻译，总是不肯白白地度过时光。这样，身体也就一天一天地坏下去了。

记得素园在病中最愉快的一天，就是鲁迅先生一九二九年由上海回到北京，在五月三十日的早上到西山福寿岭去看他的时候。头一天素园就让人帮忙把一间小房子打扫得很干净，又请厨房的大师傅来，告诉他预备什么菜饭；又把自己喂着的几个小鸡，挑了两三只大的，请大师傅作。

第二天一早，鲁迅先生就来了，一直谈到下午才回去。素园几次让他吸烟，他总是忍着不吸，实在逼急了，他才跑到外面抽一支烟就回来。当天下午五时他写给许广平先生的信中述说着这次愉快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见：

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

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仿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全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素园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的晨五时半，死在当时的哈德门内同仁医院里了。朋友们把他葬在西郊万安公墓，鲁迅先生写了《忆韦素园君》的文章，同时又为他写了墓记：

韦君素园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鲁迅书。

正如鲁迅先生的回忆文中所写：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鲁迅先生对于素园生前的帮助和培植，死后的哀思，并不

是对他个人有什么偏爱，而正是说明鲁迅先生对于中国青年的热爱。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写完。时为
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前八日）

（原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北京日报》）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巴　金

二十年前一个秋天的夜里，我站在上海万国殡仪馆礼堂中鲁迅先生的灵前。半截玻璃棺盖下面现出他那清瘦的、慈和的面颜，包着铜皮的棺木的四周都是芳香沁鼻的鲜花，他仿佛酣睡在万花中间。我望着他那紧闭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想着他对青年的热爱，对人民的关怀，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的心非常激动，我不相信他会死，我甚至疑心我在做梦，我对自己说：他会活起来。

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情景，我仍然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不会死，他会活起来。的确，他怎么会死呢？二十年来，我每次想到他，我就感到他那强烈的爱，我就看到他那亲切的笑容，他给了我多少的勇气，给了我多少的温暖！他那抽着烟含笑谈话的姿态永远不会在我眼前消去。

我不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我只能说是他的读者和学生。我很早就爱读他的小说，还带着他的作品走过好些地方。可是在他最后的三四年中间我才有机会和他见面，而且我只有在他逝

世的那天到过他的家。说来奇怪，我们见面的地方大都是上海的饭馆或旅馆。那个时候临时到租界上大旅馆开一个房间，吩咐餐厅把酒菜送到楼上房间来，吃饭谈话比较方便、安全，杂志社有事情商谈，也喜欢到南京饭店或新亚酒店开房间。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先生外，还有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在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嗦，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他从《文学》杂志的内容一直谈到帮闲文人的丑态，和国民党的愚蠢而丑恶的宣传方法。自然不是他一个人谈话，关于每个题目，别的人也发表意见，不过大家高兴听他的意见。后来谈到林语堂。他说，他曾经写信给林语堂，劝林翻译点美国古典文学作品，林很不高兴，回信说等自己老了，再做这种事情。鲁迅先生觉得林写那种《论语》① 式的文章实在可惜，他诚恳地希望林搞一点比较有用的工作。他说林在信里讲等老了再搞翻译，是讽刺他。

这个晚上我不知道看见多少次他的笑容。我离开他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时间过得太快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然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平易、多么容易接近的瘦小老人。我觉得我更贴近地挨到他那颗善良的心了。以后我还在同样性质的宴会上看见他一两次：话说得少一点，但笑容还是有的，人还是那么朴素，那么亲切。只有那一对

---

① 《论语》是林语堂当时在上海编辑的所谓幽默小品的刊物。不用说林语堂并没有听鲁迅先生的忠告。他后来甘心沦为出卖《吾国与吾民》（林在美国出版的用英文写的著作）向美国资产阶级摇尾乞怜的西崽了。——作者注。

明亮的眼睛有时会射出仿佛要看透人心的光芒。

一九三四年我去日本之前，十月初文学社的几个朋友给我饯行，在南京饭店七楼定了一个房间，菜是由楼下餐厅送上来的。鲁迅先生那天也来了。他好象很高兴。他对我谈了些日本的风俗人情，也讲了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闹的笑话。我听人说过他要去日休养，问他为什么不去，他笑笑，说，“将来再说吧。”他后来对我说，到了那边，文章也得多写。我很感谢他的鼓励。饭后大家在房里闲谈，他谈起他的几个熟人被捕后的情况，好象也谈到某某同志在南京的消息，他现出很关心的样子。谈到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时候，他的眼里射出来愤怒的光。

第二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有一天黄源同志为了《译文丛书》的事情在南京饭店请客，鲁迅先生和许景宋夫人都来了。他瘦了些，可是精神很好。他因为《译文丛书》和他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就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感到高兴。那时他正在计划翻印 A· 阿庚的《死魂灵百图》，我们谈起果戈理的这部小说，我就说，听说他要写一部关于中国旧社会和旧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希望他早点动笔。他仰着头，抽了一口烟，想了想，微微笑着说：“想做的事很多，总是做不完。”他还想编写中国文学史，还想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那个时候我正计划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我对他说：“周先生，编一个集子给我吧。”他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过两天他让黄源同志通知我集子的名字和内容，说是还有三四篇文章没有动笔写，等写好就给我送来。这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短篇集《故事新编》。那时《出关》刚写成，他的身体又不大好，我预计他短期内不可能编好这个集子。哪里晓得不久书店刊登广告说是《文学丛刊》第一集十六册要在旧历年前出齐，鲁迅先生看见广告就着急起来，他对黄源同

志说，他不愿意耽误书店的出版计划，他得赶写，所以在一个月内就把几个短篇全写好，编好集子送来了。因此新写的《理水》等四篇都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几个月以后，我在为《译文》复刊举行的宴会上又见到了鲁迅先生，我向先生谈过两件事情：一是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莱尼娜》的插画：那是1914年莫斯科绥青书店两卷本《安娜·卡莱尼娜》中的插图，是三位旧俄画家M·谢格洛夫、A·莫拉沃夫和A·柯陵绘制的。孟十还有这部书，他拿给先生看过，先生有意翻印，我也劝先生早日把它们印出来，先生笑答道："试试看。"他给曹白写信也说《死魂灵百图》"已卖去五百本，倘全数售出，收回本钱，要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莱尼娜》的插画也说不定"。《死魂灵百图》的本钱是收回来了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健康已经给接连的病损害了，这些插图终于没有能编印出来；二是我想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深思》全本；当时《译文》复刊，我为复刊号翻译了两则回忆，都是从赫尔岑的回忆录英译本中选译的。我很喜欢赫尔岑的文章，我一时兴奋，就把我的这个打算对先生说了。先生平日重视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他当然高兴多一个人在这方面努力。不过他带笑说了一句："总有一百几十万字吧。"那天晚上我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就托黄源同志带了口信来，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后来他陆续写了几篇文章。听景宋先生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边，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亡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十月十七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朋友鹿地亘，十九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景宋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编成的一个集子。每次我翻看这两本小书，我就感

觉到他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颗无所不包而爱憎分明的善良的心。我的心充满了温暖，同时它也受到了鞭挞。我拿他做人的态度来衡量我自己的行为，我不能不因良心的责备而感到痛苦。

我和鲁迅先生见面并不止这几次，谈话也不止这一些。可是我当时并不曾一一地记下来，现在也没法在这里重述了。其实关于他的言行，我听见的也不少，象黄源同志和别的两三位朋友都对我讲了许多。对于敌人他从来不妥协、不宽恕，即使是和熟人谈话，倘使话不投机，他也会拂袖而去。然而对待朋友和青年他却善良、亲切、关心到了天真的程度，他纵然上当一次，也并不减少他对新的青年的信任。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个“义子”的故事，可是他仍然常常花费时间替一些不认识的青年人做种种事情，看稿，改稿，介绍稿子，甚至出钱替他们刊印作品。例如《奴隶丛书》中《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便是他出钱印的，他还为它们写了介绍性的“序言”。他这样做当然还因为这些书是进步的作品，中国的读者需要它们，而一般的书店又不敢出这样的书。《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化名狄克写文章进行攻击，甚至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鲁迅先生马上发表《三月的租界》驳斥这种别有用心的谬论，并且揭露了狄克的汉奸、特务的丑恶面目。

先生做工作，事无大小，一样地严肃对待，不论写文章译书，他选择一个字，都不肯马虎。他编印一本书，批格式，看校样，设计封面，也都非常仔细。书印好后分送朋友，连包扎也要自己动手，而且一点也不苟且。他帮助过不少的人和不少的事业，例如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的“版税”（稿费）就是送给上海世界语学会的。一九三〇年我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第二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幸福的船》（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收

了四篇鲁迅先生的译文，由学会写信给先生征求同意，先生写了回信同意将这些译文的“版税”也送给学会。先生的信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侵沪的战火中给烧毁了。又如他还帮助过好些小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几部稿子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后来书店给他送“版税”去，他总要推辞几次方肯收下。文化生活出版社答应替他印刷和经售《死魂灵百图》的时候，他还先拿出七百元的印费让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来周转。书销完，书店把垫款还给他，他要在知道书店没有困难之后才肯收下款子。他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没有特殊关系。他不过是在帮助他认为是比较好的事业的发展罢了。倘使以后他发觉他的看法错了，他会同它断绝关系，但是他不在事先提防，就象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即使上过了许多人的当，他还是充满热情地相信人。……象这一类的事情在这里是说不完的，而且也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每次看见他，我就忍不住在心里说这样的话。他从来不对人说教，不板起脸教训人，他只是关心人，他愿意拿出自己的一切来帮助人，使人进步，使人向上，使人变好。站在他面前，你觉得你接触到一个光辉的人格，他的光芒照透了你的心，你的一切个人的打算都消失了。你不能不尊敬他，不能不爱他，你不能不爱他的思想，你会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而感到幸福，你会极力把自己变好来使他高兴……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他的笑容对我永远是鼓励，也永远是鞭挞。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

一九七七年六月修改

“相濡以沫”

叶圣陶

鲁迅先生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出版之后赠我一册，附来一封信。这封信久已失掉，不能完全记得，惟有“聊印数书，以贻同气，所谓‘相濡以沫’，殊可哀也”的句子，当时看了极感动，后来一直忘不了。

《毁灭》的译本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印成，鲁迅先生赠我这新印的书，或者就在当年，或者在下一年年初。那时候看到“相濡以沫”这四个字，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抓住了当时时代的特征：相识的不相识的许许多多朋友，不正象《庄子》里所说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的鱼吗？《庄子》的作者认为这许多“处于陆”的鱼“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并不足取，要“相忘于江湖”才好，鲁迅先生却赋与“相濡以沫”积极的意义，认为吐出唾沫来沾润沾润总有好处：这是第二层。再一层是这个“相”字值得仔细体会。唾沫要大家吐，不能我吐你不吐，惟有大家吐，沾润才是可能的。这可以想见鲁迅先生对“同气”的殷切的期望和策励。

自从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直到一九三六年发表《答

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鲁迅先生用他的笔，对封建礼教，对现实政治，对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真可以说针锋相对，坚强无比，勇猛无比。在这同一段时间里，他还做了别的许多事。参加斗争的团体，应邀作演讲。选译别国人的作品。介绍新兴的文艺理论和绘画艺术。组织和接洽出版刊物。阅读别人的稿子，给别人的稿子作序跋或者校对排版的样张。还有其他。假如说这许多事全都具有对"同气""相濡以沫"的意味，该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吧。假如说"相濡以沫"和奋笔作各方面的斗争是他同等着力的毕生事业，惟其如此，所以他伟大，该不是不切实际的说法吧。

鲁迅先生逝世之后，我作一首挽诗，是旧体七言律句，末了两句是"相濡以沫沫成海，试听如潮继志词"。尽量多的人吐出唾沫来，会汇成海吧：这当然是想象。但是不仅是想象，这里头也表达了当时的实感。各界的人不经邀约，不凭通知，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我所说的实感就是从这些情况来的。从这些情况，不是可以想到那么多的人已经对鲁迅先生作出反应，各自吐出唾沫来了吗？不是已经听到那么多的唾沫汇成的海里的潮声了吗？

以上说的是四十年前，后来就不同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自从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普遍

传播之后，就不是什么“相濡”的问题了；鲁迅先生的业绩好比广大的海洋，是谁都得在这个海洋里鼓楫扬帆，向前航行的问题了。因此，如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们要相互勉励，认认真真学习鲁迅精神。

临了要简单说说鲁迅先生提到“相濡以沫”的这封信怎么失掉的。“八·一三事变”之后，我扶老携幼离开苏州，一九三八年秋季到四川乐山教书，租住的寓所在较场坝。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午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二十七架空袭乐山，投下烧夷弹，烧死四千多人，烧毁三条热闹街道，较场坝是其中之一。我全家老幼幸而从后门逃出，居然一个手指头也没烧伤。但是所有的东西全烧光，一双筷子也没剩下。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就是在这一天烧掉的。

一九七六年五月作

笑谈虎尾记犹新

冯　至

一九七四年六月，我有一次访鲁迅故居，看见鲁迅当年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靠近书桌的壁上挂着藤野先生的照片，对面壁上是集《离骚》句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回想起我在一九二六年拜谒鲁迅先生时的情景，恍如昨日，但是这中间过了将及半个世纪，祖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我写成一首绝句：

四十八年前旧事，
笑谈虎尾记犹新。
大田转眼迷阳尽，
劲草春华竞吐芬。

这里的“迷阳”（即荆棘）、“劲草”、“春华”，都是鲁迅晚年诗中用过的词汇。鲁迅用“迷阳聊饰大田荒”形容当时中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下颠沛流离、田野荆棘满目的荒凉景象；

但是鲁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信中国的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为此他写出“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充满信心的诗句。而今大地上，荆棘不断被芟除，代替的是反潮流、顶逆风的劲草与欣欣向荣的春华竞吐芬芳。鲁迅若是能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该会多么感到欣慰呵！我那首诗就是表达这种心情于万一。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从一般的课堂里，并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东西，作为精神的食粮、灵魂的药饵，则是鲁迅与封建复古派、帝国主义洋奴们战斗的小说和杂文。鲁迅的文章，在《语丝》、《莽原》等刊物上几乎每星期都有新的发表，我们争购、传诵、讨论，有时也和外地的朋友通信谈读后的感想。可是我们都还年轻，阅历浮浅，对鲁迅深刻的思想和写作时的心情，体会是很不够的。此外，则是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我第二次听这门课时，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的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

始皇，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象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过。

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敬重，随着他与北洋军阀和为其效劳的“正人君子”们的斗争的深入，与日俱增。我想去拜访他，但由于自己感到渺小，怕干扰他的工作，几次都欲行又止。只是把与几个朋友合办的文艺刊物按期送给他，有时邮寄，有时在听讲后面交，面交时也不曾说出自己的名姓。直到一九二六年四月，鲁迅发表了《野草》最后的一篇《一觉》，对我们的刊物给以很大的鼓励，我十分激动地读了这篇散文，同时也增强了访问的决心。

那时，北京笼罩在极其混沌、黑暗、恐怖的气氛中。北洋军阀段祺瑞在三月十八日大肆屠杀青年学生，又下令通缉所谓“暴徒首领”，随后谣诼纷纭，流传通缉人数竟达五十名之多，其中也有鲁迅。在四月底，鲁迅曾在法国医院避难。现在从《鲁迅日记》中知道，在四月三十日夜里他曾回家一次，五月一日的晚间又去医院。也正是五月一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共办刊物的朋友访问了鲁迅先生，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鲁迅在外避难，而只是这一天在家里。我们走到鲁迅先生门前，女仆把门打开，看见我们的面孔生疏，有些犹疑不定，她不说在家，也不说不在家，经过我们恳求，才进去通报。但鲁迅先生对我们热情接待，丝毫没有流露

出在避难中暂时回家的神情，他跟我们谈到我们的刊物，谈到俄罗斯的小说，并问我们共同办刊物的几个朋友的情况，占去了他多半个下午的时间。他的谈话亲切而随便，后来我们再次访问时，青年人在敬重的前辈面前常有的拘束之感很快便消逝了。我们提问题，他都给以中肯的、明确的回答。我们也曾问到壁上那个西装的日本人的照片是什么人（那时他还没有写出收在《朝花夕拾》里的《藤野先生》），他便把他和这位日本医学教授的关系讲给我们听，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谈话风趣横生，并不讲述什么“大道理”，但我们从他那里回来，每次都感到有了宝贵的收获，听到了在任何一个别的地方所听不到的话。

一九二六年暑假，鲁迅已决定去厦门，我不在北京，我的几个朋友去看他，他取出一本德文译本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叫他们转送给我。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鲁迅在日本留学编译《域外小说集》时，也曾有过翻译《当代英雄》的计划。他自己没有译出，希望有年轻的人能译出。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后来有两三种中文译本，但是我却辜负了鲁迅先生的盛意，并没有翻译，只是把这本鲁迅先生的赠书一直珍藏到现在。

一九二七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鲁迅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变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现在他的著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放射出更为灿烂的光辉。

祖国的山河再造，人民的思想更新，个人的往事变得十分遥远，越远越微小，小得微不足道，惟有青年时期跟鲁迅先生的一些接触，以及从他那里得到的启示和教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逝，反而倍感亲切。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

永在的温情

——纪念鲁迅先生

郑　振　铎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 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象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我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的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 Isis 看 Dobro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

样突然的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末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的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淑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的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象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的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的深切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

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该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象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一点凭借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入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板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名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的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痠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堆在我最宝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的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的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末，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辑而得的笺纸，由

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的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二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的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祯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

“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

“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资，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三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象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象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的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沾沾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传之外，他对于古代的遗产，决不歧视，反而抱着过分的喜爱。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并不反对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气的，这在他文集里便可见。他所厌弃，所斥责的乃是只见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刚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鼓励。他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但想不到鲁迅竟这样的突然的过去了！

第三天我在万国殡仪馆门口遇见他；他的嘴唇在颤动，眼圈在红。

从万国公墓归来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经分裂。我从到达公墓时，就失去了约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声。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并没有去。他的温情永在我的心头——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写

（选自《鲁迅先生纪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初版）

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孙伏园

《晨报附刊》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正式出版的，翻开报纸，很多人不免奇怪：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

原来“附刊”这名字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那末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的字写得不错，他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所以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

过去北京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最初是由李大钊同志主编。他到北大教书，兼做图书馆馆长之后，在一九二〇年就由我主编了。

那时，我们很想从这几方面把附刊的影响扩大到全报：第一、附刊是白话的；第二、附刊是加标点的；第三、附刊是学术性的但又比较趣味化，因为那时正是“五四”运动时代，很希望学术

性、民主性的气味浓一点。

鲁迅先生对我们年轻人办报的热忱，总是极力帮助和支持。他那时写的稿，除了登在《新青年》上的以外，大都寄给晨报附刊了。有杂感、小说，也有翻译。象《阿Q正传》就是用“巴人”这个笔名在晨报附刊上连载的。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附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事情虽是从鲁迅先生的文章开始，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斗争。

京报听说我辞去了晨报附刊的职务，总编辑邵飘萍就来找我去办《京报副刊》。我觉得京报的发行数少（约三、四千份，晨报有将近一万份），社会地位也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先生却竭力主张我去京报，他说，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京报副刊就出版了。邵飘萍倒很能干，但帮忙的人不多，等于一个人办一个报，也没什么规章、制度，经济也很困难，有时连稿费都没有。但是鲁迅先生却不在意这一些，还是象支持晨报附刊一样地支持京报副刊，他发表了《咬文嚼字》（一至三）、《忽然想到》（一至十一）、《并非闲话》等，后来大都收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鲁迅先生又在京报上办了一个《莽原》周刊，登载了一些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文章。他

自己写了《导师》、《长城》、《答KS君》、《评心雕龙》等，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编辑《莽原》的目的。这个周刊一共出了三十二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以后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莽原》半月刊。

另外我们也想了一些栏目，使它更多样化一些，比如请当时学术界人士为“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这栏，开列一些书单，又约青年们写“我爱读的十部书”，也加强了学术界人士和青年之间的联系。鲁迅写了篇《青年必读书》，目的是反对当时在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反动口号的影响之下，形成的离开社会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的现象。

那时京报是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很多关于南方革命情况的报道，其他有些杂文、随感也是针对段祺瑞而发的。所以京报从各方面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销路也增加了。晨报由于那时态度的改变，不但鲁迅先生不投稿了，就连其他的人也不爱给他们写稿，一九二四年春天，换了几次编辑，以后由徐志摩主编，也仍然没有起色。

一九二五年冬天，国民党左翼的机关报《国民新报》在十二月五日出版了。其副刊叫《国民新报副刊》，分甲乙两种，甲刊是社会科学，由陈启修主编；乙刊是文学艺术，由鲁迅和张定璜主编。这个报纸在当时算是革命的最前锋，战斗性是很强的，鲁迅除了主编以外，曾发表过《这个与那个》、《“公理”的把戏》、《有趣的消息》等文章，大都是对于当时时事的攻击和讽刺，这些文章以后都收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边。

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国民党党部被封，《国民新报》也就在这年的二月十日停刊了。甲乙两种副刊共出版六十四期。

关于鲁迅和北京几个报纸副刊的情况，仅就我的记忆，谈到这里吧。

（子禾　记）

（原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北京日报》）

忆鲁迅先生和《语丝》

川　　岛

一

在当时，有人说鲁迅先生是《语丝》的主将；也有的人说，鲁迅先生和孙伏园在北京因受晨报的压迫，创办了《语丝》。——这是说鲁迅先生和《语丝》的关系是很深的。

近来也有些文学史一类的书中说道，孙伏园在辞去《晨报副刊》编辑之后，提议自办一个周刊，去邀了十六个人负责撰稿，除周氏兄弟外，尚有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冯文炳、孙福熙、顾颉刚等，定名为《语丝》；也有的书上说，因当时文学研究会思想渐渐分化，周作人、俞平伯等组织语丝社，后称语丝派。——照这说法，《语丝》和鲁迅先生象是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鲁迅先生和《语丝》的关系究竟怎样，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和〈语丝〉的始终》，登在当时上海出版的《萌芽》上；到一九三二年，就编印在《三闲集》里。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在发表之后，鲁迅先生于次年二月

二十二日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说：

……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至于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厦门兴风，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了粉也不会改的。疑古亦此类，所以较可以情投意合。

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

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这也是现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确只改了一个P字。

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该杂志大约杭州未必有买，今摘出附上）。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在这信里提及的疑古玄同、鼻公、林玉堂、绍原，都是《语丝》在创刊时十六个长期撰稿人中列名的人。

二

《语丝》创刊，比同时期在北平出版的《现代评论》和《猛进》两个周刊要早些，《语丝》第一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周刊，每星期一出版。开始只是一张八页十六开报纸的小型定期刊物，后来，过了一年多改成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起初，只是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做《语丝》的一个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并没有社址的，等次年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于《语丝》出版前，曾有一张由孙伏园写的红字白纸约莫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后来也曾经在《语丝》第三期的中缝登过，说明“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也只不过“长期撰稿”而已，这十六个人并不气类完全相同的；而且这十六个人中也有自始至终从不撰稿的人，比如李小峰，并没有在《语丝》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或译品，孙伏园自始至终也不过写了三篇，然而这两个人都与《语丝》有深厚的关系。

在《语丝》的发刊辞中，虽然第一句就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在实际上，《语丝》并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即这十六个长期撰稿者，原也没有一个什么“党”或“派”，只是这十六个人之中有几位——当然鲁迅先生是其中之一，常常在《晨报副镌》投稿，感到在孙伏园辞职之后，《晨报副镌》将是另一副面目，而我们这几个人总还是要动动笔写写文章的，就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先并没有要借此来专讲“趣味”，只是如果有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来讲，也不妨讲就是了。并且，这几个人常常

喜欢谈现实、时事，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在黑暗中叫喊几声，如果印月刊或半月刊，文章发表就不能及时，因之，决定出一个周刊，便于登载一些杂感式的文字，而不至于太过时。

十六个人长期撰稿只可以解决《语丝》稿子的问题；而经费呢，最低限度头几期的印刷费先须有把握，所以先不敢多印。可是少印呢，又因为排工的关系，成本就大，要影响售价。因之，决定第一期印两千份，报价每份本埠售铜元四枚，外埠连邮费二分，全年一元。如果第一期印出以后，卖不掉那么些，就送人，以后少印。这是鲁迅先生的主意。当时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地窖里，有一个印刷所，是为了印北京大学教学上需用的讲义而设的，也接受外活。但是门槛很精，要印东西，照例须先付印刷费若干，其余的等印好交件时付清，不能等到我们把《语丝》卖去得了钱再来付印刷费。这个，我们当然只好照办。和他提的相对的条件是：我们按时交稿、交钱，他必须要准期交货，双方都不得延期。当时的一般刊物，往往因为交稿或印刷的延误，经常有不能如期出版的现象，我们以为这是一个缺点，《语丝》想要以身作则地来纠正这类现象，于是就与印刷所订好合同：彼此一定不能误期。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意见。《语丝》虽定的是每星期一出版，但在前一个星期六就须印好送来，所以《语丝》第一期虽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但在十一月十五日已由伏园和小峰把《语丝》五份，送给鲁迅先生了。

至于《语丝》所需的印刷费，当时商定：由鲁迅先生、周作人、伏园和我，四个人来按月分担。李小峰当时没有职业，恃译书为生，就多出些劳力。可是《语丝》的一些零碎事，仅仗小峰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的，就由伏园和我随时帮忙。每星期六、星期日，工作紧张时，即使三个人一齐动手，也忙不过来。于是编辑、校对、接洽稿子、跑印刷所等事，由伏园、小峰和我三个人轮流担

任。发行工作最繁重：一张一张地叠起来，包好，写上收件人的姓名地址，贴好邮票，寄出；或者检出多少份送给书店，书摊，各院校的号房去代售；以及每期五份送给列名撰稿的人或投稿来的人；每包的份数多了，邮筒口小，塞不进去，还得送到邮政局去寄；诸如此类的，我们三个人连着忙两天，忙的上气不接下气，也还是不能做的周周到到。就是校对也如此，每期印出来以后一看，总不免有许多错误。

那时，北京东安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现在的北京剧场），每逢礼拜日上午，演一场早场电影，票价一角，意在优待学生。由于《语丝》在出版前两天——每星期六已经印好，伏园、小峰和我三人，曾于《语丝》头几期刚出版时，于星期日一早，从住处赶到真光电影院门前以及东安市场一带去兜售。三个人都穿着西装，伏园那时已经留了胡子。大家手上虽拿着报纸在兜售，但既不象兜售圣经的救世军女教士那么样沉静、安详，也没有一般卖报者连喊带跑那么样的伶俐、活泼，只是不声不响地手上托着一大叠《语丝》，装着笑嘻嘻的脸，走近去请他或她买一份，头一声招呼当然就是“喂！喂！”有人乍遇到这副神情，是要莫名其妙地吃一惊的。尤其是孙伏园，矮矮的身材，长的那么样象日本人。兜售的成绩，三个人每次至多也不过售去一二百份，几次以后也就不去了，一则因为三个人大清早坐了人力车赶去，实在得不偿失，二则因为倘若零售出去过多，就影响经常订阅的供给份数。第一期印的两千份，出乎意外地在几天之内就卖完，而订阅者尤其是外埠的，仍不断地汇款来信订阅，记得《语丝》第一期就再版了七次，共印了一万五千份。

《语丝》能有这么多的读者，是我们几个人在事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原先商定由我们几个人来分担印刷费的，只付了第一期的两千份印刷费之后，就毋须再来担负了。却也因为销路出

乎意外的增多，编辑校对等工作，可由我们三个人照旧担任，发行工作就力所未逮；加之孙伏园出任《京报副刊》编辑工作，也有他自己的事了，即由李小峰另外找人帮忙。更因为销路的增多，不但每期毋须愁印刷费的付不出，而且有了盈余。可是登在《语丝》上的文章是没有稿酬的，于是先是印了“语丝稿纸”送给写稿的人，后来是请吃饭。大抵在《语丝》出版到十多期之后，每月月底就必有一次集会，每次一桌两桌不等，长期撰稿人中撰稿的并不一定来参加，如鲁迅先生、淦女士（《语丝》中的笔名是“沅君”）等，始终未参加过；如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女士和我，几乎每次都参加的；后来如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参加；有时连有几位的夫人也一起邀请在内，情形有些象是联欢了。在席间，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谈锋最健的首推钱玄同。

到一九二六年的下半年，鲁迅先生、伏园和我，先后到厦门去，《语丝》的一切事情，就偏劳了周作人和李小峰了。可是鲁迅先生虽远在厦门、广州，还是时常给《语丝》寄稿来的，和在京时一样的关切。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语丝》在北京果然被张作霖政府封禁。在北京出版了整整三年，从一五六期以后移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先生在《我与〈语丝〉的始终》中说《语丝》在一九二六年被“张大元帅”封禁，许是记错了一年。一九二六年十月间，鲁迅先生正在厦门，一九二七年十月，先生刚由广州回到上海。《语丝》移沪后，伏园、春台、小峰虽都在上海；但是小峰办北新书局，刊行《北新》；伏园和春台另办一个嘤嘤书屋，刊行《贡献》；周作人等人，在北京也另办一个《骆驼草》。于是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语丝》的担子就推给鲁迅先生挑起来了。在鲁迅先生主编《语丝》的一年多时间当中，给了先生不少的折磨，曾

拟停刊；到了一九二八年十月间由鲁迅先生约请赵柔石来任主编，编了不到半年，柔石就交还北新书局，之后就“废刊”了！

《语丝》移沪出版由鲁迅先生主编时，我正在杭州教书，从上海寄来的《语丝》时常收不到，起初以为是发行方面的疏漏，后来方知是因为《语丝》上登了一篇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来稿，触怒了该大学出身的那时是一个国民党党棍子，在杭州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任指导委员的许绍棣，《语丝》因而被禁、被扣了。为这事，我也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问过当时也在杭州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担任差使的吕云章，她是鲁迅先生在女师大任教时的学生，据她说，《语丝》之被禁被扣，是因为“不革命”。那是一九二八年中的事。跟着，鲁迅先生就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密令通缉了，罪名是“堕落文人”，一直到鲁迅先生去世后，没有听见说过取消这个“通缉令”。“通缉”而“密令”之，鲁迅先生在生前，是随时随地可以被拿去归案的。

二

从《语丝》本身的发展上来看，《语丝》自成长到灰灭，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正是在大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以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偶然的结合，在大革命前，因为自身感受到压迫，聚在一起对黑暗势力来跳踉叫骂一场，如鲁迅先生所说：“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给我的信）因之在当时是可以起些作用的，这也就成了《语丝》的全盛时期。但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些曾经在《语丝》上跳踉叫骂过的人，看了原先的北洋军阀倒台了，以为黑暗已被我们骂退，现在已是我们的天下，不了解来代替原先的黑暗的是一种更为可怕的黑暗，就钻进去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本身便又变成了黑暗”而不自觉，写篇把文章来给《语丝》，也只能唱一

些过时的老调。独有鲁迅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坚持着斗争，和他们格格不入；于是以前的有些老伙伴们惊讶而且寒心了，也许还别有用心吧，竟有人造谣，诬鲁迅先生在上海发了疯，患了“迫害狂”。他们还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之所以写的这么成功的原因是由于鲁迅先生自身早就有“迫害狂”的底子。有一两个败类，在北平这么一说，也就传开去了！当时一群国民党的党棍新贵们，先是说鲁迅先生有“民众”，要拉他到北平下水，但是被鲁迅先生拒绝了。既不来和他们一伙干他们的所谓“革命”勾当，也没法拉拢，于是鲁迅先生在这些党棍们的眼中就成了“不革命”和“堕落”。鲁迅先生就这样地处在“迫害狂”、“不革命”、“堕落”的“围剿”中了。《语丝》呢，不仅仅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很自然地要被社会所遗弃；又因其本身历史条件的限制，局限在传统的旧人来稿必登的桎梏里，即使由鲁迅先生和柔石来主编《语丝》，仍跳不出这个历史的圈子，对旧人稿件的取舍是“无权”的，除非另起炉灶。这样，就形成了《语丝》后期的了无生气、灰色，终至于灯尽油干而灰灭。

象这样地拖到无影无踪的泯灭掉，鲁迅先生是早就料到的，所以早就以为与其这样拖下去，不如早日“停刊”的好，然而还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下地又挨了一年。

《语丝》，是鲁迅先生自始至终一直领导着的，难怪《现代评论》说鲁迅先生是《语丝》的主将。

如果《语丝》确曾和黑暗斗争过，而且有些战绩，在当时曾发生了一些影响，那末，和鲁迅先生之对《语丝》，不但运筹帷幄，一直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并且自始至终站在《语丝》的最前线，以战斗者的姿态，严肃地、不屈不挠地和黑暗作殊死的斗

争是分不开的。仅仅在《语丝》创刊后的一年中，鲁迅先生所写成的诗、小说、散文，登载在《语丝》上的就有四十三篇：诗如《野草》；小说如《高老夫子》、《离婚》；散文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论睁了眼看》等宏篇巨制，都是在这一年中起早落夜写出来的。这些诗、小说、散文，一经发表后，无论在语言形式方面或是内容方面，在当时真都是脍炙人口的，不但提高了《语丝》的社会价值，给它打下了一个基础，也为《语丝》初期创造了扩大影响的条件。

就《语丝》创刊时的十六个长期撰稿者来说，当然由其中的鲁迅先生或周作人来主持最为适当。但从一九二三年八月鲁迅先生迁出八道湾故居以后，弟兄俩就如同"参商"，因之只好由我们几个双方都相识而且比较熟的"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来居中接头，跑腿，打杂。不论是《语丝》的形式、内容，以及稿件的处理，我们都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那时，鲁迅先生每次在北大上课之后，也必来新潮社坐坐谈谈，每次来时，关于《语丝》必有所询问，也有所指示，对我们的工作经常参加些意见。比如：关于一种刊物，在创刊的第一期上应该如何显示出刊物的面貌来，第二第三第四期在稿子质量方面应该如何安排；遇到好的稿子多时，不要在一期中都挤满，把内容充实不受时间性限制的稿子，积累一些，防备在稿荒时可以拿出来应用。又叫我们仔细注意那些投来的姓名比较陌生、或者尚未成名的外稿；有哪些地方哪些人来订阅，也是鲁迅先生所最注意的。在《语丝》第二期上有胡适的一首译诗，原稿上署名"藏晖"；后来沈从文寄来的一篇小说《福生》，原稿上署名"休芸芸"；这两篇都由我们给改署了真姓名才在《语丝》上发表，这样，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凡外来稿须署真实姓名的稿例；这也是为鲁迅先生所支持的。后来，有好些人在《语丝》上登过一两篇文章之后，就用这姓名到别处如《现代

评论»之类投稿去了。

鲁迅先生对《语丝》在经济方面也有过帮助，在《语丝》第一期出版后，先生就付了十元印刷费，比商定的多付了两元，还觉得有些歉然似的。这时鲁迅先生的经济状况一点也不比别人宽裕，正是“破帽遮颜”，在严冬中还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爱国布棉袍，有时为了生火取暖须自己动手去砸煤的时候，记得有一次连手指头都砸破了。

鲁迅先生虽不参加语丝社每次在“市场中的茶楼或饭铺”中的宴会，并非和《语丝》表示疏远，我觉得当时鲁迅先生对《语丝》的事无论巨细都关心，都了若指掌的。

至于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后，大家各奔前程去了，把《语丝》的一个烂摊子交给了鲁迅先生。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既要对顽敌作斗争，也要和《语丝》的内部来作斗争，《我和〈语丝〉的始终》这篇文章，据鲁迅先生自己说是给这群本身又变成黑暗的一些人们以“还留情面的一棍”；而且，“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这正是“高高举起，轻轻打下”，表示了鲁迅先生对于他们还是爱惜，希望他们能憬然知悟，重回到战斗的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却说鲁迅先生“发了疯”。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日，北京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十六号）

回忆鲁迅先生

靳　以

恍如昨日似的，几千送葬人的沉抑而哀痛的葬歌，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我们轻轻把鲁迅先生的棺木放到墓穴中，盖上了人民送给他的“民族魂”的长旗。那时苍茫的暮色匝地，秋风四起，小鸟绕林，无树可栖；从歌声中也听出轻微的啜泣，我自己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了。我在心中不断地问着自己：“难道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么？”“不，不，——”紧接着我就自己回答着：“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的。”

二十年了，我更深刻而具体地体会到他从来也不曾离开我们，他将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鲁迅先生伟大的身影，一直在我们的面前。他肩着革命文学的大旗，领着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怠慢。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下一代，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对真理的执着和百折不挠坚韧的战斗精神，永远照耀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我是在十月十九日清早就听到先生逝世的信息，仿佛一下子被丢进冰冷的海水里，我们就急忙赶到大陆新村的住处去。在

我是第一次跨进那门限，原来是多么值得兴奋的，单单在那么一天，一切的兴奋化成更沉痛的悲伤了。我看见先生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张清癯的脸容和疲弱的身体。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再不能从那里得到慈和的目光，它们再也不能向敌人怒目而视了。当我看到那狭小的房间，当窗的书案和相距不到二尺的眠床，尤其是那张先生只有在休息的时间才躺上去的藤躺椅，对先生自奉菲薄的生活引起无比的崇敬。我想起先生的话："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先生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使我们却感到万分的不安。

当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的时候，我们是天天都去的，许多青年也象一股洪流似的不断来往，一直到举行葬仪的那一天。他们自愿地来，除开怀着悲痛的心情也需要勇气的，因为暗探特务象鬼影一样摇来晃去，说是来"保护"的马巡队挎着实弹的马枪围在我们的周遭，但那时我们都不怕，在真理和正义的面前，邪恶只能象苍蝇一样在四面嗡嗡着，先生伟大的人格，连反动派也只好束手垂头的。

我还记得在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一只大手紧紧抓住我的肩头，我回头一望，才看到是眼睛涨满了泪水的西谛，我的心中感觉到：该以鲁迅先生的精神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敌人猛攻吧。

其实我和鲁迅先生相识是很晚的，那是一九三五年我从北京到上海编辑《文学月刊》的时候。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有时是在展览会上，有时是在人不多的宴会上，有时我也偷偷跑到内山书店，好象是去买书，实在是想看先生一眼的。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先生的时候，好象是黄源把我领到他的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我怯生生地伸出手去，握着先生的手，仿佛有一股热烘烘的暖流传到我的全身，使得我的脸更红了，话更说不出来了，那时候

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可是当我鼓起勇气抬起头来望他的时候，他那慈和的，好象早就认识我的亲切的笑脸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顿时恢复了失去的勇气。尽管我不大听得懂他的话，可是他对和他走在一条大路上的青年一代的关切与挚情，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对青年的态度，我不但是身受，就是后来我和青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的时候，我也是在学习先生的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而当我和勇往直前、充满了战斗精神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年青，很愉快，也很有生气；使我感染到他们的朝气和战斗精神这一点，至今还使我充满了感激之情的。

当我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编辑的时候，鲁迅先生就曾寄过文章来。那时候我们真高兴极了，把原稿抄了一份发排；不仅是珍贵先生的手迹，也怕被"检查官"看出了笔迹而加以扣留没收。那时的《文学季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设法发表那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稿件，有的甚至已经在上海被"检查官"扣留或抽出，又在《文学季刊》上改题换名印了出来。我们那时只得在敌人的内部矛盾中做好我们的工作。可是当南京的文化特务的魔爪伸到北京来以后，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文学季刊》也只好停刊，我也只得一人走上海，另闯一条新的道路了。

但更早的说起来，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在一阵激情之下写出的第一首诗就是投给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而被刊登出来。那诗实在写得不好，而且后来认识到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就绝不再写诗了；可是那时看到自己不象样的诗句印成了铅字，由鲁迅先生过目，经过他的手的抚摸而和他的文章在一本刊物上印出来，当时的心情的昂奋是可以想象的。后来当我快离开大学的时候，鲁迅先生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出了《铁流》和《毁灭》，我就是通过一位同志的手用半价预约来的。

当我把这两本书捧在手中，我那兴奋的心情简直是说不出的。同时我也悔恨自己不该只用半价就得到这两本宝贵的书，因为那时我的经济情况还宽裕，不该占去穷苦青年半价购书的机会；同时也感觉到对不起鲁迅先生，使他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但实在说起来，那时候我也无从用另外的方法来购得这两本书。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心读者，那正是《语丝》在北京大学二院创刊的时候。后来又有《莽原》。算定了出版日期，准时到传达室前，从砖头下取出一份《语丝》或《莽原》，然后把两大枚铜元放在纸盒里。此外我也订阅京报副刊，北新书局在北京翠花街成立以后，我更是一个经常的购书者。从初版的《呐喊》，一直到后来鲁迅先生所印的书，包括先生那时的翻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我都是争先购得一本。有些文章那时说起来也不一定看得懂，可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看到《记念刘和珍君》，我不仅看懂了，而且在我小小的心上划下了深刻的血痕，给我勇气，憎恨敌人。在那里我看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文后，我还看到："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那时，在凶暴的军阀统治下的天津，时时把杀下来的人头挂在中学门前的电线杆上，吓得胆小的孩子们半夜都睡不着觉。而我，最初也是感觉到了怕的，由于读了先生的文章，后来却敢于正视。但毕竟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不是猛士，没有能更奋然前行；不过在人群之中，摇旗呐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对卖国政府，我总是不落在别人后边的。

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初看就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一直在记忆中是栩栩如生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方纬甫，九斤老太、七斤嫂不必说了，《故乡》中的闰土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仿佛看到月光下海边瓜地上拿着钢叉又跑又跳十几岁

的闰土，我仿佛也看到三十年后满脸皱纹，灰黄脸，红眼圈的叫着“老爷”的闰土。“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隔开了他们，而我，长大起来的时候，也同样地感到鲁迅先生所感受到的悲哀。人与人之间被什么看不见的铁手扯开了，连童年时珍贵的感情也飞得无影无踪了，真是惘然若失，感觉到在过去的日子中，一天一天都在失掉些什么。

但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却也写出来从挂在北京寓居的东墙上藤野先生的照片中，得到了不倦的教诲和不尽的勇气。读到最后一节，“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我就象看到鲁迅先生丢下烟头，振笔如飞，紧握着武器，向着敌人毫不容情地投去。

过去我在经常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也没有能常在壁间悬起先生的照相，但在我的心上，刻印着先生最美丽最神圣的肖像。每当我在困难的面前将要低头的时候，在个人的得失上摇摆不定的时候，在疲困万分渴想休息的时候，……不但先生严峻的脸和慈和的笑容都在督促着我，他的战斗的一生，一节一节地生动地显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昂首挺胸，决然前行，大踏步地紧踏着先生的道路前进。

当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年的时候，我的琐细的、微不足道的回忆，不过说明一点先生生前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与热爱。而我自己，也稍稍说出来直接和间接从先生那里所受到的教诲和益处。

如果鲁迅先生还健在的话，他的笑声该更爽朗，他该笑得更好。对文学青年来说是更有福的，但对残余的邪恶的人和事，他将无情地用烈火把它们烧成灰烬！

（原载《萌芽》一九五六年第八期）

有关鲁迅先生的几件旧事

魏　金　枝

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从杭州来到上海，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

我的本意是想搞写作。这样，不但能够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又能和许多搞写作的朋友朝夕相见。但我怕又不能靠写作来生活，必须仰仗朋友们的帮助。而且在那时，正有人介绍给我一个小职位，除相当清闲之外，还有相当的收入，自然还可以乘机写点作品。但这个职位相当卑下，清高的读书人不想做，激烈的革命者更不想做，我自然也有点儿不情愿。怎么办呢？我不免踌躇起来。

踌躇不能够解决问题，我就把这事告诉柔石。柔石说："问问鲁迅先生吧！"但我不敢亲自去，就请柔石去转问。

隔了一天，柔石兴匆匆地跑来告诉我："鲁迅先生说咧：'革命不能不吃饭，写文章也不能不吃饭。离开社会就无法生活，也

无法革命！就是暂时干了一阵，也不能长远的。去吧！’”

于是我就去了；但不到两个月，我又回到上海来了！

是不是那里没有写作的时间呢，不是的，除开吃饭以外，几乎全是自己的时间，但我却一个字也没有写。是不是没有写作的材料呢，也不是的，张开眼来，尽是牛鬼蛇神——怪人和怪事。我尽可以把这些写下来，揭露它们，叫它们无所隐匿。但是我受不了，我只是整天地发愁发恨，终于就两手空空地回到上海来了。

那时左联成立了，办了《萌芽》，我就帮柔石搞《萌芽》，柔石把自己的编辑费交给我，生活才算没有发生问题。

二

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内容是近乎空想的革命事件，外面的舆论却相当好。有一天，我和柔石到鲁迅先生那里去，柔石把这个消息告诉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就笑笑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多写几篇吧！”但他马上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写得实在些，也就会更好些的！”

三

不知由于什么，我们谈起了文章的题目。

鲁迅先生插嘴说：“我约略地想了一下，几乎世界上的大作家，取的题目都是随随便便的。就是说，文章的好坏，和题目的好坏，关系并不大。换句话说，越是那些写不好文章的人，题目倒往往是古里古怪的。”

（原载《中国青年》一九五六年第二十号）

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

李霁野

广大人民群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鲁迅的榜样”的教导，对于鲁迅先生的学习与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群众热烈要求多多了解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甚至对看来仿佛微小的细节也深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去年曾经有人向我提醒，未名社成立五十周年了，是否可以写点纪念文字呢？我想已经写过一点简单的记事，不必再写什么了。但是还不断有人来信问到有关未名社的情形，并有朋友劝我写点什么，最好是关于未名社的史料，我就不免想了想。

在想一想的过程中，我重新阅读鲁迅先生的日记、书信和著作，一面作为自己对先生和未名社的纪念，一面也作为自己的学习。先生的著作中所表现的战斗的一生经历，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先生生前对于未名社几个成员的批评：“疏懒一点”，“小心有余，泼辣不足”，重温

时，仍然觉得十分中肯，十分亲切。前一句就是批评我们没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后一句就是批评我们缺乏战斗精神，未能照先生所期望的，“批评社会，批评文明”，尽管我们眼前有那样一位光辉的典范。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粗略地计算一下，先生的日记中关于未名社的记事约有七百则，寄成员的书信共三百几十封，互相访问的次数也不少，虽然全体六个成员相聚只有一次，也没有留念的照相。我不免有点感慨：先生费了这样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未名社的贡献却是微小的，在社的存在期间，也有些事使先生感到很不愉快。五十年的时光飞逝了，先生逝世也将近四十年了，将文字中的记述加以组织，并把记忆中的若干事件留下一点纸上的声音，作为我自己对先生的纪念，对自己的鞭策，就个人来说，还很有意义。若是在了解鲁迅先生上，对读者也还能有点小小的帮助，那就是更可欣慰的收获与喜悦了。因为所记的事多只限于同未名社及其成员有关的范围，所以题为《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在五四运动的前夕，鲁迅先生在给新潮社一个成员的信中，就主张“偏要发议论”，并且说：“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五四运动一开始，鲁迅先生就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投入了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伟大领袖毛主席赞扬“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但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后，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及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起了显著的分化，有些早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明确地走入了无产阶级的阵营，有些人却投靠了反动的堡垒，或者埋头在故纸堆中了。

鲁迅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写的小说集《彷徨》中所表现的心情，可以从他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在《彷徨》上所题的一首诗看出：

寂寞新文苑，
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

但是鲁迅先生绝不是一个悲观绝望的人，他由徬徨而进入坚定，由失望而进入希望，由悲痛而进入愤怒，发出震动人心的狮吼——这就是集印在《坟》中的一些文章。

《未有天才之前》对当时的情况作了精确的分析，深刻地批判了胡适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提出的反动的“整理国故”的叫嚣；批判轻视翻译的议论，因为这“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危险，而这时的主要外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鲁迅先生在文章中也批判“中国要天才！”的空嚷嚷，斥责“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并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作品……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可见鲁迅先生对新生事物是何等爱护和支持。他又说：“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那些叫嚣“整理国故”，轻视翻译，戕贼嫩苗的人，“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所以鲁迅先生不仅爱护嫩苗，也珍视能使嫩苗生长成熟的泥土。

二十年代初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

压迫和侵犯，内有军阀的混战和统治，阶级斗争空前激化，民族危机异常严重。在这样危急关头，有些人妄谈中国的“精神文明”，从故纸堆中搜求“国粹”作救国经；有些人叫嚷“尊孔读经”，捧出孔孟的僵尸作护身符，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黎明的曙光即将出现，第一次大革命就要开始，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了。

鲁迅先生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见《而已集》）鲁迅先生早就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过怒吼，这时更迫切地感觉到有怒吼文学的必要了。这个怒吼文学的简要纲领，就是“批评社会，批评文明”。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起，他就是按照这个纲领办事的。

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见《两地书》）他又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

上言种种，我想大概就可以说是未名社成立的背景和远因吧。

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翻译了俄国安特列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他便把《往星中》译稿送给先生了。从《鲁迅

日记»得知，这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一九二四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去访鲁迅先生。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一定是十分严肃，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不料象先生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以后韦素园、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一九二五年夏季一天晚上，静农我们访先生谈天，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鲁迅先生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给许钦文的信说：“«未名丛刊»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

一九二五年，曹靖华因为帮助苏俄人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与鲁迅先生通信，知道成立未名社，也加入了。

所以未名社成员一共有六个人：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韦素园和曹靖华在苏俄留学一个短短时期回国，还打算继续学习俄文；台静农在汉口一个中学未终业，当时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旁听；韦丛芜和我刚从崇实中学毕业，而«往星中»是在毕业前翻译的。我们的外文基础还很差，各方面的知识也很浅薄，但是鲁迅先生用辩证唯物论的发展观点看待我们，甘心自作泥土，在一片小小的园地(未名社)里，认真负责地培育这些未必能成为好花乔木的文艺嫩苗。

鲁迅先生对于未名社成员的培养，既有言教，也有身教：言教是他的谈话、书信和文章，身教是他的一生革命的实践。当然，他所教育的范围很广，并且不限于一代人，我只就自己亲身

感受较深的谈一谈罢了。

鲁迅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首先注意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知识分子的分化虽然使鲁迅先生有短暂的寂寞徬徨之感，他同时也感到长期韧性战斗的必要，培养新的战士的必要。同五四运动对立的反动复古浪潮，实质上是外强中干的。在二十年代初的乌云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电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特别吸引着年青的一代。在这样的形势下，帝国主义走卒，反动文人胡适之流惊慌失措了。胡适声嘶力竭地叫嚷："救国必先求学"，骗取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他的罪恶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要青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开列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有古书多种。一九二五年二月，《京报副刊》征求所谓名流学者开列"青年必读书"，鲁迅先生针对着"整理国故"的反动叫嚣，在"青年必读书"表的附注中写道："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鲁迅先生同我们谈话时，多次对我们说，自己读中国古书时心情容易消沉，容易脱离现实斗争，劝我们千万注意，因为台静农那时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旁听，天天要和中国旧书接触，我也在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挂名上学，只私下读点自己愿读的书，他深怕我们上胡适之流的圈套，陷进泥潭，迷失了政治方向。但是鲁迅先生绝不是对中国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他指导静农继续研究中国文学，后来通信时，还向他说明，《品花宝鉴》的作者是陈森，《中国小说史略》误为陈森书；劝勉静农"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并说自己还颇欲研究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五年先生在信中向静农还谈到自己的《稽康集》校本。鲁迅先生教导青年少读或竟不读中国书，是针对胡适反对马克思

主义而发的，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一九二八年四月，我因为政治嫌疑被北洋军阀逮捕后，燕京大学的当权者不准我复学，一个中国文学系的前辈很愤慨，问我愿不愿留系作研究生，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这是和鲁迅先生的教导有关系的。先生觉得离开那样的大学，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惜，大概还是不愿我们"踱进研究室"，而进入社会，参加实际斗争的意思吧。

鲁迅先生同"现代评论"派陈源（即陈西滢）之流的斗争，是为"青年必读书"引起的斗争的继续。这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因为"现代评论"派的后台是北洋军阀。女师大风潮是这场斗争的序曲和组成部分。未名社几个成员往访先生时，这些事件是主要的谈话资料。从这些谈话，我们受到很大教育。

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发生后，陈源除散布流言说鲁迅先生"挑剔风潮"外，还对女师大学生进行下流的诬蔑和诽谤。这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愤慨。先生在谈话中提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晨报副刊》上，张慰慈所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我们认为在这时发表这样恶毒咒骂妇女的译文，不是偶然的。这时先生对我们谈到，在叔本华死后，在他的书籍中发现一张治疗梅毒的药方，我们觉得，陈源之流这时搬出他们的辱骂妇女的祖师爷，实在可鄙而又可笑。在《碎话》中，鲁迅先生先引叔本华在《读书和书籍》中的话："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他接着批判中国的学者文人利用"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作战场，"自己打嘴巴"。我们说，这个批判很深刻，战斗手法很高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先生微笑点点头。鲁迅先生在《有趣的消息》中只比较含蓄地说叔本华"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也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

鲁迅先生在谈到女师大风潮时，很称赞中国的妇女，这些谈话的精神，见之于文字的就是："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先生对于妇女的崇高评价，是有很大的政治社会意义的，因为妇女是顶半边天的力量，不把她们动员起来，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不会成功。

鲁迅先生批判陈源之流，绝不是出于私怨，先生同我们谈话时谈到过。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也说："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胡适说鲁迅先生所以骂陈源，因为陈源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成大本的摽窃"，是鲁迅心胸狭窄。这是胡说，其用意是既要歪曲鲁迅先生的伟大形象，又要抹杀这场斗争的重大政治社会意义。

陈源先用口头的流言，后用文字，诬蔑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摽窃"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用《致志摩》的公开信形式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静农我们读后同去访问鲁迅先生，他精神极为轻松愉快，将如何反击的要点，随笑随谈向我们说了，这就是写为文字的《不是信》。这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真是把陈源"骂得……体无完肤"，大快人心。先生的谈话和《不是信》，真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讽刺的典范。

在《不是信》之前，鲁迅先生发表了《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和先生谈话时，我们也谈到了的，特别谈到了作战斗杂文的方法和风格。先生说，作这样文章，首先要击中论敌的要害。例如陈源在《做学问的工具》里首先夸耀他和其他几个人的私人藏书，比"三十多个大学"还要多，他说，"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就以《四书》来说，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理会的。短短的一部

《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着几百几千种参考书。”学者的架势摆得多么足，口气是何等猖狂啊！先生说，点一点“《四书》，南宋以后之名”，哪里来的汉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陈源的学者的假面就被戳穿，学者的纸冠也就落地了。我们说文章结尾七色板的比喻用得好，先生说这样可以使文字生动活泼。先生确是最善用形象语言的。

鲁迅先生对陈源之流的斗争有巨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有声有色，哄动一时。先生同我们闲谈时说到，那时陈源正在和一个人“呵哥”“呵妹”地闹恋爱，他的未来的丈人看见很多骂陈源的文章，以为他不是好人，有中断他们往来之意。陈源慌了手脚，央人向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求情，周作人不仅妥协，而且投降了。但尽管陈源声明，从一九二六年起，不再管闲事，也就是不再说“闲话”了，实际是挂了降旗；徐志摩大嚷“带住”，为陈源帮腔，鲁迅先生却写了《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和《我还不能“带住”》，立刻予以回击。周作人做《失题》，竟无耻地说，对段祺瑞等再行攻击，是“打落水狗”，是“无聊”，“卑劣”；林语堂也大喊“费厄泼赖”，为陈源之流及其后台北洋军阀解围，鲁迅先生就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提出了打落水狗的名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警诫人们不要宽纵敌人，养虎遗患。这是严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央求人情就可以罢休的。陈源说鲁迅先生：“要是有人侵犯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我们就是激赏鲁迅先生这样的战斗雄姿。

陈源用极下流的流言诬蔑女性，而徐志摩吹捧陈源“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鲁迅先生在《坟·题记》的结尾说：“……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

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这双关的结语，使我们不禁想起这段“求情”佚闻而哑然失笑。我们在谈话中，也无意使用了双关语哩。

鲁迅先生的文章和谈话时常是极富风趣的，但是他憎恶油腔滑调，也不欢喜当时有些人所提倡的所谓“幽默”。记得刘半农标点《何典》出版，登广告说，此书是吴稚晖的老师，仿佛吴很吹捧《何典》吧。吴稚晖是国民党的反动政客，是反共的老手，文章倒有“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气味，一些报纸很为他的文章捧场。鲁迅先生是讽刺能手，也是真正富有幽默感的人，他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解释什么是讽刺，什么是幽默，并指出吴稚晖的文章非驴非马，既非讽刺，亦非幽默，只是小丑的“无聊的打诨”罢了。

因为章太炎在东京对吴稚晖进行过斗争，引起先生对章太炎的议论，要点就是没有集印他的富有战斗性的诗文，是一大憾事。先生在以后的文章中，也表示过同样的意思。对章太炎以后的倒退言行，先生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鲁迅先生在北京作政治斗争的高峰，我以为是三·一八惨案后，他受了青年鲜血的革命洗礼，在北洋军阀杀光闪闪的白刃下，反动文人陈源之流助威叫嚣的噪声中，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

三·一八那一天，我感冒发热，卧床未起，但是知道有请愿游行的事。韦丛芜是参加了的，虽然知道北洋军阀残暴，我一点也没有为他的安全担心。虽然有密集的枪声从寓所的东边传来，我愕然聆听了一会，也就毫不介意了。待到韦丛芜满身血腥，面色苍白，走到我身前，匆匆地、气短地说了几句话，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似梦非梦地扶他脱下血污的外衣，使他在床上躺下，他立刻就酣睡了。醒后他较详细地说了说屠杀现场

的情况，除了亲眼看见，那残酷的野蛮行为，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从死伤的人堆中缓缓爬出来的。

我们去访鲁迅先生，我从没有看到过他那样悲痛，那样愤激。他反复说：我们绝不能沉默！他让韦丛芜写写亲身经历的情况，他写了一首诗，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先生在三·一八那一天，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一知消息，立即转笔痛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他断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并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陈源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一篇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诬蔑爱国群众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而"民众领袖""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妄图替杀人的军阀官僚开脱罪责。鲁迅先生立即写《"死地"》加以回击。领导这次请愿游行的有李大钊，我们和先生谈话时，他说听人说，李大钊参加了游行，枪声起时，李大钊躲在一个墙角，持枪拿棍的卫兵前来要打杀他的时候，他说自己是路过的商人，才幸免于难。韦丛芜说，一个游行领导人的女儿在燕京大学读书，也参加了游行，而且各校由学生会负责号召组织，参加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通缉五十多人，其中自然也有鲁迅先生。过几天，《京报》透露了一部分人的名单。在家人和朋友们的敦劝下，鲁迅先生并不认真地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等处，时去时来地躲避了约两个月。他依然上课，写战斗文章和几篇回忆文，并借送文章的机会，找我们谈天。在惨案发生前不久，刘和珍曾亲到未名社买《出了象牙之塔》并定阅《莽原半月刊》，我同她只见过这一次面。我对先生谈过这件事，他很高兴，因为有这样热心的读者，书刊大概是可以继续出下去的了。不料在短短的时间内，她就死于非命，谈起来我们倍觉凄惨。先生谈到刘和

珍和杨德群受难、张静淑受伤的情况，啧啧称赞中国妇女的坚决和英勇，正如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说："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鲁迅先生是不赞成徒手请愿的，但是他在这次事件中看出了深远的意义：三个女子"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他又指出："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先生这样写，这样说，也这样作了。

鲁迅先生在北京期间，通过言教身教，对我们进行了多次深刻生动的政治教育，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益。惭愧的是，我们未能遵循先生的谆谆教导，在实际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在这方面作出任何贡献来！

更使我们痛心的，是鲁迅先生离开北京后，韦素园病倒了，不几年后，韦丛芜开始生活腐化，进而政治堕落。这是未名社解体的基本原因。为免使卧病的素园伤心，远离的鲁迅和靖华担忧，静农和我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九三〇年九月，何林和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未名社。一九三一年三月，静农和我到疗养院看素园，只以经济不支做借口，对他提出结束未名社的办法来了。以后的事，就由韦丛芜以"整理"为名，进行处理了；取消社名，由开明书店收买存底，各人的书，愿给开明出版的听便，倒是由我们在京几人商定的。韦丛芜不让静农和我写信，由他自己去征求鲁迅先生和靖华的意见。《鲁迅日记》发表后，我才知道他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得韦丛芜信即复，并声明退出未名社"。鲁迅先生在一九三

一年六月十三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上月丛芜来此，谓社事无人管理，将委托开明书店……代理，……我答……同人既不自管，我可以即刻退出的。"这情形，我也是在书信发表后才知道。素园是一九三二年八月去世的，在此以前，为照顾他的病体，他们二人都未公开表示。这种盛情，我永世衷心铭感。

鲁迅先生在上言的信中说："未名社竟弄得烟消云散，可叹。"我重读时感到难言的痛苦和惭愧！先生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建立起来的战斗阵地，我竟未能固守，实在辜负了先生对我的爱护和教育！

鲁迅先生对敌人是无情的，至死也不饶恕，但是他对朋友却是异常宽厚的，对后辈青年尤其如此。先生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至少，这是触及到我灵魂深处的话。先生的许多文章和书信中，有不少情深意重的语句，使读者读时觉得和他心连心，所以格外亲切。就以先生对韦丛芜的态度为例吧，我觉得在憎恶中，还有惋惜的心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给我的信中，只写道："丛近到上海一次，未见，但闻人传其言谈，颇怪云。"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先生给静农的信中说："立人先生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醒；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立人即韦丛芜）

鲁迅先生对韦丛芜溺于宦海的憎恨与惋惜，我觉得也是在政治立场和方向上，对静农和我的委婉警诫。我们可以聊自安慰的，是未名社被北洋军阀查封一次，一个成员被北洋军阀和国

民党先后逮捕两次，一个成员竟被逮捕三次之多，但在政治方向上从未动摇。先生费尽苦心，用言教身教对我们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总算还没有化为乌有。但是先生对于我们的期望，我们是远远没有做到的！

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给静农的信中说："现状为我有生以来所未尝见，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先生又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给静农的信中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者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先生的相识所存无几，有的为贫苦折磨而夭折，有的被反动派所杀害，所以先生"因悲而愤"，也就是为亲者悲，对仇者愤；但绝不只限于悲愤，"偶自摄卫"，是为了要继续战斗。北平诸公指参加过五四运动、特别是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人，他们的蜕化变质，自然会使先生有隔世之感。我想先生在写这样信的时候，大概也联想到素园的早夭，丛芜的堕落，未名社的解体吧，这也是先生对于我们的关怀，对于我们的委婉忠告吧。

当然，我想先生可能有这样的联想，是只就先生而说的。因为五四运动掀起狂风暴雨，激起惊涛骇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未名社的其他成员说，最多不过下了点毛毛细雨，所做的一点工作，不过是沧海一粟。先生"因悲而愤"，由愤而继续革命，继续战斗，我们望尘莫及！"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隔世之感，我有时倒也是有一点的。我曾先后梦见鲁迅、素园和静农，仿佛先生逝世后还对我们无限关怀一样，醒后作诗记之：

一

握手言欢一瞬间，

重温四十余年前。
堪伤死别与生离，
难诉心头事万千。

二

良师遗训未尝忘，
益友音容忆断肠；
梦里相逢频回顾，
中宵不寐细思量。

鲁迅先生对未名社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费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有日本文译本的，还对比校订。对于人名的音译和字形，他都一一认真改定，然后向我们说明他的原则：不用中国式姓名译外国人名，不在女性人名上加草头女旁，字形要长体和扁体配称使用。译稿付印时，他把空行空格，什么样和几号字体，都一一标记清楚。看改我们的创作时，明显的错别字，当然就随看随改掉了；但先生认为稍关重要的处所，必和本人商量后才确定，例如对于我的那篇不象样的小说《生活！》就是如此。

对于译什么，写什么，只要我们向先生请教，他总耐心而认真地向我们提出建议。从谈话中，先生知道素园还读了一点俄文的文艺理论书，曾对他说，可以在这方面努力。素园卧病时还伏枕读译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是先生教导的结果；但先生认为这对他的病体不宜时，就劝他不要译硬性的东西。素园鼓励静农写小说，先生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并多读点外

国短篇小说作借鉴，写成后，先生细心修改，在结集印行时，并建议把书名改一个。静农听过先生的课，对中国小说史最感兴趣，先生教导他读史，特别要读野史笔记。在抗战期间，静农在蒋管区教书，写了一些篇历史小品，我以为还可以看出先生的影响来。

我同鲁迅先生谈过，我欢喜文学，并想学点英文，因为我从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走开后，曾经自己阅读简写的《一千一夜》的故事，很感兴趣，觉得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未名社成立后，我曾不自量力，想把《一千一夜》全译出来，并登出广告去。先生不但不泼冷水，并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傻劲大加鼓励，写信告诉我，北京孔德学院有一种好版本的《一千一夜》。以后我也寻到另一个好版本全译。但是事随境迁，这点宿愿早已落空了。

希伯来文学的广泛传播，固然是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其宗教思想，作为麻痹人民工具的结果，但在西方文学传统上却自有其意义。所谓《圣经》(Bible)，原不过是"书"的意思，实际上是神话、民间传说、历史、诗歌、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的言行录等等的混乱的杂集。近代有人把它作为文学加以研究编写，也有人从中取材，写成供儿童阅读的故事。我给鲁迅先生写信说，我想选译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先生复信说："《圣经》两字，使人见了易生反感，我想就分作两份，称《旧约》及《新约》的故事，何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时候，反宗教的宣传很盛，我先在一个教会中学，后在一个教会大学读书，对宗教也有反感，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也借宣传《圣经》欺骗麻醉人民，反宗教又是反帝斗争的一部分，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放弃了，先生也是赞成的。他先前从文学观点出发，认为可以翻译；以后从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可以不翻，前后并不矛盾。

我离开未名社，到天津教书后，一年多未写信给鲁迅先生，

但先生对我还是很关怀的。他同和我相熟的一个人谈话，很惋惜我不再在翻译上努力，我知道后，立即写信告诉先生，我在译长篇小说《简爱》。先生此后又陆续把他的译著寄给我，显然是鼓励的意思。《简爱》译完后，我寄给先生，他看后代为送出发表，换得我去英国旅游的川资。先生以为走马看花，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学了解也有好处。

在写作上，我没有任何成就，但先生在这方面对我的教导，我念念不忘，时时感到惭愧。我写了一篇很幼稚的小说《微笑的脸面》，原是交给先生，看是否可以在什么报纸的副刊发表的，先生看后说，有点可惜，留给我们就要创刊的《莽原半月刊》发表吧。但是在鼓励之后，先生就对我说，写作受别的作家影响是难免的，但不想法别开生面，受到束缚，那就不好了，并说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安特列夫的影响，不过影响还不算太坏，以后注意就好了。我对先生说，这篇小说有点实生活经验作根据，先生说，不来源于实生活的作品不会有生命，当然从生活素材转化为艺术品，不是简单的事情。

这时期，我只写过几篇短文，写完总寄给先生看看，现在我自己连题目也记不起来了，但是还记得先生劝我似乎可以多读点英国的 Essay，因为他那时正在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中就有论及英国这种文体的文章。Essay 的中文名称很杂乱：一时有人称为“散文”，因为和“Prose”相混，后来似乎不用了；也有人称之为“小品文”，后来因为林语堂提倡所谓“抒写性灵”的小品，大家也对这名称有点厌恶了；后来也有称之为“随笔”、“抒情文”的，也都很难说恰到好处。“杂文”是有人鄙视鲁迅先生文章而加的名称，经先生驳斥后通行了。我觉得，鲁迅先生称为“杂文”的文章，就内容和风格说，是特有中国民族风味的 Essay，是推陈出新的范例。《朝花夕拾》中的回忆文也是很出色

的 Essay。

由于鲁迅先生的教导，我较多地读了一点这种文章，对《出了象牙之塔》的文章风格，也觉得新鲜活泼。但是我对先生说，我毫无写这种文章的才力。先生对于我的多方面的幼稚，当然是了解的，但是带着勉励的意思说，天下没有一蹴而就的事，写文章既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也要有艺术方面的修养，前者尤为重要。

我试着学写一点这样的文章，多半是在先生逝世之后，曾先后集为《温暖集》和《马前集》。虽然是在先生影响之下写的，我倒也没有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一任其散失，好象苦涩的果实落地，任其腐烂消失一样。我现在后悔不该印行的是《给少男少女》，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当时还未忘记《出了象牙之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一个女子师范学院课外讲的六篇讲演。当时可读的书既少，又脱离现实生活，所以大部分内容既非"批评社会"，亦非"批评文明"，象先生所时常教导的，倒是象先生所说过的有趣生动的比喻：用青年和自己的头脑作阵地，一任别的作家和思想家驰马，而他们当然是资产阶级的！这就不止是辜负先生教导的憾事了。

鲁迅先生有一次问我，一个名字声音和我的相似，而姓不同的人所写的旧体诗词，是否是我用化名写了开开玩笑的？那时常有人讥笑写白话的人写不出文言文章和诗词，所以他想或许是我在开玩笑。我说我没有写过旧体诗词，读过不多一点，倒也觉得喜欢。那时我还不知道先生写过旧体诗，所以问了问先生。他说积习难改，偶然写一首，但不发表，因为怕影响文学改革。不过先生觉得，偶然有点感触，不敢高攀天才所膜拜的"灵感"，旧体诗对自己仿佛比新语体诗便当一点。以后我看到过先生写寄给静农的旧诗，看内容倒不是先生以前很想提倡的抒情

诗了，而寓有政治性很强的讽刺：

云封高岫护将军，
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
打牌声里又新春。

国民党反动派轰炸苏区的残暴，同革命人民成为鲜明对照的寄生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不是跃然纸上了吗？以后我也偶然读到先生其他的旧体诗，政治性和艺术性很好地统一起来，也是战斗的投枪和匕首，因为言简意赅，往往更为锋利。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的生活上发生了一点小波折，从敌陷区跑到蒋管区，为公为私，是颇有一些感触的，当然并不是什么“灵感”。我记起鲁迅先生的话，偶然将感触用旧体诗写出来，否则会气闷死的。这些诗颇有些愤世之音，但是正如我自己在诗中所写，“遍地恶风摧劲草，漫将篇什付红燐”，大多随写随毁，“明哲保身”，不过写点悲欢离合情绪的诗，因为附抄在家信之内，倒保存的较多。

最近又重读鲁迅先生给杨霁云信中的两段话：“《集外集》既送审查，被删本意中事，但开封事亦犯忌却不可解，大约他们决计要包庇中外古今一切黑暗了。而古诗竟没有一首删去，却亦不可解，其实有几首是颇为‘不妥’的。”“《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诚为‘天恩高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可见古诗在先生手中笔下，也是对敌斗争的武器，而且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英勇巧妙地加以使用！我写旧诗有点受到先生的启发，却离先生的教导甚远，倍增惭愧！

在待人处世方面，我们也从鲁迅先生得到很多的教益。在鲁迅先生故居“老虎尾巴”的东墙上，挂着一张日本人的照相，我们问起，先生说他是教过他医学的老师藤野严九郎。他为我们叙说过他如何认真负责，把他的笔记连文法错误也一一细改。先生在《藤野先生》中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这样的良师鼓舞着先生不知疲倦地进行战斗。

鲁迅先生对我们不止一次谈到过章太炎，称赞他的学术专长和战斗精神，批评他后来的复古言行。我以为先生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一段话，是可供我们学习的：“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 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

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良师，在许多方面都是伟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先生在政治上，译作上，读书上，生活上，负责细心地教导我们个人，帮助我们个人，也是因为先生放眼中国，想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献身革命和文艺的青年来。我们远远没有满足先生的期望，但是我们对先生“执礼甚恭”，也还未自暴自弃，并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作了点文艺工作。先生对我们还是一直关怀的，并时时加以鞭策和鼓励，先生对于后辈，也是“略小节而取其大”——所谓大，就是先生始终注意的政治方向。

鲁迅先生对未名社的出版事务，也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随

时详加指导，这在给我们几个人的书信中都可以看到，用不着细说。先生的政治警觉性是很高的，无论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或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中，他都能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斗策略，从容不迫地对敌战斗。先生一直主张“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作不必要的牺牲，以减少削弱革命的力量。

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早已血染山河；北洋军阀的势力，在北方还未尽消失；政治的局面是很险恶的。我们在北平的几个成员，没有实际政治斗争经验，先生是了解的；所以他很关怀我们的安危。这时，书名题为《共产党的烟袋》的曹靖华译稿寄到了。我们把译稿寄给先生审阅，先生回信说：

“《烟袋》已于昨夜看完了，我以为很好，应即出版。但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倘你以为能付印（因我不明那边的情形），望即来函，到后当即将稿寄回。否则在此印，而仍说未名社出版（文艺书籍，本来不必如此，但中国又作别论），以一部分寄京发卖。如此，则此地既无法干涉，而倘京中有麻烦，也可以推说别人冒名，本社并不知道的。如何，望即复。如用后法，则可将作者照相及书面（我以为原书的面即可用）即寄来。”

为了不失鲁迅先生写信的精神，我引了全信。我们的政治警觉性当然不高，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虽然小说的内容谈不到是革命的，也可能引起一点麻烦，但主要为了不以出版印刷的琐细事务去浪费先生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决定仍在北京印行，为不辜负先生的苦心，我们把书名只简单用了《烟袋》两个字。这本书当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但在未名社结束后，存书还在一次事件中成了部分的“罪证”。

鲁迅先生的信是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写的，我们不难

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先生当时身居危境，随时有遭杀害的危险，但是他还关心远在北方的几个青年，人格是何等伟大，精神是何等崇高啊！不到两个月后，未名社遭到查封的灾难，几个人几乎丧生，先生的预先警告是从现实出发的，而我们在政治上却是幼稚无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四十八年前
未名社被查封之时也。

（原载《河北文学》一九七六年九月号）

一　面

阿　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

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合适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在架上我看见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不知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Sensei，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 Sensei（老师）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象我，穿着一身黄卡机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象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象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象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这样一个流氓样的工人（我知道我那时的那副样子很象流氓）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把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象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　　*　　*

这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选自《鲁迅先生纪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初版）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曹　白

一

沪战[1]之后第二年的十月八日，我在一个艺术学校里[2]，突然被捕了。但那被捕的原因，当时却一点也想不到。我在什么地方犯了他们的法律呢？这疑问，还是直到在“拘留所”[3]里进行了第一次拷问的时候，才明白的：是为了刻木刻。

但审判官一判就判了我五年！

然而天下的审判官大抵以“慈祥”的为多；他又以法律的第七千七百七十七条的优待条例，判曰：“被告……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自然，这比别人看一本书，就要坐五年或十年，判无期或“解放”，也委实是宽恕得多了。我因此也就很高兴。

---

① 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进攻上海的战争。——作者注。
② 国民党时代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作者注。
③ 杭州柴木巷拘留所。——作者注。

去年① 年初出了牢监，过了五个月，囚犯生活的惨苦的影子，在我的脑膜上淡漠了一点，我又手痒起来了，就又刻了两幅《鲁迅像》和《鲁迅遇见祥林嫂》。后一幅是取材于《彷徨》首篇的《祝福》的。那时，全国木刻联合会要在上海举行一次展览会，叫我去参加，我就把我的粗笨而拙劣的仅有的这两幅新作，送了去。那倒并不是为了使自己高兴一番的缘故，其中以“再给你看看”的复仇的念头居多，是带着一点忿恨的。

展览会开幕的第一天我就去看，发现自己的两幅，只剩《鲁迅遇见祥林嫂》，不见《鲁迅》了。

我立刻去问主持展览会的人。但他说：我的那张《鲁迅像》不能展览，检查老爷说的，“不行！”

“不行”就由他去“不行”吧，我默默地回去了。

今年“三·一八”的那天，不知为什么，我要整理一下箱子了。竟在书籍和杂物的零乱中，检到了我的那幅“不行”的木刻——《鲁迅像》的拓片。但又不知为什么，对于这粗笨而拙劣的东西，自己忽然爱惜了起来。而且就把它立刻寄给了鲁迅先生。意思是叫他知道知道，就象我这样不够格的东西，也是“不行”的木刻，是属于禁止之列的。

但等信一发出，自己就觉得很懊恼。想，我将会引起鲁迅先生的猜疑的吧？“不行”由他去“不行”就是了，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呢？

可是不然！隔不了三天，鲁迅先生给了我回信了。我捧着他的信，惊喜的、无遍数的贪婪的读着：

曹白先生：

顷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

① 指一九三五年。——作者注。

没有成熟的。

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

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　迅　3月21日

二

由于我们的心的深深的共鸣，我们的友谊就从此开始了。

但这是别人所不晓得的。

我自然对他说起我的身世，我的可怜而复可笑的坐牢故事。对于后者，他觉得非常之骇异。于是，他要我把这故事的原原本本，讲给他听。那时，校里① 正在小考，我忙于出题目，批卷，结分数。但我竟在一整夜，写了一篇《坐牢记略》，给了他。他说原文在中国不能发表，还是"让我在你的略记里，摘几段起来，做一篇罢"。这就成了他在《夜莺》上的那篇《写于深夜里》。

此后，我们在通讯里，什么都谈。从木刻，文学谈起，一直谈到指挥刀和叭儿狗。自然，我是益见其浅薄或无学了，但我们在暗底里的交谈，倒也是毫无"忌惮"的。

但这却是别人所不晓得的。

可是他对于青年人的鼓励和原宥，关怀和支持；他的热烈，他的坚韧；他对于黑暗的憎恶，对于光明的企求，常常在给我的信里，象在他的著作里一样的表现出，指示出，坚持着！

所谓"爱"，我是一向不懂它的，而且我也没有尝到过。但和

① 当时作者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新亚中学当教员。——作者注。

他通讯之后，我才算了解到“爱”了。——人间的温暖到底也还剩着一点儿。虽则这温暖，只在阴暗中流着。然而惟其如此，也就益见它的宝贵了。

有一回，我对他说，我虽则出了监狱，身边还有狗眼在炯炯，并不很自由；虽则做了先生了，但信也常常要防拆，他就说：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吧。”

是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吧。

二

但他在五月里大病了，躺在床上，连翻身也难。我象所有关怀着他的人一样的记挂着他。我要去看他，许先生却说，“你还是不要来的好”；我因此也就没有去。

六月中旬，连报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病重的消息。那时，北方有一个金君① 给了我一封快信，要我写一篇关于鲁迅先生的病状的通讯，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因为许多人太关心他了。然而鲁迅先生的病状，我知道得很少，几乎只能缴白卷。无法，又只得写信给许先生了。

没有几天，许先生的信来了：

曹白先生：

惠函收到。先生们的热心，我们是很知道的。不过要写明周先生的病状，可实在不容易。因为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挣扎相关，三言两语，实难了结。

所以我只好报告一点最近的情形：

① 指当时在北京做木刻运动的金肇野。——作者注。

大约十天以前，去用X光照了一个肺部的相，才知道他从青年至现在，至少生过两次危险的肺病，一次肋膜炎。两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应该死掉，而他竟没有死。医生都非常惊异，以为大约是：非常善于处置他的毛病，或身体别的部分非常坚实的缘故。这是一个特别现象。一个美国医生，至于指他为平生所见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可见据现在的病状以判断将来，已经办不到。因为他现在就经过几次必死之病状而并没有死。

现在看他的病的是须藤医师，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龄与资格而论，也是他的先辈，每天来寓给他注射，意思是在将正在活动的病灶包围，使其不能发展。据说这目的不久就可达到，那时候，热就全退了。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但大约先生急于知道的，是周先生究竟怎么样吧？这是未来之事，谁也难于豫言。据医师说，这回修缮以后，倘小心卫生，一不要伤风，二不要腹泻，那就也可以象先前一样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

先生，就周先生的病状而论，我以为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专此布复，并候

健康！

景宋上　6月25日

这也实在是一个“好消息”！然而要鲁迅先生放弃工作，“小

心卫生”，就很难。那末就要“拖”不“巧妙”了！这篇通信我实在写不下去，而且也就不再征求许先生的同意，我把她给我的信，录了一份，寄给北京的金君。

北方的惦念着鲁迅先生的病状的人，看了许先生的这封信，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我自然是不晓得的。

但他此后的病也到底逐渐逐渐地好起来了，以至于能够到处走动。

四

上个月的八号，是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展出的最后一天了。我丢了授课，就到八仙桥① 去。虽则从“不行”的木刻之后，因为职业给予我的事务的纷繁，将有一年不动手了，但到底还想去看看。到那边还没有十分钟，碰巧，鲁迅先生也来了。他的帽子是故意戴得那样的低，低到帽沿，几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见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一横鼻下的厚厚的胡须。但在冬天，就连胡须也不给人看，他把围巾围没了。这打扮，使有些人就不免说：“鲁迅真古怪。”但这为的是要避去狗眼，一九三一年给他的教训太大了。

我走上去，向他招呼。他把头仰起来，用发亮的眼光看看我，嘻开了嘴，点一点头，然后说：

“哦哦，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收到了。仗不会打的：我不搬家。嘻嘻。”

“我也这样想。……不过我们那边搬家的嚷嚷，看到听到都不好过。”我想不出什么再说下去了。只是自己捏着自己的手。

“嗯嗯。北四川路上每年总有这样的一回。也受惯了。嘻，我们一起看画吧。”

① 当时的木刻展览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作者注。

我就跟着他一起看。这时候，另外几个青年也都围上来，跟着他看，听着他的批评。

已经看完了作品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到了批评的地方了，他就坐下来，拿了批评簿，翻着看。当他看到那些题着“艺术之光”，“力的艺术”之类的高洁的批评时，他就低缓的说：

“这是‘匾’。”——害得大家都笑了。

他自己却不笑。

他看到那些写着这展览会最好开到贫民窟，或灾处，或穷乡僻壤，或东北去的义正辞严的批评的时候，就说：

“这些都是不会做事的呆鸟！”① ——害得大家都笑了。

他自己却不笑，说：

“先前我开了一个版画展览会，不知费去了几多的周折，才开得成功的。但结果还是把柯勒惠支（Kollwitz）的《农民战争》挂开，瞒住那些官老爷的狗眼。”——这又害得大家都笑了。

而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笑。

我知道，他是病着的，但他说起话来，却比健康的人还起劲，还爽利。他脱下那只大而灰扑的铜盆帽②，额上已经冒着细微的汗气了。

“我们息一息吧。”他说。

于是我们就到息一息的地方去，坐下来。我们一共五个人：他和林夫、陈烟桥、白危还有我，围住了一张小茶几。

陈烟桥和白危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他。是为的什么事情呢，我当时没有听清楚，只仿佛是为了有一个人要他做一篇“序”的样子。但他却摇着头说：

---

① 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是不可能把木刻展览会开到这些地方去的。所以鲁迅说这样的话。——作者注。

② 指鲁迅戴的礼帽。——作者注。

“他吗？他在段祺瑞手里就压迫我的。——我不会做！我不会做！叫他去请别人去。”他郑重的说着。

我格外的和他熟识了。我要贪婪的和他交谈：

“那次苏联版画展览会，许先生是和你一起来的，这次许先生没有和你一起来？”

“没有。”

“近来好些吧？还打针？”

“好些了，针已经不打。不过热度有时还要高起来。”

“那末就再打打。”

“也正这样想。”

“前天，你和许先生，鹿地先生，池田先生，一起去看《冰天雪地》的吗？”

“去的。那片子真好！他们到底是和别人不同的！”

“我也去看过了。全戏院就只有三个人。那时，外边还在搬家哩。哈哈！”

“嘻。”

“你为什么不搬呢？”我忽然觉得这已经问过他了，就立刻改口道：“你还是到外国去静养吧？”

“我的父亲没有留下遗产给我啊。病也没有法子想。不写文章就不得过。嘻哈。”

“但你毛病没全好，得息息呢？”

“息得太多，也就很无聊。”

“真的，登在《作家》上的那篇《答徐懋庸……》”

“嗯，是啊！不要说他了。他是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想来一气气死我的。哈哈，但我那里……我就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了四晚，写成功了。我是不赦他的。我不给他气死……哈哈。”

“但你的《死》也写得太悲哀了！”

“没有什么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

他太兴奋了，摸出烟来抽。

“那本你告诉我的代替《引玉集》的《拈花集》，什么时候出版呢？”

“啊，恐怕一时还不能吧。钱都差不多印光了：印柯勒惠支的选集，印《海上述林》。柯勒惠支的选集觉得印得怎么样？”

“好极！”

“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

“自己有病还……”

“嗯。别人做的不如意呢。而且我拿一本寄给了作者。”

“柯勒惠支能收得到么？”

“不是直接寄给她的，我叫人转去。”

“谁？”

“武者小路实笃的哥哥。他是日本驻德的公使。不知会不会收到？”

“叫官转去，我想总不会有什么毛病的！”我笑着说。

“我也这样想。嘻嘻！”

他又燃着一支纸烟了。我也吸起来。他忽而对我问道：

“你就在新亚教书？”

“是的。”

“那学校——我的侄女儿在那边上过学，要打手心。现在还打吗？”

“还打的。”

“嘻……”但他连忙的摇着头。

“嗯……”我感到很深的内疚，低下了头去。但终于也就又

问他：

“你的儿子在哪个学校呢？”

“就在自己的弄堂里。”

“还好吗？”

“好不来！前几天房东来收租，缴不起，连课都弄得几乎不能上，哈嘻！”

“嘻嘻。”

“我们再来看一看吧。”他立起来说；脸上似乎发亮了。我的身肢也跟着轻起来，只觉得浑身浸在亲切的空气里。我太高兴了。

我们又跟着他看许多的木刻，听着他的对于木刻的细致的批评。他指着画面说，这人的脚骨断了，手太长了，不说这是解剖学的错误；他说这不象中国人，饥民，不说这是轮廓和明暗的错误；他看见刻的是群像，就说，面孔都是一样的；他看见战争，就说，战云不大对，去看看克拉夫兼珂(Kravchenko)的吧。……

他是这么具体而微细的批评着的。

看完了，于是乎再坐下来谈。

“觉得怎样？这次的展……”

“自然进步得不少了。但人物总还不会刻。”

“大家的素描工夫都很差。”

“这所以也怪不得的。譬如象柯勒惠支……”

“柯勒惠支的那种基本工夫，实在太深了。尤其对于光线的凝散，布置得非常的有力。”

“是啊！柔石等死了，我写信去请她画一幅被害的图画，作为我们的纪念。但她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于中国的文物，又生疏，没有答应。那种作画的认真的精神，我们应该学学她。”

“真是，她把同样的一幅画，要画上两三遍，我在她的《新集》里面见过的。”

“所以环境不允许作细微的素描时，就要多速写。参考书也要多看。”他严正的说。

“但真真可作参考书的，却很少。”

“这就是我常常赔钱贴工夫，印画册的缘故啊！”

“……”

“画册要印得好，方才对于学习的人有用。但成本就要贵。有钱的不要买，没有钱的又买不起——就只好送。哈哈。”

“赔钱赔工夫——你真是一个傻子啊！哈哈！”

“由他去吧。哈嘻。”

我完全把他当作一个“促膝谈心”的朋友看待了。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不象导师，然而他是一个青年们的最好的导师，是领着我们走路的热诚的真真的先导者。

他说要走了。把帽子戴上了，又故意的戴得那样的低，低到帽沿几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见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一横鼻子下的厚厚的胡须，急急的走了。一面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不要送！你不要送！”

我也就不送了。看着他的帽子，宽大的袍子，和袍子下面的细瘦的脚肢的移动，我看着一个病人不可能有的他的壮健的背影，在走廊的转角处，很快的消失了。

我在回家的途中，被兴奋所激动，觉得我的周围的东西，都象跳着的，活着的一样。

五

看了展览会后的第三天，我到鹿地先生那边去了，他说鲁迅

先生看了展览会回来之后，又发了热。我为此非常的后悔，我做了唪舌的蟋蟀了。我即刻就给了他一封信。

信发了之后，不见有回信来。十六号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地先生了。会讲中国话的鹿地先生的夫人池田先生对我说：

“热倒不发了，他昨天还到我们这里来玩的；但回到家里就喘气！”

“哦！”我不免惊异而且又立刻担心了起来，一面负了很大的内疚。

一夜已过，早晨，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接到了他的信，同时还送了一本《述林》给我的朋友陆君。这高兴，对我是不小的。我激动的拆了开来，有两张信笺，那第一段是：

> 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或虽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他是这样的宥恕着我，我觉得较为宁贴了。但末一段是：

> 病还不肯离开我，所以信写得这样了，只好收束。

这短短的三句，我把它们反复地读着。读到末一句，他的坚决，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在我的心上活起来。看看字迹，比先前的潦草了些，那显然是无力，疲惫了的结果。我又即刻看见一个把帽子戴得低到只剩半个脸庞的热情的老人……

在心绪的不宁中，我又给了他一封回信。但这是十七号的晚上才写成的。

十八号是星期日，我给他的信，直到下午才能寄出去，因为上半天是无法递寄的。当天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地先生了。鹿地先生说道：

“彼ノ咳ハーソウヒドクナツタ！”

池田先生就即刻翻译给我听：

“他喘气喘得很厉害哩！”

“哦哦！”我更加惊异而且担心，一面负了更大的内疚。然而我自己问着自己说：“可比他五月里的病势危险呢？”

但我也终于别了他们，孤单的踏着无灯的北四川路，悄悄的回家了。而扑面吹过来的是深秋的夜风，很凉，望望天，乌蓝的天上密集着微明的繁星，我清楚的看见一个把帽子戴得低到只剩半个脸庞的热情的老人……

六

但只隔了这么短短的一夜——在十九日的清早，这老人，就负了现实所给予他的辛苦和恣睢，寂寞和悲哀，停止了他的呼吸，和我们永别了。啊……

当我和池田先生，在麻木中奔出校门，麻木的钻进了汽车；在麻木中冲进他的卧室，麻木的立在他的床前的时候，他已逝世四个钟头了。他已不再能和我“促膝谈心”，也不再能督促，鼓励，指示我们，一同来踏过这丛莽的荆棘道路，而只是和平的，安静的躺在床上了。极度的悲哀蒙住了我，我竟哭不出声音来，眼泪只是向心底流下去，流下去……倒反凝成了愤恨了。

那里会知道，我们那次在展览会里的相见，竟成了最后的会聚？在十七号收到的那封信里的“只好收束”，竟是他对我的永

诀呢？……

诺诺，许先生拿在手里的不是我昨天给他的复信么？到现在才接到。为什么不早些送来呢？啊，他没有看到啊……

我毕竟掉下泪来了。

七

鲁迅先生一死，别人才晓得，我和鲁迅先生的友谊。

这就糟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种新订的法律，是说："对于一个自己敬佩的人，万不能和他发生友谊的关系。"而我却对于一个我自己敬佩的鲁迅先生，发生了友谊的关系了。

我又无端的碰在这法律的碑上了，咳！

于是，我不单失去了职业，还得远远的出走。……牢狱究竟是屠杀奴隶的刀砧，我自己爬上去干吗？

写到这里，浓重的黑夜把我压住了，真使我难于呼吸。而悲愤的激流又在心中这样的奔腾，我也不再能够写下去了。是的，我把自己所有的说话，还是写在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永恒里吧……

我就这样的活下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深夜。

（选自《鲁迅先生纪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初版）

一木一石

赖少其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为日本社会评论家新居格先生写的一首著名诗篇。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毛主席亲笔书写了这首诗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这是有深刻政治意义的。当鲁迅先生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头子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鲁迅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极其残酷的文化“围剿”。但鲁迅先生坚信：黑暗一定要过去，革命一定要胜利。

鲁迅先生坚定勇敢地和敌人作战。在战斗中，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中国共产党内和左翼文艺队伍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鲁迅先生说：“敌

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因此，他只能“横站”着，和敌人搏斗时，经常要“瞻前顾后，格外费力”。也正是在这样紧张的战斗中，鲁迅先生为了提倡新兴木刻，培养革命美术的幼芽，花了多么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啊！而鲁迅先生自己却极其谦虚的说：这不过是“一木一石”。他在给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鲁迅先生所指的巨大建筑，无疑的就是共产主义大厦，要建筑这样巨大的大厦，是需要很多“一木一石”的，而其中最宝贵的是培育革命的幼芽。鲁迅先生为了教导青年木刻工作者，仅一九三四年即写了七十三封信。如果从一九三〇年到他逝世时为止，根据鲁迅先生在《日记》上的记载，总计达一百七十一封，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有一百二十三封。鲁迅先生把这些艰巨的劳动都看作为了建筑共产主义大厦必须努力去做的“一木一石”。

一九三三年，我们广州美术学校的部分青年师生，组织了“现代版画研究会”，经常举行木刻展览会，出版《现代版画》月刊。一九三四年冬，李桦同志首先给鲁迅先生寄了三本画集和会员的一些木刻，由于当时没有想到鲁迅先生会在百忙中给我们回信，因此信上没有写上我们的通讯地址，所以鲁迅先生的回信一开始便说：“我所知道的通信地址似乎太简略，不知道此信可能寄到。”并且非常高兴地写道：“看展览会目录，才晓得广州曾有这样的画展，但我们却并未知道。”（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夜给李桦的信）在第二封信中告诉我们：“至于上海，现在已无木刻家团体了。”“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此后还有一点，但终于被压迫而迸散。”这是因为：“实际上，在上海的喜欢木刻的青年中，确也是急进的居多，所以在这里，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意即反对国民党——作者注），立刻招人

疑忌。”鲁迅先生在信中忠告说：“木刻确已得到客观的支持，但这时候，就要严防它的堕落和衰退，尤其是蛀虫，它能使木刻的趣味降低，如新剧之变为开玩笑的‘文明戏’一样。”（给李桦的信）

我的家乡广东省海丰和陆丰两县是早期农民革命运动兴起的地方，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头目陈独秀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革命战争失败了，革命根据地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惨绝人寰的血洗，我感到无比愤怒和悲痛，怀着悲愤交集的心情，写了一篇极短的小说《刨烟工人》寄给鲁迅先生。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鲁迅先生复信中说：“写得也并不坏，只是太悲哀点，然而这是实际所有，也没法子。这几天我想转寄给良友公司的《新小说》，看能否登出，因为近来上海的官府检查，真是严厉之极。”并且教导我：“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鲁迅先生以高度的革命热情鼓励我们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每当重读这些信件时，都使我们热泪盈眶。

当中国的新兴木刻还是幼芽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因它的幼小而忽视它，相反的，却寄以极高的希望：“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又说：“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在《引玉集》的后记中写道：“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又在《无名木刻集》的序言中写道：“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但是，也用着重号写道：“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

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给李桦信）鲁迅先生对当时的青年木刻工作者还指出：“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大家赶紧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会拿出来充数。非有耐心，克服不了这个缺点的。”鲁迅先生对于青年木刻工作者的教育、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从一九二九年在《艺苑朝华》开始介绍英、法、东欧和日本的木刻起，一九三〇年编《新俄画选》、《士敏土之图》，一九三一年介绍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一九三三年介绍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连环木刻，出版苏联木刻《引玉集》，和郑振铎合资刊印《北平笺谱》、重印《十竹斋笺谱》，还印青年木刻工作者的作品：《无名木刻集》、《木刻纪程》等，请内山嘉吉先生讲授怎样刻木刻，鲁迅先生亲自当翻译，多次举行木刻展览会和“珍藏版画展览会”，并把中国的新兴木刻，介绍到德、法、日本和苏联，做了浩瀚的工作。

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回忆录》中写道：“鲁迅还作了预言，木刻将来有两个发展前途：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木刻艺术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鲁迅先生的预言是正确的。鲁迅先生在逝世前的十一天（即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还在上海参观了“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给我们留下了他伟大的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这是给我们最宝贵的纪念。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的序文中希望：“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旗旌蔽空的大队”。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

命家。”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工农兵群众、业余和专业的木刻工作者，已经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新军，这支“无尽的旗旌蔽空的大队”的人数以及创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学习鲁迅先生做“一木一石”的革命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繁荣社会主义美术创作而不断努力。

（原载《人民中国》（日文版）一九七六年第十期和《美术》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忆鲁迅先生

司徒乔

一九二四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青年：在广州受过十多年美国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平时把自己关在校园之内，觉得不问政治是学生的本分，相信“人格救国”那一类废话，课余时间，大部拿来练习写生。我的父母和亲戚都很穷苦，但我从来不去追问这穷和苦的根由。到了北京，因为转学之便，仍然投到美帝文化侵略基地——燕京大学。

这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后不久，新文学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一个意识十分模糊的人，也会被《晨报》副刊、《新青年》、《语丝》等刊物打开眼界。我逐渐接触一些新文学，特别喜爱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译作。我入迷地读着《呐喊》、《彷徨》、《热风》、《坟》、……。我在校旁小巷里散步时，随处都看见祥林嫂、闰土、阿Q、小栓……。他们又使我想起童年在开平乡间所见到的祥林嫂、闰土……。我开始爱上他们，并痛恨那些压弯了他们的脊梁、榨干了他们血液的人吃人的制度；我便开始画，画他们的苦痛和愤怒。

一九二六年，我的画在北京中央公园展出，鲁迅先生来看了展览，也买了画，可惜开会期间我因事回广州，没有见到他，他也始终不知道这些画是在他的作品影响下画成的——当然，我接受他的影响是不够深刻的。

在这之前，我给未名社的书籍、刊物画过封面和插图，也在那儿发表过小说，却始终没有机会拜访过未名社的发起人鲁迅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好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年底，李小峰招请的宴席上。他对青年人的关切，使我感到无限温暖。这正是大革命失败，我从武汉退却到上海，精神上无限彷徨的时候。在这苦闷的日子里，我多次到景云里探望鲁迅先生，有时和他一同到“小有天”吃饭，有时同到附近小剧院看戏。他也到过我那巴掌般大的乔小画室看画，为我的展览写文章。当我画那天使吻着耶稣的荆冠时，心里无非是对那些为人民献出自己生命的殉难者表示景仰和悼念；但鲁迅先生却说：“那是胜利”（见《三闲集·看司徒乔君的画》）。这篇文章给我的启示极大。我在当时，由于看不见人民的力量，胜利的观念是薄弱的，先生却一语点醒。文章中还有许多婉转诱导的深意，使我终生不忘。

鲁迅先生的笔锋是那么严峻冷峭，但他对待青年，却是那么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他很少作冗长的议论，但句语富于启发性。有一次当谈及艺术修养问题，记得他说：“内容，是头等重要；可是如果画个拳头也画不出劲儿来，那也不行。”边说还边把拳头捏紧了放在桌子上比了一比。这句一针见血之言，对于行将在法国碰到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艺术的我，是可贵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鲁迅先生画过一个速写，企图试着把捉他那既锐利又和蔼的目光，那既坚强又愉悦的神态。但并未能很好地做到。

回国后，我一直没机会到上海，只和鲁迅先生互通过一些音讯。一九三六年到上海，他来信约我同到青年会看苏联木刻展览，并和他一家子同进午餐。席间我曾要求他挤出时间，让我给他画个油画像。他欣然答应说："好的，一定，时间定好，就通知你。"可是，那久待的通知并没有来，他不久卧病。那次一同参观，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把晤！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

（原载《美术》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鲁迅先生买去的画

司　徒　乔

鲁迅先生住在北京的时候，人民生活万分穷困，乞丐充斥街道。记得一九二五年某一天，我在街头遇见一个乞丐，我觉得他面颊上的皱纹和眼睛里的怨愤，很能道出黑暗的社会的残酷性。我打算画他，跟随他走了一段路；忽然近两百乞丐都赶上来了，为了想得到那极微薄的报酬，每一个都要求我画他，他们把我挤到一小块空地上，以至我无法动手。

也是那年的除夕，一位燕大同学请我吃辞年饭，我走到泡子河边，经过一间施粥厂门前，突然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高举着棍棒，手推脚踢把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扑打出来。问起原因，是那妇人讨了一碗粥给孩子们吃了，最后想为自己讨一碗，就是为这，四个大汉子扑打凌辱她。这灭绝人性的事件使我无法参予同学们的除夕宴叙，我跑回宿舍，把当时情景快笔记下，因为素描基础不好，又是凭记忆追溯，画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认得出那笔线所倾诉的东西。

这幅画连名字也没签上，连画题也不敢明写出来（当时只叫

它作四个警察一个〇，〇代表那孕妇)；却在一九二六年的展览会上被鲁迅先生买了去。

一九五〇年我回到北京，去访问鲁迅先生的故居，看管的人知道我是画画的，他把这画拿出来问我知不知道这是谁画的。说有人以为是鲁迅先生自己画的，有人以为是德国或苏联人画的。我笑着告诉他这是我画的。原来鲁迅先生生前把这画挂在书桌旁的墙壁上。

这幅画的艺术造诣，是丝毫也不值得鲁迅先生重视的。他买它无非是因为画中记录的恰巧是他最憎恶的事，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缩影，虽然是十分简单而粗糙的缩影。在别人也许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关心人民疾苦和熟悉人民生活的鲁迅先生，却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拿来置于座旁。

另外 鲁迅先生还买了我一幅《馒店门前》。那是一幅水彩，画着一个半裸着的瘦削老人，在初冬的早晨，走过馒头店门前，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面香扑鼻，但饥饿着的老人却只好背过脸朝着深深的胡同走去。

从鲁迅先生买去的画，我得到这么一个启示：只有关切人民的画，才会得到鲁迅先生的喜爱。这个启示，一直指示着我的创作道路。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十九号）

忘却不了的教诲

——回忆鲁迅片断

陈　烟　桥

一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一九三二年起，我就与鲁迅先生通信较密，接触机会也较多。从“一八艺社”成立的时候起，我已经深知他是一位十分乐意帮助艺术青年的人，而且更因为他自一九三〇年起即担任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工作，党是通过他来培养我们青年一代，所以我就很愿意而又很自然地把创作情况与学习情况经常向他汇报和请教，这中间，并没有丝毫隔阂，真是比家人还要亲切体贴得多。

一九三二年，我和几位朋友搞了一些木刻作品，逐幅地附在信里寄给鲁迅先生，几乎都是得到很快的回复的；我每次都喜出望外地把复信读了又读，既感激又快慰，珍惜得不肯释手。这就养成了一种经常给他写信的热情与习惯，如果久不通信，总感到

生活有些空虚，象缺少一种温暖与鼓舞似的。

一九三三年，我们的木刻创作队伍慢慢地扩大起来，作品的读者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但是就整个运动的处境来说，却更加困难。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破坏，此伏彼起，弄得一些革命艺术团体，很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习作与学习。这时，鲁迅先生为了给我们鼓起学习劲头，充实业务知识，打开创作思路，提高艺术水平，沟通中外艺术的交流，特意组织安排了几个较大规模的外国版画展览会，和一桩较重大的进步美术作品对外介绍工作。也因为这样，我们同他见面的次数——也就是亲自听他具体地详尽地讲解分析版画作品与直接接受他分配任务的机会就跟着多起来了。同年秋天，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千爱里，他主持了一个“德俄木刻展览会”，这个展览会的参观日期、时间、地点是事先告诉了我们的。当时我们如约前往了，他看见是一大堆人临门，显出特别的高兴，立刻对展览工作做了一个扼要的说明。我们这次的接触，除了更感到他的和蔼可亲和增加爱戴之心外，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

会场上满挂着各式各样的来自苏联和德国的木刻原作，对于我们有多么大的吸引力量呵！当我们先巡视一遍，正在感叹着自己从来也没有看过象今天这样多的包括各种题材与各种形式的作品时，鲁迅先生会心地微笑了。接着，他谈到收集与挑选这些版画的经过；谈到某一国家的版画艺术的特点；也谈到学习艺术要广泛吸收、妥善采用，在保存地方色彩的前提下，必须发挥个人风格等许多问题。他频频以具体作品做例子来证实他的话。他谈了很长时间，吸了几支香烟，略事休息后，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似的，简单说道：“你们等一等！”就走出大门去了。大约相隔二十分钟左右，我们终于看见他夹着一大包书回到会场里来，于是抢先拥到他的身边，围了一个圆圈坐下。他喘着气打开

布包，拿出来的是一本英国出版的世界版画选集，一边翻开，一边断断续续地讲解着："这是近代木刻选集(1)，曾经翻印过他的作品的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另一幅作品，你们看他在构图上多么严肃完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多么娴静妩媚。""这是德国近乎表现派的木刻，粗壮有力，不求形似，又是一种风格，代表北欧人的性格；我已经收藏了这些画家的好几幅原作。""这是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画家创作出来的木刻，革命给艺术家带来了创造纪念碑式的作品的有利条件，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强大的魔力。"……半个钟头很快地滑过去，他把这本书翻完了，又另取一叠画片递给我们传阅，它们大多数是作者原拓的精品。当几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几幅作品时，他就用非常亲切的语调介绍她的战斗生涯，并强调指出："她是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战士，伟大的母亲！"随后，他又捡出梅斐尔德的作品向我们讲解："这位画家最爱刻画这一类含有革命内容的木刻，现在他虽然年轻，消磨在牢狱里的光阴倒有好几年；已经是一位久经阅历的人了。他的作风豪迈活泼，但嫌太放。"……就在这个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的动嘴动手的紧张劳动后，鲁迅先生好象有些疲乏了。在聚会结束前，他还把放在画册下面的十多份单幅印刷的毕斯凯莱夫所作的"铁流之图"样张分赠给我们，并且还托我们分带几份转交给同好；同时又关照我们顺便到璧恒书店去定购麦绥莱勒等人所作的除中国已经出版之外的其他几本木刻连续画册。

也是在一九三三年冬，有一位外国女士要求鲁迅先生代她征集一批中国左翼美术家的绘画与木刻作品，以便带到几个国家去展览。鲁迅先生自接受这个委托之后，便立刻通知我们，要我们分头负担起各方面的联络责任，共同做好作品的征集工作；我当时抱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忙碌地做了。我每次在将征集到的

作品送到内山书店当面交给他时，都向他汇报征集的经过情况。记得有一次由我交去的新作品中，以油画为最少，但他并不因此而批评我，相反的他沉默的微笑；当然，这底细我是猜得出来的：一、某些所谓"艺术大师"哪肯将作品借出？二、纵使肯借出，恐也因内容与那位外国女士所要求者有距离，因此也就算了。

二

由于我们跟鲁迅先生之间的交往被一日比一日恶劣的客观环境所阻隔，同时我们也为了体贴他，非有必要就不情愿跑到他的身边去打扰他，于是就不能不多利用通信方式来解决问题了。何况通信方式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了我们从他那里获得教益。据景宋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无论对我们的作品要提意见也好，或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也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肯下结论的，这就很可以证明他通过通信方式来教诲我们，未必不如当面嘱咐更其来得实际和有效。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鲁迅先生跟我们之间的通信竟至如此繁密呢？这在他来讲，已经不是一桩通常的问候，而是个人革命热情与党所交下来的任务的高度结合，为了将来，在勇敢无畏地负起自己应负的指导青年的责任了；在我们来讲，是在寻求解决摆在当前的一系列在创作上、活动上存在的困难的正确思想指导，也就是在寻求应如何才能更迅速有效地使作品适合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没有这通信关系，在当时固然无从提高木刻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同时也更无法促使木刻运动得到蓬勃正常的发展。在这个通信联系中，有很多具体事例实在使人感激不已。

鲁迅先生为了使中国左翼美术家的绘画与木刻有机会传播到国外去，以争取对本国左翼美术运动有较有利条件，多么愿意

和竭尽所能为那位向他征求作品的外国女士效劳。他的不辞劳苦，果然得到了一个较满意的结果。一年过去了，这批作品在外国轮流展出时，他每一次收到一些有关情况与资料后，便急忙告诉我们，如说："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他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听来，我们的绘画及木刻，在巴黎展览，很成功；又从一苏联人听来，这些作品，在莫斯科展览，评论很好云云"。自然不消说，这对我们当时渴望得到批评、得到鼓励与支持的情绪给予了很大感慰。它首先鼓起了我们的勇气，同当时所谓"艺术大师"者对版画的污蔑进行斗争；其次就是加强了我们搞创作必然会成功的信心。

一九三四年开始，我们的木刻创作情况逐渐好转了，这标志在作品数量比前多，题材主题逐步拓展，处理方法也不象以前单调无味，概括加工被提到较重要的位置上来。但是为了使它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巩固，并能继续发展起见，他又写了好几封信向我们建议：要印行一本木刻期刊。《木刻纪程》的问世，就是在他的多次来信催促下，在我们的勇敢创作实践的互相配合中才完成的。这画集的出版，曾使中国木刻创作踏上新的阶段，即无论在题材上或在风格上都更趋向广阔和多样化，因而得到当时中外读者的欢迎。同时必须提起，当时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设在上海美专内的"M · K 木刻研究会"，被某学校当局告密，成员有的被捕，有的逃亡；我与友人也因为办了两个小型画会先后被国民党密探发觉，不得不出走。但我们在潜伏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搞木刻创作。这时所得的作品，都是经过通讯方式，由鲁迅先生的评鉴及自行修改后，大部分编入《木刻纪程》里面了。嗣后，他又积累了不少我们的和各地寄来的木刻作品，与《木刻纪程》一并寄给"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处"（即展出时名为"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以供展出，这更加给各地许多新起

的作者以莫大的鼓舞。

鲁迅先生对新木刻的积极倡导，和对青年木刻工作者的热忱的鼓励给我国新木刻运动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应该说，我国新木刻运动有今天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鲁迅先生的劳绩分不开的。

三

而今，鲁迅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个年头了，假如他至今仍然活着，在党的领导下，率领我们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多好；但是他却偏偏远离我们而去了。这当然是不幸！然而在他离开我们的二十五年当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鲁迅在生前曾经用以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时说过："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现在，这句话成了对我们的现实的写照了！他所毕生追求而没有亲自看到它的成功的中国革命已经实现了！并且，不但簇新的、空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目前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这是足以向他大大告慰的。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对革命的先行者为着将来的艰苦缔造，是不能忘怀的：人们一年一度地在开鲁迅先生纪念会，和广泛地在研究他的著作，以示饮水思源之意；而我们这一批直接受过他的教育的文艺工作者，因对他生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铭感至深，刻骨难忘，尤其应该遵循他未走完的道路，勇敢地迈步前进。的确，我们曾从他那里得到过无上的关怀，曾从他那里培植出一颗为人民而创作的火苗；有了这颗火苗，如不把它点燃起熊熊烈火，实在是辜负了他的关怀，和违背了党的期望。

让鲁迅先生在生前用生命培养出来的革命艺术之一——木

刻，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创作活动得到自由奔驰的环境中，一天比一天多地放出世界上最新最美花朵来，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吧。

（原载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广西日报》）

一段回忆

张　望

我最初和鲁迅先生见面，开始于一九三一年。记得在内山书店屡次会晤时，先生总是热切地关怀，每每给我们介绍名画，尤以名家的素描、速写和木刻之类较多。有一次，先生打开一本《世界美术全集》，他很喜欢戈耶、杜米埃等人的画，也赞赏着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他曾指着玛克斯·培修太茵的木刻《运动》说：

“别看此画刀法单调，但它黑白对比强烈而又简练，这不是容易办到的，尤其是运动员的姿态是多么生动啊！”先生左手弹着烟灰，右手按着画册，吸了一口香烟，又说：“不过这种方法，目前你们还学不得，没有较好的素描基础，是难以达到此种效果的。初学不宜表现复杂场面，可选较为简单的构图，即使是静物也是极好的。”

又一次，我和陈铁耕同志到内山书店买木刻刀，但那种七把一盒的卖完了，只剩下一种三把装的，写着“小学生用”的刀子，我们不愿意要。这时，恰好鲁迅先生来了，他劝我们还是暂时先

用它，不必等待。他笑着说："有什么技艺就要什么玩艺，冷着场是不好的！"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又说："借用小学生的工具，创作出来的决不会等于作品就幼稚了……。"此时他从柜里取出一块树胶板，向我们推荐试用。当然，我们也就尝试着。我也刻了一幅胶版画，后来也被先生收入《木刻纪程》中去了。

鲁迅先生致力提倡木刻，为了扩大版画的启蒙运动，不辞劳苦，曾多次设法筹办珍藏版画展览会，举凡会场布置、作品装璜、邀请观众，乃至解说作品，无不亲自负责。当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他举办第三次珍藏版画展在北四川路千爱里展出时，我和"MK 木刻会"几位同志去参观。这次展品较过去两次丰富得多，苏联作品占多数，但也有法、比、葡、英、美等国的作品。先生对观众，尤其是美术青年更为详细地按幅说明，象法复尔斯基、冈察罗夫……等苏联木刻大师的作品，自然是他着重推荐的对象，然而对别国的，也很认真评介。因为他历来就主张向苏联学习，同时也重视向其他国家优秀的善于"创造不同风格"的艺术"借镜"。

鲁迅先生对青年的教导是极为诚恳和实际的；不但有鼓励，并且也有批评，他对"MK"诸同志也是如此。尽管当时环境恶劣，木刻青年被视为"洪水猛兽"，不是被迫害，便是逃亡，但他还是设法请人打听，寄言勉勗。记得当"MK"被摧残后，他仍写信给陈烟桥寻找我们的下落，并征集木刻的原版；当他知道我们的情况时，又立即来信，始终是热情地关怀和支持着。每一和他接近的青年都会感到亲切和受到鼓舞。

在和鲁迅先生接触当中，值得记下的当然不止于此，今将我的一段回忆写下，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一点纪念吧。

七月二十八日

（原载《版画》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忆鲁迅先生

刘　岘

一

一九三三年秋杪，在上海施高塔路千爱里四十四号一个日本人的家里，鲁迅先生主持了“德苏原版木刻画展”。

展览会场虽不过两大间房子，但布置得很精致：中间是一张大长方桌，四周放了些椅子，桌子上面放着日本清水制造的木刻雕刀，还有一些茶具。先生的意思，不仅可供休息，也是使大家可以坐谈坐谈的。

会场的四壁悬有一百多帧木刻家手拓赠送先生的作品，如苏联的法复尔斯基，毕斯坎莱夫，克拉甫钦科，波查日斯基；德国的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人的作品。在开展览会的时候，先生真是忙透了，不仅要跟着有些欣赏者一一说明作品的内容和技术的高低；而一群青年木刻学徒，问这问那，甚而还问怎样印木刻的方法，要先生答复。

“那我不会印，哈哈……。”先生说，随将黑色呢帽放到桌上。

“先生，《铁流》的木刻插图，那样精细，要用怎样的扩大镜来雕刻呢？”我们中间有一个这样问起来。

“上海买不到的，将来托书店① 想想办法罢。”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将一卷复印的单幅《铁流》插画分赠给了我们。

“这还有几本书，请大家看看。日本的浮世绘是只能吸取其技巧的……。”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在不停的吸那品海牌香烟（那时这种烟在上海只消十五个铜板一包）。不久，先生离开了会场，大家都忙着翻画集，可谁也没注意到，骤然一抬头，却看到先生又携了两厚本书走进会场里来了。

“这是新买到的书，插图很精美，大家可以看看。”先生坐在椅子上，好似有些倦意，但仍然不停地翻那约莫一寸多厚，蓝皮的两册画集，并指着要大家来看。

先生对于青年艺术学徒不辞劳苦，诲人不倦的精神，那情景虽已相隔二十余年，但仍然恍若就在眼前。

二

“《怒吼吧，中国》的作者像，我这里没有，你到书店② 里找找罢。文章我修改过了。”我很感激先生在百忙中修改《怒吼吧，中国》插画集里的说明，手拿着那修改的原稿，心里却又觉得过多打扰了先生，很歉疚。

先生为了更好的培育青年艺术学徒，时常翻印木刻版画名作，如《引玉集》、《士敏土之图》。《你的姊妹》原也打算在《引玉集》之后印行，后来因为种种困难未能实现。

我们几个学习木刻的，打算手印一本木刻集，意思是：一面为了自己每人能够保存一册，另一面也想赠送给当时和我们同

---

①② 书店指当时上海内山书店。

样爱好木刻的朋友。我写信并将选印的木刻送给先生，他不仅同意，还为我们写了一篇序文。我将先生的笔迹刻成阴文，印在《无名木刻集》的卷首，那序文是：

用几柄雕刀，一块木版，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是现代的木刻。

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现在要复兴，但是充满着新的生命。

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这是极值得记念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

鲁　迅

三

我常常写信并把木刻寄给先生，因而得到很多宝贵的指示。如习刻《孔乙已》、《阿Q正传》、《风波》等，先生的批评是极细致而具体的，对人物的服饰、面貌和画面的环境等，都提出指导意见，有时，也指示如何来接受年画的形式等等问题。兹摘抄几节来信，从这些字行间，是不难看出先生如何热爱和帮助青年的①。

---

① 文内所抄之信，都是先生给我的一部分信件，原信于抗战期间遗失，这一些是从拙刻《阿Q正传插画集》印本中抄出的。先生给我的信件，曾部分发表在河南《风雨》（范文澜等编）周刊上。

……河南门神一类的东西，先前我的家乡——绍兴——也有，也贴在厨门和墙壁上，现在都变了样了，大抵是石印的。要为大众所懂得，爱看的木刻，我以为应该尽量采用其方法。不过旧的是先知道故事后看画，新的却要看了画而知道或一故事，所以结构就更难。

……黄河水灾图第二幅最好，第一幅未能表出“嚎叫”来。《没有照会哪里行》倒是好的，很有力，不过天空和岸上的刀法太乱一点。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

……《呐喊》之图首页第一张，如来信所说，当然可以，不过那是“象征”了，智浅分子是看不懂的，尺寸不也太大了吗？

……《孔乙己》① 的图，我看是好的，尤其是许多颜面的表情，刻得不坏，和本文略有出入，也不成问题，不过这孔乙己是北方的孔乙己，例如骡车，我们那里就没有，但这也只能如此，而且使我们知道，假如孔乙己生在北方，也应该是这样一个环境。

有时我也向先生请教木刻家和木刻名作等问题，他也是不惮麻烦，一一详细答复。

……《The Woodcut of To-Day》（《现代木刻》

① 该插图共三十一幅，发表于当时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上。

——编者）我曾有过一本，后因制版被毁坏，再去购买，却已绝版了。Daglish 的作品，我是以英国的《Book—Man》新书介绍栏所引的东西，加以复制的，没有见过他整本的作品。Mefflet（梅斐尔德——作者）除《士敏土》外，我还有七幅连续画，名《你的姊妹》，前年展览过。他的刻法，据 Kollwitz（珂勒惠支——作者）所批评，说是很有才气，但恐为才气所害。这意思大约是说他太任意，离开了写实，我看这话是对的。不过气魄究竟大，所以那七幅，将来我还想翻印，等我卖出了一部分木刻集——计六十幅名《引玉集》，已去印。——之后。

……来信所举的日本木刻家，我未闻有专集出版。他们的风气，都是拚命离开社会，作隐士气息，作品上，内容是无可学的，只可采取一点技法。内山书店杂志部有时有《白卜黑》（《白与黑》——编者）（手印的）及《版艺术》（机器印的）出售，每本五角，只消一看，日本木刻界的潮流，就大略可见了。

バルバン和ハヌマツケール的作品，我也仅在《世界美术全集》中见过（见日本《世界美术全集》别卷版画篇——编者），据说明，则此二人之有名，乃能以浓淡，表现出原画的色彩来（他们大抵是翻刻别人的作品的）；而且含有原画上所无之一种特色，即木刻的特色。当铜版术尚未盛行之时，这种木刻家是也能出名的。但他们都不是创作的木刻家。

……欧洲木刻，在十九世纪中叶，原是画者一人，刻者又是一人，自画自刻，仅是近年来的事。现在来刻别人的画，自然无所不可。但须有一目的：或为了使其画流传的更广；或于原画之处，加以雕刀之特长。……

从以上的几段摘信中，就可看出先生对于教诲后一代青年是如何的耐心。今日木刻有了这样的发展，是和先生不辞辛劳的指导分不开的。先生这些教言，对我们是有力的鞭策，重温这些教言，是十分有益的。故写此短文，以纪念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八月二十四日

（原载《美术》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

于　伶

一、战斗的五讲

1．要见到鲁迅先生了

三十年代的北平，有一座古庙慈慧寺。外乡人不熟悉道路向行人问路时，若是说成了慈慧殿，也同样能被指点着可以找得到的。

一九三一到三三年间，这寺内大殿的前后左右有很多大间小间的房子象公寓一样的出租。当时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兼管华北几个省市的分盟或小组）有一个主力单位“呵莽剧社”（英文 Come on）就在这古庙内。有二十来位青年男女同志租着大小屋子住在这里。他们多半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从关外逃进来的东北流亡青年，也有“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后从日本被驱逐或自动退学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从事着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有“社联”的，有“左联”与“剧联”的，有“反帝大同盟”的，有共青团“少共”的，也有专干党的地下工作

的。记得有一位小郭同志，最受大家的尊敬，他是先烈李大钊的儿子。当时在门头沟的矿工中间做党的工作，不大回到庙中来住，偶然出现的时候，只见他虽然换过了服装，而鼻孔和发际却常常还有着乌黑的煤泥，经人提醒，他只憨厚的一笑，掏出手绢擦擦，从不多说多话。“呵莽剧社”在排戏演戏的同时，还以“呵莽艺术团”名义出版过《呵莽文艺》刊物。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前，我接到临时通知到慈慧寺等待一位同志。他将领我去会见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从上海到了北平了！这是非常震动我们的心的大喜讯。去北京大学二院和辅仁大学做了演讲。这事在革命组织和进步社团以及广大的青年学生中间热烈地传说着，大家热情地奔走相告与相互探询着。昨天在女子文理学院作了第三次演讲。而我今晚就要见到鲁迅先生了！这个幸福的通知，激动得我忘记了吃晚饭，立即赶往慈慧寺去了。

要见到鲁迅先生了。感着莫大的兴奋，同时也很紧张。无心进哪一间屋子去串门，只在院中的大槐树下直打转转。想象着今晚鲁迅先生会怎么样接见我们，他的音容笑貌。回味着读到过的他的作品，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

今天已经记忆不起这位来领我的同志是谁了，只记得他当时比我成熟也沉着得多。我默默而又激动地跟着他走了好一些路之后，在行人较少的途中他这才轻声地可是颇为激动地说了：“今晚，是秘密的集会。鲁迅先生只同意会见以‘左联’为主的一部分同志，只有‘文总’和‘剧联’、‘教联’等的少数负责人代表本单位也参加见见面。”这时，我就更意识到能够会见鲁迅先生的重大意义。因为鲁迅先生接连做了三次演讲，已经在广大青年中间激起了巨大的影响。鲁迅先生谢绝了一处演讲，同时也一概拒绝了他所不愿意见面的那些所谓教授与名流们的拜会和宴

会等应酬，已经引起了一些鲁迅先生素来鄙视的所谓“正人君子们”在“交头接耳、嘁嘁嚓嚓”了。当然也引起了反动统治当局的鹰犬们的嗅觉与注视。热爱党，尊重革命文艺组织，热爱青年的鲁迅先生，今晚也只能同意只跟少数同志见见面，秘密地谈谈话。

这样想着、走着，“忘路之远近”，我们到了后门。又遇上几位同志，一道到了台家——当时的后门五龙厅十一号。

2．难忘的一夕话

已经有十多位同志围着鲁迅先生在谈话了。因为我们进来而动了一下的场面，立刻又静了下来。鲁迅先生缓缓地继续了谈话。谈着“一·二八”上海闸北抗战时形形色色的情况，先生和许广平同志带着海婴逃出战火的惊险过程，以及关于传说先生在战火中受难的流言等等。一位同志激动地叙述了：当时这样的流言传到了北平，同志们如何到书店门前去等待上海出的文艺刊物，得到《文艺新闻》时，大家如何急切地寻找有否关于先生平安情况的报导，大家又如何写信到上海去打听先生安全的消息等等，表达了同志们的心情。鲁迅先生听着听着，没有说话，只是严肃地环顾大家，诚挚地微微点着头。这时，在客厅里异常静的气氛中，鲁迅先生微微点头的动作幅度是极小的，可是每个同志从先生的诚挚眼神里感受到的深情交流却是极其深重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不记得话题如何一下子转到谈高尔基了。我对先生报告说：平大法学院俄文系的“苞莉芭剧团”（苞莉芭是俄语“斗争”的音译）排练了高尔基的剧本《夜店》，也准备排练一幕俄文的原剧，打算在纪念高尔基文学生活三十周年的会上，同时演出。在“九·一八”周年纪念日之后，剧团的一切活动被反动派取缔了。《夜店》不能排演了。鲁迅先生说：他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好象也看到过关于《夜店》的消息。这时，一位高

嗓门的同志大声问先生：这次从上海来北平，是否是应苏联有关方面的邀请，到苏联去参加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参加苏联举行高尔基文学生活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因为当时北平文艺青年中间是这样在私下传说着的。记得鲁迅先生没有立即作答。只是平静地缓缓地说道："是有这传说"。大家正在等待着说下去时，被进来的人们打断了。

紧接着进来了好几位同志。这时到会的大约有二十多近三十个人。有三四位进步教授，其余都是青年，在秘密集会的场合和示威游行的行列中常遇见的同志们，大家分坐在三面，都是一个劲地看着一个人，一位在我们青年人面前这样庄严肃穆，而又如此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位平凡的却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伟人鲁迅先生！——这是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时，我朴素的幼稚的印象。以后，学习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正确评价，才真正认识到：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多少年来，每次学习着毛主席这段话的时候，每每掩卷静思凝想地回忆这次面对鲁迅的激动情境，沉浸在幸福之中，汲吮着鞭策我前进的力量。

一位"左联"的负责人也是"文总"领导人之一的同志走去跟主人台教授耳语了几句，转身致了开场白，就请鲁迅先生讲话了。

鲁迅先生刚换过了一支香烟——当时最普通最价廉的品海牌香烟、开始低沉地说："这回，是专为探望母亲的病来的。……近两天之内，做了三回讲演。前天刚谢绝了一处，昨晚倒又答应

了到师范大学去讲一次。今晚，决计不作讲演，随便谈谈。其实讲演也只是随便谈谈……。”

鲁迅先生极为扼要地谈了上海方面文化、文艺战线的斗争情况。关于创作、翻译、理论研究、出书、办刊物，以及几位左翼作家与朋友在“一·二八”战火中的遭遇与近况。这是对他的青年学生和战友的倾心交谈，娓娓谆谆，如数家珍，象磁石吸铁样的动听。一谈到“左联”五烈士的牺牲，鲁迅先生的声音突然变了，他深情地象致哀悼词似的为我们素描了他对五位烈士的印象，他们的战斗风貌和革命业迹。突然，象是为了摆脱一种沉重的压力似的，动一下身躯，从藤椅子里站立了起来。沉痛、悲愤地说：“他们五位被杀害了！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左联’失掉很好的战士，我沉重的感到，我、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记得当时在先生说了出自肺腑的“朋友”两个字之后，一位同志轻轻地随着发出了同志这两个字音。接着是一片低沉的唏嘘！鲁迅先生坐下了。沉默了。鲁迅先生是听到了或者感觉到了这位同志的声音，在等待他的发言；也是为了调整他自己的情绪，沉默持续了好一阵子。

鲁迅先生接着讲到上海反动派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迫害，禁书、扣刊物、封书店、捉书店老板，强卖他们豢养的走狗作家的狗屁稿子，强销他们的反动刊物等等罪行。还讲到所谓“第三种人”中的一些人乘机蠢动，幸灾乐祸，混水摸鱼，卖身投靠的种种丑态。对此先生以极端鄙视与蔑视的口吻，作了淋漓尽致，深刻独到，生动泼辣，维妙维肖的揭露。记得先生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年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反动派看到许多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反动书店门可罗雀，反动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

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鲁迅先生的算盘二字，是用颇浓重的绍兴口音幽默地讲的。在座的多数北方同志没听懂，没有反应。只有少数几个南方人笑了。先生又把这后两句再讲了一遍。这次在用普通话的同时，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头在左掌心上作拨打算盘珠子状，大家懂了，同声笑了。

先生的谈吐深刻、严密，有力而又生动活泼，句句吸住我们。渐渐谈下去，愈来愈强烈地发射出真挚的热情，又有一种严峻的强大的威力，从他瘦削的脸上透射出来。这是先生对于青年热切的爱抚与严格的要求。他自己很少笑，可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却从他揭露反动派和所谓"第三种人"作家中一些人的丑恶表演时，逐渐被他的话引出笑声来了。大家的笑声都很短促，可真是笑得深。笑声短，想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心情，怕会耽误或者深怕失去听他接着说的话头。大家是贪馋地想能多听到一点的缘故。

鲁迅先生关心地询问了北平的文艺运动状况。"左联"一位同志作了简短的汇报。鲁迅先生显然是从他的知友进步教授们和昨天跟他联系过的"左联"同志处，了解了许多北平文艺战线的实际情形的。他的插话与随时发表的一两句指导意见都极中肯、有针对性，每是一语点醒，片言指迷，解决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接着他环视了一下，问起对于他所作的三回讲演的意见来了。问得极真挚极恳切，倒把大家给问住了。静了一会儿，同志们才说了些意见。有人提了无产阶级文学方面的问题，有人提了希望与要求，要求在师大的讲演会上多谈谈。先生听了这些话，思索着说："呵，既然这样要求，那我明天的讲演里，必须把'泥腿文学'这层意思讲进去了。"……有人没听懂"泥腿文学"这

句话。先生用手在他的黑帆布树胶底鞋(当时叫“陈嘉庚鞋”)上下比划着，重复地说：“泥腿文学，或者说草鞋文学，总之不是皮鞋文学。”

夜深了。先生毫无倦意，兴致勃勃。主持会议的同志站起来说了明天后天先生都要作演讲，请早休息，并代表大家致了说不尽的感谢之忱。大家依依恋恋地对先生鞠着躬，散了。先生和台教授曾走到大门边，微笑点头，送大家走的。

古人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样的美词。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之夜，鲁迅先生对北平文艺青年教诲的一夕话，是我们读二十年书也学不到的。我的回忆所及记错的遗漏的，一定有。经过了四十五年漫长的革命战斗历程，这次见面我忘不掉。谨铭记下对鲁迅先生缅怀与感激的深情！

3．战斗的五讲

这是鲁迅先生在北平的第四回讲演。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师范大学的大门口贴有公布鲁迅先生演讲的大通告。所有过道的转弯抹角处，都贴有画着走向大操场的手指或箭头。大操场挤满了站着听讲的人群。到迟了的只能站得远远的，仰望着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

这第四讲，是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主办的，真正的公开演讲。听众除了师大学生与部分教师之外，更多的是北平各个革命文艺组织的成员。“文总”领导下的当时八个联盟的盟员从中起着组织和维持秩序的作用。热烈的盛况是空前的，秩序之好也是空前的。

这是一次北平文艺队伍的大检阅。我们的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以他极大的热忱，以威严凛然而又温文亲切、从容安详的战斗雄姿，检阅了这支奋战在北国的文艺部队。每个战士以自己受到鲁迅的检阅为光荣，得到力量，怀着更坚定的战斗决心回去。把既是严师是长者，同时也是革命文艺青年的亲密战友的鲁迅形象，铭刻在自己心之深处。

第二天的北平各种报纸上都刊登了鲁迅先生这次露天大讲演的新闻与照片。多少同志特地买了报纸，珍贵地保存起来。（文物出版社1976年精印的《鲁迅1881—1936》照片集里的74、75、76三幅，当年曾在报纸上刊出过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鲁迅先生到中国大学作了第五回讲演。

昨天的师大露天大讲演是一次秩序井然的文艺队伍检阅。今天的中大第五讲的阵容却有点乱了。由于前四讲下来，尤其是当天报纸上的新闻和照片的普遍登载，轰动了全城。风声愈大，听众愈多，群众之中也就混杂进一些反动分子捣乱来了。作为会场的礼堂里早已挤满了人，大门口、窗上窗外全都站满了，还在人挤人地涌来，露天空场上的人更多。临时扛来了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扶着鲁迅先生站上去讲了。这回的题目是“文艺与武力”。一报题目，就是震天的掌声。正式开讲后，留在礼堂里的人们听不见，窗口上与过道中人群也听不清，发生了吵闹喧嚷的声音。在场的绝对多数人是真心爱慕鲁迅和真想听到先生的声音的。经过多数群众的努力，有点乱的秩序终于平静了下来。鲁迅先生讲完了话。这回讲演的时间较短，事前先生对有关的人说定只讲二十分钟。事实是半小时还多。宣布结束之后，听众不肯散开，先生不容易走出去。组织上是事先做好准备，动员了同志暗中紧紧地保卫在鲁迅先生周围。我也是方桌子边上

的纠察之一。我们好容易才护送鲁迅先生出了校门。听众中间有人被反动派当场捕去了。事后，中大有人继续被捕。

鲁迅先生是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到北平的。二十二到二十八日这七天之中，一个晚间接见了“左联”等革命文艺组织的代表，四天做了五次讲演。

北平五讲，是鲁迅先生在北平做的五次大战斗。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之后，因为有同志被捕的事，一时纷纷传说鲁迅先生在车站、有的说是在火车上，也遭到了反动政府的暗算。广大文艺青年之间曾激愤地主张散发抗议的宣言，有的主张要举行示威游行来抗议。后来从周老太太处得到准确的消息：鲁迅先生于十一月三十日平安回到了上海。大家这才放下了心。

三三年春天我在上海听到王尘无同志讲过：三二年十二月的一次上海“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开会的席上，执委们因为鲁迅先生在北平做了战斗的五讲，茅盾同志创作完成了《子夜》这部巨大著作，曾经对他们两位表示了敬意与慰问的。尘无当时是“左联”的执行委员之一。

鲁迅先生回到上海之后，对当时上海文坛的三个丑类作了有名的三嘘。

三三年夏天，尘无同志为一家熟人的书店编辑了一个小册子《鲁迅的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这时尘无为了写“影评”，领导“影评”工作，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剧联”来了。这本《五讲与三嘘》未及出书，就在印刷所里被反动派把稿子抄去了。现在距离“五讲三嘘”的年代久了，要搜集当时较完整的文字材料就很不容易了。

4．四讲、五讲和答问

最近，得到“鲁迅研究室”同志的帮助，寄给我《鲁迅研究资料选编》。关于四讲和五讲的部分内容，我摘抄在这里，以便不

容易读到选编的同志们能看到。

在师大的四讲的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内容大意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应该从五四的时候讲起。那时胡适之、陈独秀穿了皮鞋、西装踏进了文艺园地。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要独占文坛。但时代的车轮没有停止运转。不料三、四年前，另一种泥脚的工农，劳苦大众，也踏进了文坛，并且与他们起了激烈的斗争，这些皮鞋先生就成了新兴普罗文学的反对者，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他们说左翼作家是被卢布所收买。胡适完全卖身投靠买办资产阶级，陈独秀如今也骂农工是'土匪'了。但是他们跟五四运动时期的敌人一样，是也要灭亡的。铁铸般的事实能够将诬蔑和谣诼击得粉碎。因为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旧文艺的保护者只得改换了策略，于是貌似不偏不倚，伪装'客观''中立'的'第三种人'就应运而生了。他们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现状的情形怎样，所照出来的也怎样。其实这话是不对的，即使是一面'镜子'罢，它所照的，也会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因为阶级的地位不同，每一个人的这面'镜子'早就涂上了自己的颜色，他怎能超阶级呢？他们又说文艺是属于未来的，要创造为将来的永久的文学，象托尔斯泰那样。这话也不对的，托尔斯泰写东西时，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如果他创作的时候脱离了现实，他的作品到现在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他们又把第三种人的搁笔，归咎于左翼'严酷的批评'，说他们要写东西，可是被批评家骂回去了。这也是不确实的，批评家并无生杀予夺之权。他们写不出象样东西的真实原因，是在于离开了群众，是在于本不是'第三种人'，也做不成这样的人。"

"鲁迅又指出，新兴艺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甚么方法也阻拦不住的。目前的时代，已不是'皮鞋脚'的时代，而是

‘泥脚’‘黑手’的时代。我们要接近工农大众，不怕衣裳沾污，不怕皮鞋染土。”

鲁迅讲毕，又被群众拥入学生自治会休息。大家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愿望和疑虑不清的问题。鲁迅便跟他们亲切交谈起来。有人说：“今天大家为瞻仰您的丰采……”。鲁迅幽默地答道：“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可以。”有人问：“先生留在北平教书吧？”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有人请求：“再在我们这儿公开讲演一次吧，北方的青年对您太渴望了。”鲁迅说：“大家盛意可感，我努力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演说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还不挨挤。”有人问：“周先生住在上海感觉怎样？”鲁迅说：“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有时无影无踪，使敌人扑空。”有人还问：“先生对陈独秀怎么看？国民党为什么要在前不久逮捕他？”鲁迅义正辞严地说：“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国民党逮捕他，并不是要杀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组织一个合法的党，跟共产党进行斗争。”

……

鲁迅在中国大学做的第五讲的题目为《文学与武力》。

大意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是劳苦大众的文学。旧文学只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产物。所以二者形成对立的趋势是必然。旧文学是注定要灭亡的。但统治阶级竭力要来消灭新文学的勃兴。从中国上古以至今日，从世界以至中国，进步的言论和文学总要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抑迫害。他们先是用武力征伐，继而用风花雪月之类的低级趣味文学麻醉人民。但由于文学是社会的，有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文艺自然不能引起大众共鸣。麻醉法不成，统治阶级只好又用武力。所以

有许多致力于新文学的进步作家遭到了杀戮或拘禁。不过，反动派的暴行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消灭，虽然它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先驱者的鲜血必将在新文艺的园地浇灌出更多的烂熳的花来。”（以上摘录自陈漱渝《以共产主义者的姿态屹立在北京》）

鲁迅在北大二院的第一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在辅仁大学的第二讲的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在平大女子文理学院的讲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第一、二篇讲词，经过鲁迅补正，收入《集外集拾遗》。

二、鲁迅对一次话剧演出的批评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国最早翻译的《俄国戏曲集》十种中的译名是《巡按》，从一八三六年开始上演到一九三六年是一百周年。苏联于三五年秋天的戏剧季节中间，各地的大剧院和业余剧团以及木偶剧院都先后演出这个剧本来纪念它的上演百周年。同时，欧美和日本的各个进步戏剧社团也都在纷纷上演这个著名剧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开始在“金城大戏院”（现在的“黄浦剧场”）演出《钦差大臣》这一著名的讽刺喜剧，以沙皇黑暗统治下的地方官僚群丑们的丑恶行为来影射暴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种种罪恶。这个“协会”是“剧联”领导下的群众性业余戏剧组织。它是经过了三三年与三四年间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对各个进步剧团以及工人“蓝衣剧社”的残酷压迫，经过了三五年年初时江苏省委和“文委”与“文总”的大破坏之后，于三五年夏季才重新组织起来的。它团结着当时上海的广大进步戏剧工作者，开始运用“演外国戏剧名著”作为演出方式之一，来进行演剧战斗的。

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写作“上海业余剧社”的这个团体，一般简称“业余”。

这次《钦差大臣》演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钦差大臣》开演的十一月正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前夜。十二月中旬之初，它搬到“老中央影院”去复演时，上海复旦等大学的爱国学生已经冲到北火车站去游行集会，响应北平的“一二·九”运动，被反动军警包围住了。演完戏卸了装的演员职员，有的立即赶到北站去，深夜支援革命青年学生。

《钦差大臣》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中演出，它还有三个具体的意义与作用：一是苏联和欧美日本都在纪念它上演百周年的国际意义。二是戏的内容辛辣地讽刺与揭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与没落的作用。三是话剧运动在遭到大破坏之后的再集合中的另一种姿态与方式的再进军。因此这次演出得到了上海进步文学艺术和新闻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与深切的关怀、鼓励。刊物与报纸上的介绍与评论文章比较多。这些给予所有演剧工作者以极大的兴奋与鼓舞。以至扮演县长的演员过分激动了，第一天两场戏就叫哑了嗓子。

鲁迅先生的戏票，是事前就商量着托人转送去了的。可是先生会不会和可能不可能来呢？连负责送票的人也没有把握。

十一月三日，星期天，下过小雨的晚上。负责暗中联络的同志却悄悄地可又激动地来告诉了一个好消息：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同志来看戏了。我们是又兴奋又担心：先生能来看戏是我们所极盼望极感激的。可我们更关心他的安全！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鲁迅的处境与行动，安危所系是重于泰山哪！可是先生冒

着很大的危险来了，还来得这样早。楼下池座中才到了七八十个观众，楼座的顶灯还没有开。鲁迅先生已经在楼上第一排左面靠中间的第一个位子上，安静地坐着了。这样情景中的伟大形象，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非常激动人的！

我们立即在戏院门口、过道、池座与楼座中间，布置了暗中的联络与纠察人员，注意可能发生的动静。深怕这消息传开了不利，没有对后台的演员、工作人员传达。可是已经有三四个“机灵鬼”得知了，同志间用眼神、微笑，或者做着手指抹胡须的小动作，暗示是鲁迅老人，在相互激动地幸福地交流着喜悦的心情。许秉铎（当时是地下党员）被指定了摆脱开当场的后台工作，站在台角的幕后可以看得清楚楼座的角度，自始至终看着鲁迅和广平先生。事先就考虑到：送给先生的票子的左右与后一二排的票子，是送给团内有关人员的一部分赠券。

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许秉铎写的记忆文章中说：“……我也觉得，我的责任很重大，老是在自己想念着，万一我看到了什么意外，我将怎样办？”

许秉铎接着回忆道：“戏在进行中，先生的注意是十分集中的。观众在笑，他有时也微微的笑一笑，有时也不笑。有时观众不笑，他反而笑了。但这只限于微小的面部表情，很少形体动作。我记得在全剧进行中，仅有两次较显著的反应：一次是第三幕县长到小旅店中去拜访假钦差，假钦差将皮鞋提在手中手足无措地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县长被吓了一跳。另一次是第四幕假钦差受贿，那些官员们的丑态……，他是笑了，比较显著的笑了，而且耸了耸肩。我在距离四五丈远的地方，好象也听到了轻微的笑声。”

“鲁迅先生的反应为什么这样的冷静而‘与众不同’呢？我想主要的是先生对果戈里的讽刺的理解比我们深刻。”

"散场时，他是等楼上前排观众离开座位才起身的。我看到他很快的从人多的一个太平门走出去。"

"这是我的一次对先生的最深刻的印象，二十年后仍是鲜明地印刻在我脑际。"（引文见上海《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十月号——作者注）

散戏之后，我们托丽尼转去了一页便笺。对先生来看戏给予大家的关怀与鼓励，表示极衷心的感谢。恳切要求先生对演出给予批评。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改造与提高演出质量的教育。

鲁迅先生托他带来了看过《钦差大臣》之后的意见，首先肯定了这次演出的意义和成就。对于批评，转述说：第二幕剧中假钦差大臣所住的小旅馆房间的门应该是朝里开的，所以躲在门外偷看的无事乱忙的两个丑绅士陶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是刘一民同志和殷秀岑演的），你挤我轧地抢着偷看时，这两个宝贝才会一不留神地跌了进来，扑倒在地上，显得如此狼狈。如果门朝外开，则是决然跌不进来的了。这是关于舞台装置方面的批评。在人物性格的理解和处理方面，鲁迅先生指出：愚蠢而自作聪敏的傻仆人是俄罗斯文学中底传统形象。这次扮演沃西普的演员把这位假钦差的仆人演得过于聪敏机灵了。再如：县长的妻子安娜必定是个丑妇人，所以她跟女儿马利亚在假钦差赫列斯达可夫的面前争风吃醋起来丑态百出，才更有喜剧的效果。而这次演出却采取了俊扮。那就和作者的原意有出入了。并说：这不仅是关于演员的服装和化装等的设计问题，是对于剧本的理解不正确的问题。谈到服装，先生指出可以参考《死魂灵》插图中的绘画。务必不能走样。

鲁迅先生对这些缺点的指出，严格要求和热忱帮助的批评，如此深刻而又如此细致具体。从原作剧本的理解，人物性格的处理，到舞台布景、服装、化装的设计，他概括而扼要地都谈到

了。鲁迅先生给了我们以具体的指导和深刻的教育。演出得到了改进。

鲁迅先生对这次话剧演出的严肃的批评，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依然是难忘的温暖和极大的鼓舞！他对戏剧艺术与演出工作这样热忱爱护的心情，他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负责批评的精神，深深地一直鼓舞着我们前进。

后来，我得到了鲁迅写了《小引》，“三闲书屋”翻印的《死魂灵百图》。稍后，我又得到了一本俄文原版的《钦差大臣1836—1936》。这是一本巨型而豪华的画册，集一百年内《钦差大臣》演出的舞台美术的大成。从旧俄到苏联各个时期、各个主要剧院、各著名导演与演员、各种不同风格与流派，所演出的各次舞台剧照。以及各种风格流派的舞台装置设计图，服装设计图，演员造型设计图和单人剧照等等。大部分是黑白的，也有少部分是极精美的彩色的。

得到了《死魂灵百图》和《钦差大臣一百年》这两本宝贵的画册以后，我们再演俄国古典戏剧时，就得到了借鉴与参考，使得我们的舞台艺术比较地能够少辜负一点鲁迅先生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鲁迅先生战斗在上海的十年中间，观看话剧演出，我所知道的这是唯一的一回。弥足追思的一次。我遗憾竟不能够回忆得更多一点！

三、最后的一次见面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下午，我和张西曼教授同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去看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张这时在上海忙着组织人翻译普希金的诗、剧、文稿，编辑出版“纪念普希金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厚大的一本），又热心着奔忙找人发起建

立“中苏文化协会”。

一走进展览大厅，就看见鲁迅先生在几位青年木刻同志簇拥下，兴致勃勃地看着低声谈着。我正思索着在这种场合这样情况下，是否上前去打扰先生？张教授却奔上去跟先生打了招呼问好，并转身来介绍我了。我对先生鞠了躬。先生对张低低说了声：认识，认识的。

木刻同志中的陈烟桥连忙折近我身边，警惕地小声问我：这是谁？我也小声地说：张，从前北大的俄文教授。烟桥这才放了心。可我倒不能放心了。因为我知道张这人，性好讲话，常是一厢情愿地说个没完，嗓门又是特别高。大概是多年没见到鲁迅先生了，此刻显得很兴奋的样子。我深怕他拉着鲁迅先生大谈起“中苏文协”与“普希金”等等来，那末大庭广众，情况复杂，怕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安，对先生的安全也不利。我急忙对烟桥讲：领先生去休息吧。同时对他作了个暗示。他懂了，急忙与别的同志一齐稍带勉强地扶着鲁迅先生进入较小的一间里去休息了。

和张教授看完了展览品，临走时，回望鲁迅先生被一群青年木刻同志围着坐在藤椅里，安详慈爱地跟眉飞色舞的青年倾谈着。

这次是偶然的会面，万万没想到竟会是我跟鲁迅先生最后的一回见面。成为天上人间的永诀！

十月二十日清晨，和凌鹤同志一道，奔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

默哀在先生灵前，想着十一天前，八仙桥青年会匆匆的一幕，想着内山书店里的几次见面，想着请教关于苏联文学问题时的教导，想着工作上的接触，想着对《钦差大臣》的批评，想着北平的见面和一夕话，想着……

广平同志携着海婴走近来了……

凌鹤和我，随着广平同志上了楼。想对广平同志表示哀恸的慰问话吧，可是我竟说出了北平第一次见先生这几个字，哽咽住了。

广平同志一字一顿地讲了先生的病。摄影记者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

下午和二十一日下午，我带着“正风”剧社的青年和“正风”中学的学生，两次到灵堂行礼。

二十二日下午，在殡仪馆的人群中，遇到泣不成声，咯着血的尘无同志。在一万六千人的行列中，送往虹桥万国公墓。……暮色苍茫中回市区的路上，久有肺病得不到治疗的尘无，支撑不住了。凌鹤与我扶着他走。走着走着，尘无要求坐下来休息时，吟了一首律诗：

哭鲁迅先生

即用先生《无题》诗韵

为主为奴此一时，
中原北望乱如丝。
人群久已推光焰，
文阵而今折大旗！
病里颇闻仍执笔，
刀丛犹记独吟诗。
“热风”“野草”分明在，
读罢遗编泪满衣！

“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我们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郭沫若同志在会上做：“大哉鲁迅！前无鲁迅，后无

鲁迅。鲁迅鲁迅，千古一人！”的纪念讲演声中，尘无因病去世了，才二十八九岁。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经过翻天复地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在党领导下做了中国的主人。尘无这首“为主为奴此一时”那样在日军侵略下的诗，我在幸福的生活中，早就忘得无影无踪了。今天回忆鲁迅先生时，偶然在一堆被“四人帮”抄家抄剩下来的烂书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破烂了的三十年代的《电影·戏剧》月刊（36 年 11 月号）里，又见到了它，忆起了四十年前“哭鲁迅先生”的情景。

写到这里，我愤怒地说：“四人帮”这帮“汪达尔”人！实行了“汪达尔主义”毁灭文物文化的野蛮手段。江青、张春桥等怀着企图毁灭他们三十年代历史罪证的罪恶杀心，到底毁灭不尽他们妄想毁灭掉的东西！

附记：一九五六年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我在病中写了《初见鲁迅先生时》和《回忆鲁迅先生对一次话剧演出的批评》两篇短文。这次出版社的同志为我找了出来。谨补充重写如上。

七七年七月七日。

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

木　将

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曾经到北京（当时叫北平）作过五次讲演，那就是有名的“北平五讲”。我曾有幸听过他的讲演，也看见了讲演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所谓“北平五讲”，是与“上海三嘘”并提的。

“北平五讲”，是先生于七天内在北平五个大学的讲演。据现在的记载是：在北京大学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在辅仁大学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以上均为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二十四日），在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二十七日），和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二十八日）。这五篇讲演，前两篇经先生修改收集在《集外集拾遗》里，其余则全遗失了。据先生说：“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想来，许是当时听讲者将笔记整理印出的，现在也找不到了。北平五讲之后，上海方面就盛传先生有《上海三嘘》之作。所谓“嘘”，就是轻蔑、鄙视地以口作声的驱逐，如“嘘狗”。据先生说：“那时是在一个饭店

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实际“三嘘”并没有作，“走散了就算完结了。”（见《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但这传说的“三嘘”已经使一些旧世界的“沉滓”们惶恐万状了。“文坛小贩”、自首变节分子杨邨人，就曾诚惶诚恐，请求先生不要“嘘”他。至于实实在在的“五讲”对当时社会的震动，就可想而知了。

提起“北平五讲”，我就想起了那个纷扰、混乱、苦恼的年代。

头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了，北平就站在了国防的最前线。这年春天，南方的上海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一·二八”战役，全国陷入了紧张与悲愤里。北平的反动思想界、文化界，同全国反动的思想界、文化界一样，是乌七八糟，一片混乱。有人打着“新史学”的招牌，扬言经过确凿的考证，证明岳飞是“军阀”，秦桧是“能臣”，金兵南下完全是赳赳武夫的岳飞不明大局引起来的，而且把这种“见解”写在教科书内，到处宣讲。有人又说根据新的史料，证明“五四”时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打是“冤枉”了的，他们三人都是“尽忠谋国”的。文化界还成立了“东方文化协会”，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为日本帝国主义写稿，只做五百字的中国古书提要，就可以得三十元钱的酬劳；还专门组织青年利用寒暑假到日本旅行参观，旅费完全由日本人出，足吃、足玩一个月，回来时每人还送一套西装。这些人都大谈日本文明，日本尊重文化，日本富强，宣扬民族自卑感和“中日亲善”。各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日本的特务学生。街头上出现了日本浪人。市场上到处都是日本货。还有专门为毒化人民而设的烟、酒、赌、娼寮的“大旅社”、“大同社”。日本的宪兵可以在市内逮捕任何人，而政府的文告却写着“侈言抗日者，杀！”

现代评论派的“学者”和“作家”，这时也大肆叫嚷着：

“发现一个字的古义，如同发现一颗恒星。”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他们也谈文学，但谈古不谈今，“为艺术而艺术”。

在这里，我想起杨沫同志在《青春之歌》里所创造的余永泽这个形象来了。一点也不错，有些人为了吃饭、职业和向上爬，都拜倒在“我的老师”、“我的朋友”胡适的脚下。

知识的渴望，人生的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国家的前途，……萦回在青年们的脑际，成为青年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在这种气氛中生活着。有的在“新史学”里钻了一通，有的游泳在“国故”里看不见彼岸，有的沉浸在“东西哲学”中，有的在研究康德、杜威和白壁德。钻着钻着，感觉到不是味儿了，大家怀疑起来了：我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呀?!

就在这纷扰、混乱、苦恼之中，我们记起了先生。先生的出走厦门，先生的转战广州，先生的战斗在上海，更增加了我们对先生的信任。“该回来看看你抛别已久的学生们了！该看看你工作过战斗过的北平了！”我们都在心头默念着先生。……

而先生，就在我们默念中来到北平了！

应该感激党的安排。先生的来到北平，先生的几次讲演，都是在党的有计划的组织之下，在先进的人们的期望和保卫中进行的。使我们感激的是，在我们困顿中，先生伸出了同情的援助之手；他每次的讲演都那么及时，针对时弊，绕过了反动派阻拦和破坏的暗礁，闪耀着无产阶级崇高的智慧和艺术的光彩。五次讲演合起来，真可说是一部辉煌不朽的政论。

遗憾的是，这五篇讲演辞，现在只剩下两篇了。但，即使只这两篇，也充分体现了“五讲”的锋芒，显现了属于“我们的”的骄傲。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是第一次讲演。在这个讲演里，先

生概括地从本质上揭露了反动的文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学术研究”、“整理国故”和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的骗人的勾当。他明确地告诉青年，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有供他们自己利用的反动文学，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那些忠顺的臣子和奴仆，总是要为主人效力的，倘若无“忙”可“帮”，他们就要“帮闲”。无论“帮忙文学”或“帮闲文学”，它们的实质都是“官僚文学”。这就使我们认识到那些反动的“学者”们原来向我们推荐的是这种货色，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是上了他们的当了！

但是，根据先生的意思，问题不在于过去历史上有这种“官僚文学”，重要的是这种流毒当时还大量存在，并极为猖獗，“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者便是。先生指出，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是毫无反抗性的，“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而其实质，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经先生揭穿了这些“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者们的卑鄙下贱的肺腑，使我们明白了：先生所讲的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于青年们的道路问题。

必须承认，象胡适们所散布的“整理国故”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谰言，象余永泽这一类型的人所走的可耻道路，当时对青年们来说，是有其欺骗性与麻醉性的，这是我们进步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障碍。听了先生的讲演，我们很多人都如梦初醒，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来了。我们过去是一直在欺骗和蒙蔽中生活。先生的讲演，使我们清醒过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应走的道路！

走什么道路？因势利导，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先生又作了第二次讲演。

《今春的两种感想》是讲的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但他不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他从侧面迂回着讲，讲两种感想；这两种感

想你听懂了，那么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你自己就可以作出答案来了。这两种感想是：第一，他说青年们做事太不认真，凡事说说算了，而不认真去做。因为不认真去做，所以要吃亏。于是他举出抗日问题作为例子，说他们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而“并不一定抗日”，成立了“学生军”，也只把操衣“放在家中”，并不操练，然而一旦被日军查出，却是“必定要送命”的。这是一层意思。更进一层，他指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另外那些人身上。但他不这样说，他只是说他们也太不认真。我们知道，青年人太不认真，是认识不清，另外那些人太不认真，这就是欺骗了。用先生的话说：“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相，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把这两层意思合起来，另外那些人不可靠，可是青年人自己又太不认真，那么该怎么办呢？这里先生没有直说。但是我们都在心下明白，那就是：一，要坚持在国防最前线，坚持抗战；二，要“韧性”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包括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下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自己的道路了。第二种感想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这是指示青年们要注意现实，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但先生又不直接说，先生只讲我们有两种缺点，就是：“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关于这，先生有许多阐发。我们从这些阐发中又看见了自己：我们有些人只对自己身边琐事有兴趣，再不就谈什么巴黎伦敦，月界天边，宇宙哲学以至于灵魂有无等等，而对于社会问题，却不注意。这就是我们的致命弱点。怎么办呢？先生没有直说，但每个人都可由此作出结论，那就是：注

意社会问题，参加现实社会的斗争！而这，同上一篇讲演，就接了榫了。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揭破了当时北平学术界的诳骗，指出他们的主张是麻痹青年，压制青年，要青年脱离现实社会和斗争，好让日本帝国主义来宰割。《今春的两种感想》则进一步指出青年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中外反动派坚韧地斗争下去，这就是先生常说的要把它们“一口咬住”，同它们“韧性”地周旋下去。

这就是我们对两篇讲演的理解。

其他三篇讲演，也都是这样地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同时又是艺术地为青年们作出了诚挚的、中肯的指引。

我们从这些讲演里认识了敌人，认识了北平反动学术界的真面目，认识了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怎样作人，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走什么道路，已经提到了日程之上，每个人开始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我们看见了祖国大地的沦亡，我们感觉到自己是辗转在这危城而不自知。我们悲恸，我们愤激，我们流出了激动的热泪。好象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召唤我们：“青年人，起来！起来！”

七天，仅仅是七天，北平青年的心，有如烈火一般燃烧起来了！

在辅仁大学的讲演，我是听过的。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大约三点钟以后了，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要我去听一个讲演，我没问讲演人是谁，便同他一起去了。我们匆匆向辅仁大学走去。路上，不时碰见和我们一样的三三五五的青年人。到辅仁大学的大礼堂时，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只听见有人咳嗽，但没有人说话。静极了。这样的气氛使我感到温暖。一下子好象全屋子里的人都亲近起来了。这是反动派长期施行

政治高压的结果。当我知道讲演的是先生，并且当先生出现在讲演台上的时候，大家都激动起来了。但人们都了解北平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大家又为先生的安全耽心起来。先生的活动，当时的反动政府是不许可的，因而这个激动不是欢呼，也不是掌声雷动，而是把全身心都集中在眼上和耳朵上，注视着先生，听着先生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象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地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

讲演只一个钟头便结束。当我们离开辅仁大学大礼堂时，我看见一群群一簇簇的青年人都来了。他们都是听说先生来讲演，临时冲出学校赶来的。

“鲁迅先生讲完了吗？”

“鲁迅先生到哪里去了？”

他们急促地问着，深为没听到先生的讲演而悔恨着。从这天起，北平的青年都知道先生来到了，他们毅然冲破了反动当局的封锁，追随在先生的周围，谈论着先生的讲演，而先生也就成天忙碌地生活在群众之中了。

这以后，先生的每次讲演，会场都被青年人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反动军警也被青年学生们赶跑了。尤其在师范大学讲演的一次，更为出色。这个讲演原打算在风雨操场举行的，但因为人来得太多，临时改在大操场。不久，大操场又容纳不下了，靠近大操场的教室大楼、巷道、宿舍、院子，以至校门，都站满了

人。后来，连整个师范大学所在地的和平门外、南新华街，都拥满了青年人，使交通都断绝了。同学们都要听先生讲话，但听不见。听不见，看看先生也好。但又看不见。先生讲过后，大家你推我挤，有的要看看先生，有的拿着纪念册请先生题字留念。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一片青年人的海洋！一片人声的波涛！

北平城里的反动政府和它的文化界，呈现出一片惶恐和紧张。记得有一次，同学们在北大三院集会。胡适忽然来了，他和往常一样，威风凛然地说：“不要胡闹！”但不约而同，一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口号发出来了：“打倒胡适！”他只得夹起尾巴逃走了。

这以后，由于党的积极领导，由于先生的启示，广大青年学生从欺骗与蒙蔽中惊醒起来，向着进步和革命的方向转变。在“一二·九”运动中，很多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和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

我们常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思念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感激他在那样恐怖的气氛中，亲临危城，为我们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启示我们应走的道路。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于西南师范学院

（原载《四川文学》一九六一年十月号）

景云深处是吾家

——《鲁迅回忆录》补遗

许　广　平

回忆实是苦恼的事，因为事隔多年，脑海的印象自然就会模糊起来，免不得要做一番研究工作。

我于九月十七日收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封信，询问鲁迅在景云里曾住过几处房间，搬过几次场等。纪念馆同人一向积极负责，留心各项有关纪念事迹，严肃细致地考核历史事实，不遗余力。这次既承垂问，不敢潦草塞责。于是一面向各方亲友邻居仔细探听，有无一些唤起记忆、可资参考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向周建人夫妇请教，因为一切经手事项都是烦劳他们的。凑巧九月底我随人大代表团去越南，直至十月中旬才回到北京。当时就看到周建人夫妇在九月三十日从杭州发来的一封信，答复和我的记忆是一致的。这才去掉了一切怀疑。

周建人夫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们第一次住在景云里石库门的朝南房子第二排的最后一幢，与大兴坊接连，是 23 号；第

二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二幢，是 18 号；第三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一幢，是 17 号，可是出入在 18 号”(见附图)。

住在景云里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小情节可资记忆的。但因事非重要，写回忆录时就略去了。如今既然有人关心，不妨写些出来，聊供研究之助。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和我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内，建人先生天天来陪伴。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乃与建人先生商议，拟觅一暂时栖身之所。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务印书馆作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的如茅盾、叶绍钧(当时一般用此名)，还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 23 号居住了(后来让给柔石等人居住)。

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在悲愤与仇恨交集的心情下来到上海。怀着对叛变革命的新军阀的警惕和蔑视，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所以购置家俱，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没有用工人，吃饭也和建人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们在一起。

景云里的 23 号前门，紧对着茅盾先生的后门，但我们搬进去时，他已经因国民党的压迫到日本去了。留在他家中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夫人及子女等人，好在叶绍钧先生住在近旁可以照应。再稍远处，还有建人先生等一批长久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在这许多人环绕之中，我们就暂作安身之所了。

不料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我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窜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伏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 23 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小洞，煞

是厉害。结果自然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 23 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径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自从我们搬到 23 号之后不久，鲁迅又向建人先生建议两家合伙烧饭，以免和同事们一起诸多不便，一切柴、米、油、盐等杂务，托王蕴如同志的一位亲戚兼管，就在 23 号楼下煮食。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 23 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 18 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 18 号内，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计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 23 号共住十一个月。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

在 18 号，鲁迅和建人先生怡怡相处了五个多月，深感建人先生相助之忱。蕴如同志在上海久居，一切事无大小，俱获她竭诚相助。鲁迅在这个时期，算是和兄弟怡怡相聚、朝夕相处的最

快活的日子了。

忽然，听说隔邻 17 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到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当时正在粉刷，并拟在 17—18 号之间，打通一木门，为图两家往来方便，就从 18 号出入，正在计划之下，17 号因还没人搬进去，被偷儿乘隙破门守候了一夜，准备来到我家行窃，我们却毫无所知。鲁迅因夜眠甚迟，有时开亮后楼的灯，去烧水煮茶；有时开亭子间的灯，去如厕；这样竟夜之间，陆续不断，四处通明。到了三时以后，鲁迅正在临睡前漱口，偷儿却以为是人起床了，动手不得。大忿之下，撒满楼梯的粪便，失意离去，而我们却安然无恙。事后，鲁迅笑着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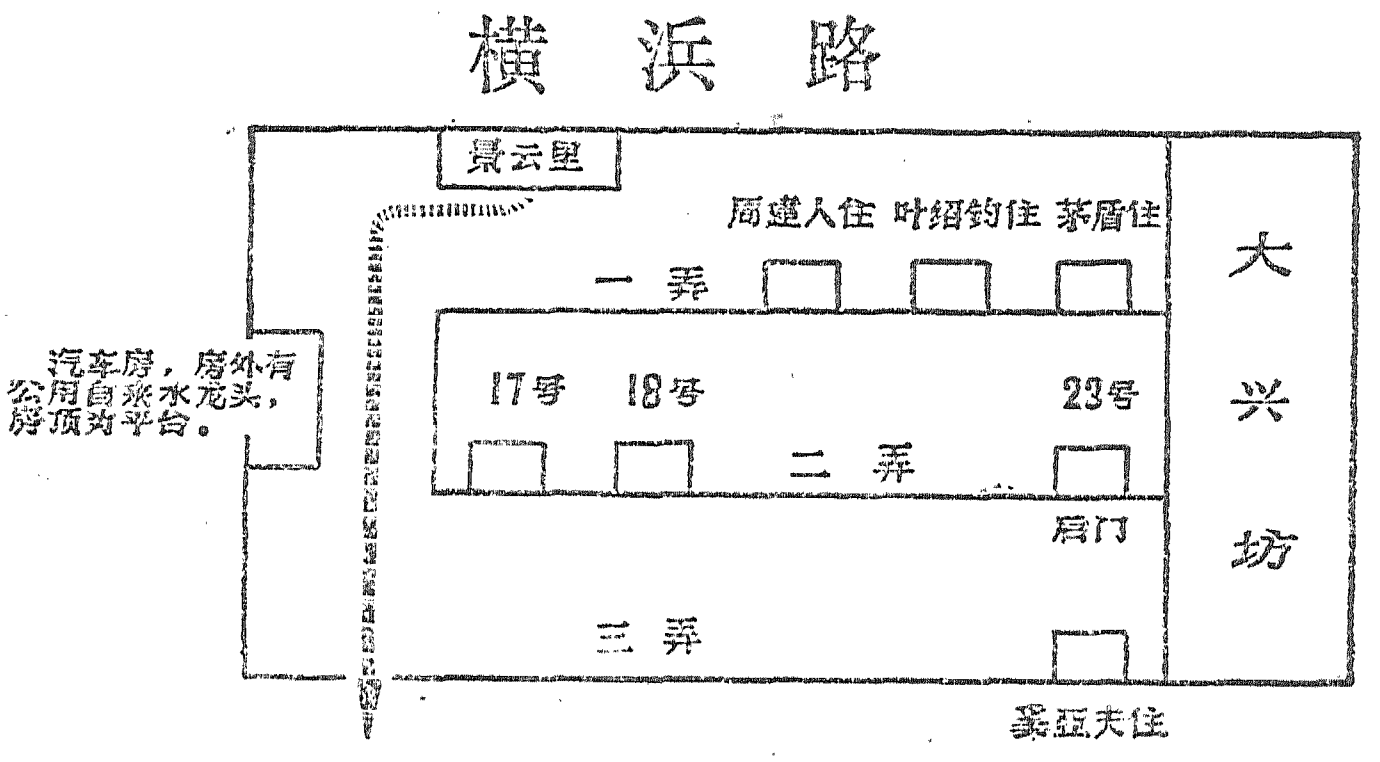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二月，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这时我们虽然搬到 17 号内，但是风声紧迫，对鲁迅不利。我们在这里虽生育抚养了孩子，然而当孩子半岁，鲁迅的全部牙齿肿痛，陆续拔掉的时候，却避居到内山书店去了。当我们搬到 17 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入活动，一切集中在 18 号内，17 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乘我们的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却偷偷丢进满是煤油浸透的引火纸头，意想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灭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我们吃尽苦头了。

因为政治上的压迫，屡次避居，内山先生也为之不安起来。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才由内山先生介绍，又搬到北四川路楼寓里去。到了"一·二八"，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了上海，景云里陷入火线中，周建人先生住的房子，他楼上的眠床，直穿炮弹。幸而他躲在楼下，才免于危险。但日本军队如狼似虎地到处捉人，看见了他，就加以拘留，经过鲁迅托内山先生去查询才得放出来和

家人相见。可是景云里还拘着不少的人，有一家还有人被打死。有一家灶被毁坏，扔了不少脏东西。景云里当时遭到这样浩劫，是因为在宝山路附近，正是战火绵延的地段，所以现在若去查考旧迹，是否一切如故呢？我是不敢确定了。

至于鲁迅日记所载的门牌号数，可能有笔误。因为我记忆的门的样子和周建人先生他们说的完全一致，和王士菁编的《鲁迅传》也一点不差。想来旧痕还在，不致错误的了。

（原载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

许　广　平

一、鲁迅先生怎样读报，怎样在写作中运用报纸上的材料。

在我的印象中，鲁迅先生读报是不费很多时间的，每天报来，看得很快。但是他的记忆力很好，有些他认为是有用的材料，记的很牢。要用的时候，一翻报纸，就能找到。有一次他要我替他找一个报上的材料，我翻遍了报纸都没找到，后来他告诉我到某月某日第几版的角落处去找，果然就找到了。我看报的时间比他多，他不以为然，认为不需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因为旧社会的报纸，大多是无聊的黄色新闻，或者是国民党的官方消息，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

他在写作中大量运用报上的材料。他也做剪报工作。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本剪报集，剪贴得很整齐，每页上还有他亲笔所写报纸名称和日期，这些资料是他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间从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大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剪下来的，内容大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界的消息报道和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他当时打算

运用这些资料写一篇东西的，后来没有写成。

他运用报上材料写东西的本领很大，他常常利用反动报纸的材料作为反面教材。翻翻鲁迅的杂文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比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两书的“后记”大部分材料都是报上的，经他一引用，加上三言两语，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他订的报纸不多，有些报纸是朋友和学生们寄给他的。

二、鲁迅先生怎样做编辑工作。

鲁迅参加过编辑工作的刊物，我看到的有《奔流》、《语丝》、《北新》半月刊等，以后又编辑《译文》。在这些刊物中，编辑《奔流》是他最感到吃力的了。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他取舍稿件完全从稿件的政治意义出发，该登的让它登出，不怕自己受累。《语丝》常常对时局发点“牢骚”，稿件都是按鲁迅的意见选择的。有一次，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向《语丝》投了一篇稿件，批评复旦大学内部的黑暗。照当时一般编辑的处理，这篇稿件就会给压下来，鲁迅却不，因为作者敢于揭发时弊，鲁迅就支持他，把它登出来了。这件事得罪了一些人，后来遭到报复，但鲁迅不怕。

鲁迅为了工作是不计报酬、不计劳累的。《奔流》一个月出一期，虽然是约了两个朋友合编的，但是，实际上担子都落到鲁迅一个人身上。尽管他本身的工作很忙，他仍旧负责到底，勤勤恳恳地编稿。

在编辑工作中，他随时收到稿件随时看，从不积压。翻译的稿件还要尽可能地按原文逐字逐句对照一遍。因为他的英、法文比较差，英文方面稿件就找周建人，或者是找懂英文的青年学生帮忙看。他在这方面是花过很大的精力的。许多今天有名的翻译家的文章，当时都是经他亲笔改过的，在这方面，他也培养了

不少的青年作家。

有些稿件适合登在别的刊物上，他也认真负责地介绍给别的刊物。

鲁迅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对别人的文章，从不乱加删改。有一次他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这篇文章我改了几个字，不知道你的意见怎样？"稿件如要作更多修改，他通常是提出意见，请作者自己去改。随便大笔一挥，甚至改变了作者原来的意思，这是鲁迅最为反对的。

在编辑工作中，鲁迅是谦逊的，反对哗众取宠。有这样一件小事：当时，《作家》月刊曾经在目录上刊登过世界文学家的照片，其中也有鲁迅的照片。鲁迅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认为，一个人的工作、生活都应该是朴实的，刊物也应该如此，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他不但认真地做编辑工作，也关心出版工作，随时对出版商提出有关出版方面的意见。出版商不一定听他的话，小节则让步，事关重大，就要积极地交涉了。当时的《奔流》、《语丝》、《北新》半月刊都是由出版商承印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这些刊物不满意，因为这些刊物提倡新文化。鲁迅为了使这几个刊物能够保持下来，尽过不少的力量。

三、鲁迅先生在写文章以前，通常要作哪些准备工作。

鲁迅在写一篇稿件以前，常常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有时候遇见朋友，他就会谈起来，说他看到了什么材料，想写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不讲，静静地读书，默默的思索，或者暗自打腹稿。有时候，看起来鲁迅写得很快，但这是日常不断地、多方面的学习、积累的结果，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他从来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有机会就读书。他几乎是时刻准备着拿起笔来战斗。他常说"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进去了"，这就是指学习。

他不但读书，也愿意多增加一些感性知识。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常常去看电影，在北京他常常到现在的北京剧场去看电影，但是看的次数比在上海的时候要少些。鲁迅对看电影不是单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这也是一种学习。看过电影，鲁迅有时候也利用电影的材料写东西。记得当时，他对反映非洲情况的影片很感兴趣，他很关心非洲人民在比利时、法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了解非洲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他说："非洲我们是不会去的了，能在电影中了解了解也是好的。"此外，鲁迅也很重视从实际中获得知识，如象参观展览会，研究有关动植物的书籍等，尽可能地多去观察和了解。总之，他所汲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因为有这样的经常积累，再加上记忆力好，脑子里总是储备丰富，无论古今中外、大小题目，他都能应付自如。这是他刻苦地、勤勤恳恳地工作的结果。他所积累的各种材料，都是经过自己的一番熔化的。

鲁迅在写作前不写提纲，甚至写一些较长的文章也不写提纲；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文章已有几分成熟了。他从不临时找材料，有时候也在写作前翻翻书，那是为了证实自己记忆的确切程度。至于材料、构思，那是在下笔以前就已经想好了的。

四、鲁迅先生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从鲁迅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从手稿中可以看出，鲁迅的修改多半是个别的字、句子，整段整页的删改是没有的。

他的写作态度很认真，随随便便一挥而就的文章，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曾说过："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见《答北斗杂志社问》）。他自己就是这样做

的。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写文章以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腹稿打好了，就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所以初稿往往就是定稿。

鲁迅的手稿一般都写得很整洁，改动得很少，但有时改动一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推敲，比如《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文章中有一首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诗中首句“惯于长夜过春时，”原来“夜”字后面是“度”字，后来自觉不妥，就改成“过”字了，这一字的推敲是经过相当考虑的。后面“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两句，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日记上是写的“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写《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时候，“眼看”改成了“忍看”，“刀边”改为“刀丛”，虽然两字之差，但是更深刻地表达了鲁迅当时的愤怒心情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

又如在《死》这篇文章里，有一句原来是这样写的：“大约我们看待生死都有些随随便便，不象欧洲人的认真了。”后来改成：“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象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前者容易被人当作一句平常的话，而后者却明确地表现出它的战斗性和它的

深刻的社会意义了。这样的例子，在《鲁迅全集》中是很多的。

五、鲁迅先生怎样对待校勘、校对工作。

鲁迅的校勘工作是继承了清代的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的，也就是所谓考证校勘。我们现在到鲁迅博物馆去看，还能够看到鲁迅是怎样整理文学遗产的。尤其是《嵇康集》的校勘工作，他一共抄写了三遍，字写得工工整整。这三次是根据三种不同的版本校勘的，每当发现某个版本的说法不同的时候，他马上写一个小纸条夹在里边（顺便说说，鲁迅是很注意节约的，一张稿纸只剩下一点边边头头，他都裁下来积存起来，放在桌边，以备随时作夹条用），或者在上面注上眉批。就这样，《嵇康集》反复校勘了好多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整理文学遗产的严肃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读书又是多么的认真了。

对编排工作，鲁迅也是很认真的。他很注意装璜和美化版面。他编《译文》的时候提倡多登木刻，原因之一是可以美化版面。他希望书里边也最好能有配合人物或情节的插图。另一点是他主张书和杂志不要编排得很挤，字号要大一些，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字，会使读者看了透不过气来。他主张一般的文章开头空五、六行的位置，有时在文章的空处加上一点小的图案花样，美化刊物。

鲁迅常常亲自做校对工作。校对中，遇到一行的顶头有标点，他都认真地划到每行的末尾；一张校样，正面看看，还要倒过来看看，这样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就很容易发现了。他要求天地头要排得整整齐齐，那个地方空得多，那个地方比较挤，那个地方错落不齐，他都在样子上做出记号，有时用尺划一条直线，以引起排字工友的注意。鲁迅最讨厌的就是把字给排错了，因为一字之差，常常把整个意思弄错了。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曾经替他整理发表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里有一

句原文是“令人神旺”，不知是排错了，还是编辑搞错了，印出来成了“令人神往”。“令人神旺”和“令人神往”两者的意义是不同的，这不是鲁迅的原话。鲁迅对这种错误是不满的。

他在编辑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编排校的工作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他总认为，一期刊物、一本书出的错误少一点，就对读者的帮助更大一点，自己能做多少，就努力做多少。

六、鲁迅先生怎样对待读者来信和青年作家写给他的稿件。

鲁迅日常收到的读者来信是很多的，他几乎是每信必复（少数无聊的信例外），并且尽快地答复，从不积压。他通常是利用茶余饭后的休息时间来写回信，不占工作时间。

对青年作家的稿件他是很认真看的。那时候，一般的人对青年作家是不够关心的。鲁迅不这样，他在这方面是不计时间和精力的。编刊物的时候，遇有不能采用的稿件，他总是及时退给作者；能用的稿件，他就认真地修改。他收到的稿件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稿纸很薄，是那种双层软纸，字又写得不清楚，看时很费力，他就垫一张纸在双层稿纸中间，衬着看。有的稿件写得很马虎，并且还附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我这个稿件写得很乱，写了懒得再看一遍，现在寄给你看看吧！”鲁迅为难地笑了笑，但他还是认真地看下去了。

鲁迅对青年作家的稿件是很尊重的，如果对稿件有些意见，他就注明：有几点意见提供你参考。《勇敢的约翰》的译者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一个邮务员，他将《勇敢的约翰》译稿送给鲁迅之后，鲁迅就千方百计地给他介绍出版，跑遍了许多书店，看了人家的许多冷面孔。但是，只要能够帮助青年作家出版一本书，他也就在欣喜中忘掉了辛苦，甚至把自己的工作都丢开了。

七、鲁迅先生有哪些良好的写作习惯。

鲁迅经常是在晚上写作。那时候，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但到现在，当我自己也写东西的时候，才觉得晚上写作确实要比白天好。夜里很清静，思路不会打乱。在上海晚上他要写东西的时候，他总催我先去睡觉，我知道他要写东西，也就走开了。他晚上睡得很晚，有时吃一点点心又继续工作了。写作的时候他很注意端正姿势，坐得很直，眼睛和桌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十年如一日，所以他没有弯腰驼背的现象。写作中，有时候需要想想再写，他就停笔坐到桌旁的一张躺椅上，抽支烟静思一番，然后再继续写下去。他抽烟很多，写作时右手拿笔，左手拿烟，但常常是忘记抽它，多数是自己烧掉的。

最后，我感到鲁迅习惯于写短文章，这是值得学习的。目前有些文章长了些，我看可以写得短一些。

（原载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

沈 尹 默

近写《高山忆旧录》，回忆辛亥革命前后之事，因年代久远，翻阅旧藏书札，作为参考；检得拙作《东游草》残稿，内有寄鲁迅的诗一首，抄录如下：

柬豫才兼示师曾

东亚风云起，吾曹效力时。
救亡纾上策，游说竭微辞。
难醒人间醉，空劳别后思。
栽培芳草绿，原上看离离！

这首诗是一九〇四（甲辰）年回国后，寄给鲁迅（豫才）的。他那时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一九〇三（癸卯）年十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于是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举行会议，王嘉祎是《浙江潮》的编辑，当时在早稻田大学读书，住在东京牛込区

榎木町。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参加王寓集会的，有王嘉祎(字伟人，杭州求是书院同学)，蒋尊簋(字百器，求是书院同学)，许寿裳(字季黻，求是书院同学)和我(求是书院教习)等十余人。“浙学会”原设在杭州，以杭州求是书院师生等为骨干，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缉，由陈汉弟(字仲恕，求是书院监院)改名为“哲学会”，作为掩护，继续进行工作。“浙学会”留日的会员在王寓集会，商讨另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趁日俄战争的良机，想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浙江革命志士在东京者尚不乏其人，如陶成章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魏兰、龚宝铨也在东京(不久将回国)，蒋智由在东京担任《浙江潮》总编辑(这时蒋智由还站在革命方面)，周树人(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于是便分头去邀请。鲁迅在弘文时，已是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革命青年，许寿裳和我邀请他参加，他便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决。十一月初在王嘉祎寓所第二次集会，决定陶成章和魏兰分往浙江、安徽；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当时在上海)和我往湖南，与华兴会黄轸(即黄兴)联系。当时会议是以“浙学会”的名义召开的，还没有“光复会”之名，实则“光复会”即肇始于此。寄鲁迅诗的首两句“东亚风云起，吾曹效力时”，是指参加“光复会”从事革命而言的。

我正要动身回国的时候，鲁迅和陈师曾(陈衡恪，美术家，当时也在弘文学院读书)二学长，邀我到东京日叱谷公园啜茗吃果子(日本人称点心为果子，鲁迅喜食之)。那时日俄战争开始，广濑武夫沉船封锁旅顺。日本政客中州进午提出“日本统治满洲说”；户水宽人又发出“天授日本”的谬论，认为“根据诸学理，应由日本占领满洲”；有贺长雄又发出“满洲委任统治权”的妄说；种种侵略谬论，在报纸上广为鼓吹。而我国有一小撮的留日学

生，却还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鲁迅对日本侵略野心，非常愤怒。他同时指出，蔡鹤庼(元培)和何阆仙(琪)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鲁迅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于是他向蔡、何提出三点意见：

(一)持论不可袒日；

(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

(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

原书没有抄录，大意是这样的。我到上海，即交给蔡、何两君。后来《俄事警闻》采纳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卓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给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由我分投；诸人阅后，皆有戚容，沉默不语。所以诗中有“救亡纾上策，游说竭微辞”之句。当时国人，痛恨沙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尚未能一致。象鲁迅这样抱有远见者，聊聊无几。所以有“难醒人间醉，空劳别后思”之句。

当清朝末年，凡有志之士，内地皆称为革命党，又不敢直呼，隐语叫草字头，所以诗中暗示急欲赴湖南活动，末二句写的是“栽培芳草绿，原上看离离”。

复瓿旧作，不值一顾；按诗探索，回忆起鲁迅早年的活动情况，虽一鳞半爪，弥足自珍，恐日久隐没不闻，录之以为纪念云尔。

(原载《上海文学》一九六一年十月号)

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

沈　尹　默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曾和我有同窗之谊。周遐寿《旧日记里的鲁迅》说："在鲁迅的一生中，早年的研究资料最为缺乏。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他自己的一册《朝花夕拾》……而已。别人所写的回忆也并不多，因为这一时期的末了几年，去今也有四十五年以上，在那时和他有接触的人，至今还存在的已经不多，而且年纪差不多也过了古稀了吧。"的确，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曾同住一寝室，同一自修室的，都超过八十高龄了。我所知道现在还健在的，只有北京张燮和（邦华）、南京伍仲文（崇学）和我三人而已。其他同学，真象鲁迅所说"旧朋云散尽"了。

他在弘文读书，是一九〇二（壬寅）年至一九〇四（甲辰）年三年，距今近六十年了，记忆较难。今年想写《忆旧录》，搜寻旧藏的函札，偶得当年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同学鲁迅（周树人）等六人联名写给我的一封信，抄录如后：

迪民先生同学台鉴：接读

来示，敬悉

台驾安抵申江。行装甫卸，（这句下有旁注："《英文典》至今尚无人来取"十字。）家庭朋友之乐，固不待言。而　足下滔滔雄辩，海客谈瀛，想必有天花乱坠之观也。申浦宴游，依然如昔，不独　足下目击伤心，而弟等亦为之浩叹！

学院自　君去后，山东速成师范诸君，联翩返国；湖北诸子，又结队而来。强士、季澍移居外塾。（这句旁注有"已入高等师范学校"八字。）绥之独处神田。乃弼将出院就学速成政法科。由是时局为之一变。此语近来之出典。

足下倘得重航东海，尤所欣盼！此复，敬颂

侍祺不宣！

同学　刘乃弼、顾　琅、陈衡恪
　　周树人、张邦华、伍崇学　同顿首

（在"伍崇学"名下，附注："已移外塾"四字。）

附呈江西学会章程一册。

信封已毁，没有发信的日期，是一九〇四（甲辰）年春所写的。

重读这一封信，当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形象，如电影一幕一幕地重映在眼帘。弘文学院在东京牛込区西轩町三十四番地，掌院是嘉纳治五郎，学监是大久保高明。这是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的学校。一九〇三（癸卯）年三月浙江大学堂派教习祝凤楼（震）和我等四人，到日本进修，期限一年，指定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读书。我因而第二次到日本东京进弘文学院报

到时，因人数少，指定入“山东班”学习，并分散在各寝室里。我和祝凤楼被指定搬进的寝室，当时已有六位同学住着，这就是写信给我的鲁迅、刘乃弼① 、顾琅② 、张邦华、伍崇学③ 和陈衡恪④ 。他们早一年进弘文，是一九〇二（壬寅）年三月东渡的。我等八人共住一寝室。弘文规定，凡共住一间寝室的，另有一间自修室，供八人自修之用。寝室在楼上，自修室在楼下，均不宽大，八人挤在一堆⑤ 。夏天寝室中，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以度炎暑。

信中所提及的“绥之”、“强士”和“季黻”三人，是常到我们自修室来谈天，往来较密的同学⑥ 。

那时，我和鲁迅等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终日聚在一间狭陋的自修室内，有时商量推敲文字，渴求新知；有时共抒雄图，志在光复；有时浊醪痛饮，高歌“狂论”。都算得风姿英发。这时，中国更加走向半殖民地化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竞争更加剧烈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更加严重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更加

---

① 刘乃弼是安徽人，官费生。他年龄最大，身体又最胖，诨名“刘胖子”。与鲁迅同时进弘文，先学师范，又学政法。——作者注。

② 顾琅号顾臣，在南京叫芮体乾，东渡日本时，改名顾琅。学地质学。为人嗜嗍，纠缠不清。同居一室，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改名。——作者注。

③ 张邦华号燮和，伍崇学号仲文，均学教育，归国后，均在教育界服务。鲁迅和顾琅、张邦华、伍崇学均是南京矿路学堂学生，由江南督练公所官费派赴日本的。——作者注。

④ 陈衡恪号师曾，与鲁迅亦是老同学，矿路学堂学生。他是总办俞明震的近亲。俞就是查办上海民报案，收买革命叛徒，逮捕章太炎（炳麟）和邹蔚丹（容）下狱的“差官”，清政府的爪牙。其实，陈师曾学教育，擅长诗画，是一位艺术家，为人诚恳，与俞在政治上无关系的。这都是鲁迅曾亲口对我说的。现在想起来，当时鲁迅对敌友的界限，是非常鲜明的。——作者注。

⑤ 祝凤楼（震）不久因父病归国，变为七人住一室了。——作者注。

⑥ 同寝室的同学外，其他江、浙同学，志同道合的，亦常来室叙谈。信中所说：“强士、季黻移居外塾。”，“强士”是韩永康，“季黻”是许寿裳，我离开东京后，他们不久进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了。许与鲁迅是至交，大家所共知，就不谈了。——作者注。

蓬勃开展了。于时，知识分子有的参加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有一小撮，宣传反革命的君主立宪谬论，都麕集东京。因此当时中国留学生很多，流品不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阵营，壁垒颇森严。留学生中，拖着长辫，誓死保皇是一派；反清的革命志士，鼓吹革命，无所顾忌是一派。但是也有朝为革命党人，暮为保皇叛逆，形形色色，出现在东京。鲁迅站在革命方面，自始至终口诛笔伐，展开斗争。鲁迅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超出了一般民主革命者的思想水平。他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名句，就是那时光复华夏大业的积极革命雄心大志的具体表现。中国留学生编刊了许多鼓吹革命的杂志，鲁迅是浙江人，尤积极支持《浙江潮》的出版。他的好友许寿裳是《浙江潮》编辑之一（鲁迅热心协助，写稿支援）。但同时《浙江潮》编辑中有蒋智由其人，主张君主立宪，鲁迅因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因之不久蒋就辞编辑的职务了。这时的鲁迅同时也写稿在《河南》杂志发表，已以进步的民主战士屹立在东京了①。

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一有余暇，就参加集会，听讲演，与浙江革命机关暗中接触。在一九〇四（甲辰）年，鲁迅正式参加浙江革命志士所组织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工作②。有很多时间，鲁迅已涉猎欧美和日本的书籍，边学习日语，边翻译。信中所说："《英文典》至今尚无人来取。"由此可证他当时还习英语的。他那时虽外文根底有限，但兴趣极高。平日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每工作到深夜才睡。他所以如此苦学，就因志在光复，时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认为"改良"必败，

① 中国留学生编刊了许多鼓吹革命的刊物，东京出版的，还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新湖南》、《云南》等杂志。我亦曾编刊《胡天》杂志，共出四期。我另有《谈〈胡天〉杂志》一文。——作者注。

② 同时参加光复会的，有许寿裳、孙翼中等人。许、孙均为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编辑。我另有《记光复会二三事》一文。——作者注。

誓做“革命党之骁将”，这志向从不动摇。同学们笑着说：“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毛主席说他骨头最硬，这副硬骨头在二十二岁青年时代，就已显露出来了。同时他又嫉恶如仇，对东京留学生中的保皇派，作坚决的斗争。尤其对同学中保皇派的丑态，常加以白眼，或嗤之以鼻。

实际上鲁迅对一般同学们是满腔热忱的，对革命宣传，尤全力以赴。有时在自修室，亦间有沉默之时。这时他自言自语，苦思救国之道。往往思索，革命必反清，但反清以后，如何治国呢？如何挽救麻木不仁的大众呢？在东京时，他的民主思想是进步的，但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局限，得不到结论，就沉思起来。迨许寿裳等一来，却又激昂慷慨起来，话匣一开，风趣横溢。当时有斗争性强的短论，大家一定说：“恐怕又是豫才的大笔吧！”总之鲁迅的战斗精神，在弘文时，已光芒四射了。

鲁迅译作，随阅随译，速度惊人。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清新雄健，在当时译书界已独树一帜了。一九〇三（癸卯）年，革命派领袖之一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给反动思想以决定性的打击。鲁迅受到章太炎革命思想的影响，译笔更激昂慷慨。其鼓吹革命的文字，尤读之使人惊心动魄。鲁迅译文主要是从日文翻译的；偶而亦译英文书。有人认为鲁迅不喜英美著作，这是事实，但不等于说鲁迅不译英人著作。

鲁迅在弘文所翻译的，有《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书。以通俗的科学思想，来挽救中国大部分麻木不仁的人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还记得当时鲁迅译成的文字，一时兴来，尽可谈笑间署了他人的名字；亦有斗争性强而刺时刺人之文，就讳言真名，可惜篇名忘却了，日子一久，考订为难。在现在说来，把自己写作，用他人的名义发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时却习以

为常，不足为奇。如鲁迅和顾琅合编的《中国矿产志》一书，《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已收入。唐弢《编校后记》说：

> 我们试把这本书和同一时期发表在《浙江潮》上的，由鲁迅先生个人署名的《中国地质略论》一对照，可以看出内容和文笔完全相同，确是鲁迅先生一人的作品。

《中国矿产志》缩本，已在《浙江潮》上发表，可证此书确在弘文时所作。但据我在弘文时目睹，确是两人合作的。书中有一部分是顾琅所写。顾琅为人噜嗦，“文如其人”，文笔不信达。再由鲁迅重抄，加以润色是有的。《浙江潮》发表署名仅一人，这是当时风尚，署不署名，本无所谓，上文已述及。

又有《红星佚史》一书，有人说非鲁迅手笔。据我所知，主要部分倒确是鲁迅的。东海觉我（徐念慈）考证这书译于一九〇七（丁未）年，亦是不确的。这书译稿，在弘文时已开始译了。这时鲁迅习日语，又习英语，因译此书。译了几节后，鲁迅给同学们传观，同学们还说：“‘伊人有欢，爱其殂兮！’林琴南也望尘莫及了。惜未有风人之旨耳？”这意思笔法超越林文，但对革命教育意义还不大，不够激昂慷慨。因为那时写文，越激昂越好。鲁迅笑了一笑，藏诸行箧。后以“周逴”名义出版。文笔稍与弘文时不同，想必修改过了。周作人的《发须爪序》说：“我最初所译的小说是哈葛德与安度阑合著的《红星逸史》。”这话是不正确的。后来在《鲁迅的故家》中说：“这译本不是用鲁迅出名，但其中韵文部分，出于他的笔述。”这些话才有部分正确。林辰《鲁迅事迹考》考定《红星佚史》是周作人所作，“非鲁迅所译”。林辰还考证说：

> 这序文（即周作人写的《发须爪序》）写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其时鲁迅尚健在，倘果系鲁迅所译，周作人决不会随便乱说。

这些话，就不明了鲁迅少年时代的风格。鲁迅的手笔，署他人之名者，岂仅《红星佚史》而已。《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收入《红星佚史》译歌十六篇，是妥当的。当时风尚所趋，署他人之名，亦不会反对，仅作为谈笑的资料罢了。

鲁迅在弘文所写的《斯巴达之魂》一文，曾在《浙江潮》刊登。鲁迅后来自己回忆说：

> 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不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

当时情况确是这样的。同学写好一篇文章，首先奇文共欣赏，大家围拢来看，还高声朗诵。此文以斯巴达人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来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刺激性相当大，读到“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一段公认为是妙句，用笔加上密圈，传诵一时。有的各抒己见，有的手执日文书，一边说，一边补充。那时风尚，不分你我，只要对革命有利，于愿已足。这种不尚虚名之心，在革命家面前，是不足为奇的。总之，鲁迅早年著述，用笔名亦好，合署亦好，用他人名亦好，对于鲁迅是无损秋毫之末的。这

里不过想作为史实略谈一二罢了。

那时中国留学生涌至东京，先入预备学校——弘文学院。信中所说："山东速成师范诸君，联翩返国；湖北诸子，又结队而来。"这几句话，反映了那时留学生人数之多。但是留学生的丑态，鲁迅也曾当作为笑语。后来他曾在《朝花夕拾》集子里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描绘道：

>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当时他就在我们中间说过类似的话。大家听到他描摹留学生盘辫在顶的丑态形如"富士山"时，都不忍喷饭。我有一位同学王立才，为人风趣，先进金泽医学专门学校读书，他常到弘文来，就因此叫鲁迅为"富士山"，"富士山"的诨名，在同学中传得相当广。当时这诨名传开的原因，还因富士山原蕴藏着火山，很能象征鲁迅革命斗争的精神。后来鲁迅决定学医，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王立才告诉鲁迅，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中国留学生，鲁迅便决定去仙台。

谈到鲁迅的风趣横溢，又想起一事。东京成城学校是中国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进成城读书的，一定要经中国留学生陆军监督审查批准，因此革命派的学生较少，保皇派很多，在东京满街乱跑，学成后，回国给反动的清朝政府效劳。鲁迅看了很生气，在自修室，曾写了些打油诗。我还记得其中一首宝

塔诗：

兵
成 城
大 将 军
威 风 凛 凛
处 处 有 精 神
挺 胸 肚 开 步 行
说 什 么 自 由 平 等
哨 官 营 官 是 我 本 分

还有一首讽刺王惕斋的打油诗，可惜我只记得两句："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惕斋，是浙江慈溪人，人极顽固，竭力反对革命，住东京新桥，一臂为马车碾断，自称独臂翁。喜交接官场，凡清朝官吏到日本时，他必欢迎欢送。钦差指那桐，王爷指戴振。对这些反动人物，加以口诛笔伐，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此类作品很多，惜不能一一记忆了。

一九〇四（甲辰）年正是日俄战争的前夕，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侵入中国，国势危如累卵，旅顺已非常吃紧。而上海等地的人士，犹醉生梦死，无动于衷。因此信中所说："申浦宴游，依然如昔，不独足下目击伤心，而弟等亦为之浩叹！"同学少年，忧国忧民，沉痛心情，不觉溢于字里行间了。

以上是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的片断。我第三次东渡日本，仅为光复会工作，和鲁迅只匆匆晤谈一过，这留待《记光复会二三事》再叙述了。

（原载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

周　建　人

一九一〇年八月起，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当了一个时期的学监兼博物学教员。后因校长换人，他也不去了。这时期，他曾搜集一些关于新知识的外文丛书，计划从中选取一些好的，有益于读者的翻译出来，在什么书局去出版。

不久，武昌起义，出版家大都收缩营业，鲁迅出版丛书的计划也就只好作罢。此时来鲁迅家的除光复会的老朋友以外，还有新认识的南社中的，想到绍兴来组织越社的人。鲁迅还替他们编过以越社名义出版的两期社刊，登有两篇短文，一篇是《钱塘殿前观潮》的记事，一篇是《会稽山采植物记》，具的是我的名字，文章却是鲁迅写的。后来鲁迅去北京教育部任职，来绍兴组织越社的人被鲁迅介绍往北京任事，越社也就不存在了。

武昌起义不久，浙江就紧张起来。此时杀秋瑾的绍兴府知府贵福已早离去，换来一个自称程长毛的人。此人亦残酷镇压人民，但对于辛亥革命则采取不闻不问态度。那时绍兴有两种武力，一种叫八桨船的水兵（船上有八片桨，故名），是防守水城

门的；一种是由卖水果的、种果园的等人组成的步兵。你如走进他们的家里，会看到墙上挂着藤牌、短刀，或者长枪，并有一件号衣（胸背有一个勇字的背心）。他们平时做小生意，操练时穿上号衣，足穿草鞋，头上缠布，拿着武器。也有一部分是拿洋枪的。另外还有少数警察。到杭州抚台衙门被攻下，杭州光复时，绍兴街上的警察渐渐退去，不见了。当时就有些人议论纷纷，说急需派人往杭州去请革命军队快点到来，以安民心。在这时候有越社等人来邀鲁迅去开过一个会，地点可能在开元寺，此刻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屋内搭着一个小台，到会大约有数十人或百把人。大家推选鲁迅为主席。鲁迅提议了几件事情，很快都通过了。一件就是组织武装讲演队，宣传革命的意义，使大家了解。但须若干人组成一队，武装的，以防万一有反革命进行袭击时，可以抵挡。大家即刻都赞成这样做。并有些人从衣袋里摸出钱来，十元、八元不等，说作临时宣传费用的。

一天下午，鲁迅从家里出去，从仓桥街前进，见市上人们很不安。走到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到绍兴府来投考的考员耽搁的地方）门前，见不少人们匆忙地快步走着，有的口中说着，听说败残的清兵已从西郭退进来了，沿途还杀人哩！鲁迅在册局门口站住看了一下，即又拔步前进，走到绍兴府学堂里去。

进了校门就是操场，已有不少学生穿着制服聚集在操场上。鲁迅说了这种情况，校里有些人似已知道一些消息，立即决定由学生武装排队出去巡行，给居民解说一下，使他们安心。有的匆忙地起稿，有的裁纸，有的油印，很快就印了几卷传单。学生们已在操场排成一字，都荷着枪（这时候中学堂须学习兵操，故有枪）。教兵操的体操教员的大辫子中段打了一个大结子。他一面走来，一面在腰边系指挥刀，刚走到操场中心，突然又转身飞奔

进屋子去了。一忽儿换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拿着走出来，口里自言自语地说着："遇到万一，这把刀准能砍杀几下的。"队伍刚刚准备出发，忽见一个中年以上、矮小身材的人匆匆走到学生队伍前面，口里匆促地说道："诸生，你们还是不要出去为好。出去了，万一负了伤，叫我如何向你们的父兄交代？"学生不约而同的一齐大声回答："我们自己负责！"轰然一声，那矮小身材的人惊愕了一下，连连点头带鞠躬地后退几步，即回头走进屋子去了。

队伍出了校门，经水澄巷，向大街走去，鲁迅等都一起走着。大善寺前的那些店铺正在准备上排门关歇，看到队伍来了，店员探头探脑地张看。队伍随处向人群作了简单的解释，叫他们安心，并分给他们传单。店员及市民等三五成群地围看传单，人们立刻安定下来了。有的人口里说着："有这许多队伍在这里，怕伊啥呢！"已上的排门又重新卸下。学生的队伍绕行了一周，回到学校，天已垂黑了。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七、八月合刊）

片断的回忆

郑　奠

一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的八月，这三年中，我和鲁迅先生同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女师大风潮发生以后，经常见面，在这次共同斗争中，深深地认识到鲁迅先生坚强的性格和他的斗争精神。他的待人，真诚、坦率，他的办事，认真、负责；处理任何问题，他必辨明是非，分清敌我，从不采取依违两可的态度；他向旧社会恶势力斗争，无论在言论上，行动上，自始至终绝不妥协。关于女师大风潮的时代背景和鲁迅先生在这次风潮中的斗争，我想单写一篇短文，这里不再重说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们在北京分了手，以后隔二三年或一二年，在杭州，上海或北京相见。见面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每次见面之后，在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写几个片断的回忆，作为我对鲁迅先生又一次的纪念。

三

我们在北京分手以后，鲁迅先生到了厦门、广州，第二年（一九二七年）十月才在上海居住下来。一九二八年七月，鲁迅先生偕景宋夫人到杭州游览，我那时陪着同游了三天。他们回上海后写信给川岛，说："介石兄，乞代我讲几句好话，如破费他许多宝贵光阴，后来不及走辞，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之类。象他这般的风趣，也可以想见他这次的游兴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我从杭州到上海，往访鲁迅先生。谈讲中，他郑重地对我指出在那个时代里个人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我那时只以为鲁迅先生或者知道了我的不善于治生，关心我的生活，所以这么说的。后来过了几年，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鲁迅先生回北京看他母亲周太夫人的病，那时候我在北大任教，二十七日在广和饭庄同吃晚饭，他对我又重复地说了象二八年八月五日那一番话，"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个主要条件，总应该积存一点。"语气是那么激动。我也才体会到这话的深意了。一个人在那个时代——旧社会里反动政权统治之下，什么都无保障，随时可以发生意外的袭击，想要坚持真理，站得住脚，经得起打击，永久保持着这"硬骨头"，非自己首先建立起经济的物质基础不可。鲁迅先生的这番话，是他由于生活实践中的体验而得的，他所关心着的后辈，大概都会听到过他这沉痛的话罢！

四

说到鲁迅先生对人的关心，我再举一个亲身感受的例子。

一九二九年二月初，我在南京，腿上筋发炎，进城南医院动了手术，迁延了一个多月，回杭州再进医院第二次开刀，老是不收口，川岛因为鲁迅先生懂得医道，写信代我去请教，很快地得到了他的复信。信中说：

> 石君之炎，问郎中先生以'为什么发炎'？是当然不能答复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处在发炎，发炎有时须开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够明白。他不问石君以"你的腿上筋为什么发炎"，还算是好的。
>
> 这几句是正经话了：且夫收口之快慢，是和身体之健壮与否大有关系的。石君最好是吃补剂——如牛奶，牛肉汁，鸡汤之类，而非桂圆莲子之流也——那么，收口便快了（但倘脓未去尽，则不宜吃）。这一端，不大思索的医生，每每不说，所以请你转告他。

他这样的热情，对一位比他年纪小十多岁的后辈，是多么的关切而细心指导呵！

不仅仅是这样，他对人的挚爱，范围是相当广的。就我所见所闻，那时一些青年们凡是对鲁迅先生有所请求的，无论物质上的补助也好，学问上的指导也好，他总不叫人失望的。

五

鲁迅先生对于友谊，诚然是十分珍惜的。但是他如果发见了所交往的这个朋友，已经是不可相信的了，他就不客气地会和那个人绝交。我现在举他面斥林语堂的这件事来说一说。记得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去访鲁迅先生，适逢北新书店的李小峰约请一些人在南云楼吃晚饭，同坐的有鲁迅先生、林

语堂夫妇、郁达夫、章川岛等八九位。席快完的时候，语堂谈话中间，对鲁迅先生隐隐地含着讥刺，鲁迅先生面斥语堂，语堂也争持不下。那时不知道鲁迅先生对语堂为什么要这样声色俱厉，后来我们看到这位买办阶级的奴化分子一天一天地堕落下去，就明白了鲁迅先生怎么能够和他始终保持友谊了。

六

一九三二年和鲁迅先生在北京广和饭庄一夕话以后，不相见又好多年。这其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国难一天严重一天。鲁迅先生那时还住在上海。一九三五年七月七日许季茀先生长女世瑄和诸暨汤兆恒在上海举行婚礼，时间定于下午五时。我为男方介绍人，当天从杭州赶去。证婚的是蔡孑民先生。鲁迅先生偕景宋夫人同挈海婴到得很早①。礼成之后，蔡先生、鲁迅先生和我坐在一起谈话。谈到国事，蔡先生表示焦虑，以为蒋介石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鲁迅先生主张非从根本改革起不可；季茀先生一面招呼其他来宾，听到我们的谈话，也走近来慷慨激昂地说了几句。随后来了一位跟鲁迅先生极熟、也极相好的绍兴同乡，他看看鲁迅先生的神态憔悴，郑重地说："豫才！若（读若诺）咯太辛苦者，也（读若邪）好休息休息者。"鲁迅先生笑着说："我咯活着，我咯哪好休息呢！"说的时候两目炯炯有光。这是我和鲁迅先生最后一次的会面，也就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鲁迅先生为祖国为人民要鞠躬尽瘁地奋斗的呼声。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原载《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

① 许寿裳先生《亡友鲁迅印象记》有一段关于这事的记载。

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俞　荻

一九二五年秋天，我从青岛大学转学到厦门大学的文科。初到厦大，我住在囊萤楼，是一座花岗石建筑的三层楼洋房。每一个窗子都装有纱窗、玻璃窗、百叶窗。每一个房间里都很整齐地摆着床、书架、书桌。其他的建筑物：群贤楼、集美楼、同安楼、映雪楼、博学楼、兼爱楼、笃行楼、化学院、生物学院，这一些全都用花岗石建筑的。还有学校自办的自来水厂。站在小山上一望厦大的全景，好象在童话里一样：在沙滩上排列着一座一座的花岗石的洋房，前有海，后有南普陀，有四季常绿的树木，风景秀美。可是我还是感到失望，因为我转学到厦大来的目的，希望能学习一些战斗的丰富的文学的知识，但是这儿所学的是和时代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而且还要用文言写文章呢！全校充满了封建的、古旧的习气，在群贤楼大礼堂上开会或看电影，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有一次，我们班里有一个男同学，可说勇气很大，竟敢写一封信给一个女同学，在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却闹得满城风雨。

如此厦大！我在课外，只得自己多看些文艺书报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间，听说鲁迅先生不久要来厦大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反而有点令人不敢相信。然而喜讯真的变成事实，孙伏园、沈兼士、丁山、川岛等著名教授、讲师都继续不断地来厦大了。九月四日，鲁迅先生也来了。这一天，好象海潮也在欢笑，南普陀的榕树也显得特别翠绿。文科的同学，欢呼雀跃地说："鲁迅先生真的来了！"

九月八日，这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我终于鼓着勇气走上石阶九十六级的生物学院三楼——鲁迅先生的临时寓所。生物学院耸立在小山岗上，面临大海。因为鲁迅先生来厦门只有五天，所以我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正在那儿整理书籍。我轻轻地叫一声："鲁迅先生！"他走过来，微笑地和我握手。他中等身材，清瘦，浓黑的眉毛，眼睛很亲切，尤其他自己真实地描写过的，"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形的胡子，给我初见时感到特别亲热。那时，我是一个青年学生，从未会见过伟大的人物，就是连学校里一些名教授吧，除了上课见面之外，我也从没有去看过他们。所以当我在没有会见鲁迅先生之前，我以为我在见到他的时候会窘得说不出话来。不，他是一个一点没有架子的朴素的人，一个很容易接近的、和蔼可亲的导师！我告诉他，这几年来，我欢喜读他的作品，我又谈到厦大的现况，谈到对厦大的未来的希望。他听了我说到厦大校长林文庆提倡复古、尊孔，学生还是用文言写作的时候，他感到很惊奇。他幽默地笑了一笑说："这应该改变一下！"他又亲切地看了我一眼，坚决地对我说："你别着急！以后关于阅读和写作方面，我会给你们一些帮助的！"

过了一会儿之后，哲学教授陈定谟先生来访了。我们谈到明末英雄郑成功所建造的镇北关和演武场（即在厦大的前面）和

鼓浪屿的郑成功操练水师的水操台。鲁迅先生对于厦门这些民族英雄的遗迹，感到很有兴趣。快要吃饭的时候，我才离开那一间充满光辉的房间。走出生物学院，斜阳照着无边的大海，海浪闪着金色的光芒，天边泛着美丽的晚霞，我喜得带跳带跑的走回映雪楼。

鲁迅先生在厦大担任“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这两门课程，同时还兼国学院研究教授。本来在文科教室里，除了必修的十来个学生之外，老是冷清清的。可是从鲁迅先生来校讲课以后，钟声一响，教室里就挤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站着听了，教室里非但有各科学生来听讲，甚至助教和校外的报馆记者也来听讲了。鲁迅先生自己也说：“此地之学生似尚佳，清早便运动，晚亦常有；阅报室中也常有人。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两地书》）

他的讲学，并不象一般名教授那样只管干巴巴的一句一句的读讲义，枯燥无味的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的丰富多采。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他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象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恐怕时间过得太快！

以前学校里每周都有一次周会。可是这种周会象教堂里做礼拜一样。校长林文庆是尊孔的，所以每次在周会上讲的差不多，满口“大学”、“中庸”的说个不休，讲些“治国平天下”、“君子独善其身”的大道理。这种周会谁都感到乏味和无聊！

十月十四日那一次周会却和往常不同了。钟声还没有响，男女学生都争先恐后的拥进群贤楼大礼堂，期待着鲁迅先生来演讲。他的演说主要内容有两点：“劝青年学生少读中国古董书，应该做‘好事之徒’。”这一番演说，给当时死气沉沉的只顾读

死书的厦大学生很大的启发；可是对于当时开口“之、乎、者、也”的复古的校长林文庆却是当头一棒。

不久，鲁迅先生从生物学院搬到集美楼来了。那时，我住在他的近邻映雪楼。我每天到图书馆里去，总要经过他的门边，我可不敢常去吵闹他，恐怕浪费他编讲义和写作的时间。有一次，我和王方仁、崔真吾这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因此，我们一同看鲁迅先生去。我们一走进他的房门口就闻到一股香气。我们不禁异口同声说：“鲁迅先生，好香啊！”他对我们笑一笑说：“最近我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点，可是这儿的饭菜又吃不惯，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来烧菜了。无非想增加一些营养，多延长几年寿命，给那些讨厌我的人，多讨厌几年！”当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的身体越健康，他越能多做工作，越能多写战斗性的杂文，可以使敌人恐惧，也可以使我们快乐。学校当局名义上虽说优待从北京南来的著名教授，其实对鲁迅先生的茶饭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他只好自己动手来烧开水、煮菜了。

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言和白话之争，白话可说基本上已获得胜利。可是，在当时厦大还是要学生用古文写作的。鲁迅先生来了厦门之后，在上海有一些报刊上似乎有这样的论调，要白话写得好，先得精通古文，而且把鲁迅先生的文章来作典型的例子。他们说鲁迅先生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好，简洁、流畅，完全由于精通古文的缘故。我就把这个问题向他提出来。他说：“上海报刊上确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论调，这是古董家骗人的话。其实，我的初期作品多少杂着一些古怪的字眼，但这不是金子，而是砂砾！我的白话好象小脚放大脚，所以这种白话是不纯洁的，不健康的！所以纯洁的，健康的白话，只有在年青的一代，没有受过古董的毒的年青的一代才能产生！”当然，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

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可是在当时和封建的、复古的遗老作斗争的时候，鲁迅先生这种生动的、形象化的语言，是打击复古派最强有力的武器。

后来，我们向鲁迅先生说出我们心里的愿望，想努力写一点东西，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并且希望他支持我们，他毫不踌躇地满口答应："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鲁迅先生这种最直爽的、最热情的、最亲切的帮助青年的态度，怎能不令人感动！他是我们的真正的文学导师，又好象是我们的知心的朋友。就是法科学生欧阳治、教育科学生陈梦韶、龚达清等以及其他各科许多学生都乐于和鲁迅先生接近了。

鲁迅先生象一阵温暖的春风，把沉睡着的厦大学生吹醒了。尤其是文科学生，掀起了学习文学的热潮。爱好写作的学生，我和谢玉生、崔真吾、王方仁、朱斐、洪学琛、卓治，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成立了"泱泱社"，并出版《波艇》月刊。

鲁迅先生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做《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

其实，鲁迅先生非但给我们审稿、改稿，而且他还要设法把刊物出版。当初，他本想把稿子寄给某书店出版，但是某书店来信婉辞谢绝了。关于这件事，他感到很气愤，"市侩！市侩！"骂个不休！他幽默地对我们说："这种市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会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又会来请我写文章；那我只好不客气说，'没有什么空闲'！"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爱护文学的幼芽的，就是这样不顾一切来培养我们的！

他又费尽心血把稿子寄到北新书局去。十一月间，草绿色封面的、精致可爱的《波艇》月刊创刊号，终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

下出版了。鲁迅先生的《眉间尺》(即《铸剑》)就是在《波艇》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我的短篇小说《樱花下的一夜》也经鲁迅先生的修改后登载在《波艇》的创刊号上。

鲁迅先生对我的那个短篇提出这样的意见，他说："你的这一篇，倒象一首抒情诗，只可惜带点学生腔！但是，你现在也只能如此。不过，以后还得多多阅读各种名著，好扩大你的眼界；对社会生活也要多观察，这样你的题材就不会太狭窄了！"他是这样耐心、这样认真地对待初学写作者的！

《鼓浪》周刊也是由鲁迅先生审稿、改稿的一个小型的文艺刊物。这是附在《民钟日报》副刊上出版的。此外单印一部分，由鼓浪社发卖。《鼓浪》第一期出版，大受读者欢迎，初版立即卖完。为了应读者要求，只好再版一次。

《鼓浪》这个刊物名称，虽和厦门对岸的鼓浪屿同名，实际上含有"鼓起新时代的浪潮"的意思。文章体裁和风格颇象《语丝》。

这虽是仅仅两棵文艺的幼芽，但当时在厦门文学青年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这两个刊物的出版，我与鲁迅先生接近的机会比较多了。有时候，我问他应读些什么课外书？做一个大学生对社会应抱什么态度？关于这些问题，他都很耐心给我解答。他最反对学生读死书，他也最痛恨那些提倡"读书救国"，"不问国事"的学者名流。他常对我说，不但要读中国的好书，也要读外国的好书。并且科学书籍也要多浏览，不要仅仅抱住目下流行的时髦书。此外，他也告诉我，必须要懂一种外国语，多学会几种更好。这种宝贵的意见，对我以后学习有很大影响。当时，假古董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很流行，所以鲁迅先生叫我们多读些优良的外国文学作品，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文学的道路上去，避免误入

歧途。

到了十二月底，突然听说鲁迅先生要离开厦大了，这个消息，象晴空霹雳一样！

鲁迅先生为什么离开厦大呢？据我们当时的了解，他对“英国籍的中国人”、尊孔的林文庆校长，对排挤国学院的教务长刘树杞，以及国学院的一批“现代评论”派之流人物，感到不满，甚至憎恶。他与学校当局的冲突，已到了无可调和的地步。在十二月底，他坚决地向学校提出辞职书。学校当局对他的辞职书，感到很难弄。

这个消息一传出，全体学生立刻掀起一个挽留运动；看到挽留无效的时候，却变成改革学校运动了。全校弥漫着“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风潮。

许广平先生在《欣慰的纪念》里说：“……幸而他好象青年的吸铁石，自他到后，厦门大学研究文艺之风盛行起来了，冷清清的大房间里时常有学生的足迹不断来往，就在他离校之际，还引起青年的觉悟，改革学校运动于是发生……”这是当时厦大由挽留鲁迅先生，而转为改革学校运动的一段很真实的叙述。

同学们看到络绎不绝南来的教授、讲师如沈兼士、孙伏园来校没有多久，又都纷纷四散，眼看全校同学所敬爱的鲁迅先生也要离开我们而走，因此，同学们郁积在心里的气愤，就好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在鲁迅先生离开厦大之前，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这一天吧，泱泱社的几个年轻朋友，邀请鲁迅先生到学校后边，南普陀西南的小山岗上去照相。那儿丛生着鲁迅先生所喜爱的龙舌兰。龙舌兰就是他和孙伏园先生初到厦门时，常欢喜学着厦门人叫作“番葛”，也叫做“芦荟”的那一种草本植物。在那小山上点缀着好象馒头似的洋灰的坟墓。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

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去，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

现在，我希望鲁迅先生的新墓地上，能种上几棵他所喜爱的厦门的龙舌兰。

那时，虽然已经初冬了，不过在厦门还是和上海的秋天一样的和暖，鲁迅先生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袍，脚穿陈嘉庚公司的橡胶鞋，他比初来厦大更清瘦一些。因为他在厦门忙了四个多月：教书、编讲义、写文章、接见访问的人，还要给我们审稿、改稿，工作很紧张；而学校当局，连茶饭都没有给他适当照顾。

我们在那一条从南普陀通到学校的小路上，边谈边走地慢慢儿踱回来。我看看一同走的鲁迅先生，在厦门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习写作，为了我们的《波艇》和《鼓浪》两个刊物，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但是不久他就要离开我们了。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心情很沉重，不知怎样才好！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天气特别阴沉。记得鲁迅先生初来厦大时，那天天气是那样晴朗，校庭里各种花卉开得多鲜艳；可是今天鲁迅先生要离开我们而到广东去了。阴沉沉的天气，好象也为我们添上几分别离的气氛。他终于含着笑容和我们送别的人一一握手，走上到广东去的“苏州”号的海船上了。

鲁迅先生走了，厦大失了光辉！南普陀的前面，仍旧留着几座没有生气的石造的洋房！但是鲁迅先生曾经在厦大，辛勤地散布过文艺的种子，也曾经在那儿开放过文艺的花朵！

（原载《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川　　岛

一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的夜晚，鲁迅先生和景宋夫人从上海乘沪杭铁路火车来到杭州，是由许钦文陪了来的，到杭州时已经快半夜了。在杭州，住在西湖边的清泰第二旅馆里。住了整整四天，于七月十七一早，又偕景宋夫人离杭返沪。

鲁迅先生这一回在杭州游了西湖，也游了几处西湖里面的山；曾到旗下、清河坊、城站等一带热闹的街市上去买东西，买旧书，参观新、旧书店。没有去吊古，也没有去访旧。我想，可以这么说的：真是玩了四天。

那时节，我和钦文都在杭州教书。在我们和鲁迅先生十来年的交往中，没有见到过他有象这次这样浓的游兴。

二

在一九二七年的秋间，鲁迅先生快离开广州时，于九月中给

我的信里，曾说起打算回到上海之后，暂时不回北京，到南京去两三天，然后到杭州来，看看西湖，并且可以畅谈。

及至十月间，鲁迅先生到上海后，即为讲演、教课以及陪客、应酬等事所缠，再没有脱身来杭州游憩的机会了。我在杭州教书，也离不开身，等到西溪的芦花开了，我就去信约鲁迅先生来杭州看芦花，得到的回信是说，且待梅花开时来看梅花吧。到梅开时节，学校放寒假了，看样子鲁迅先生未必能来，我就打算到上海去看他，他也来信盼我能去。我正要去，不幸我在此时遭了祖母的丧事回绍兴，没有去成。等丧事办完，回到杭州，下学期又要开学了，只好一直忍着，等到一九二八年的暑假，我才到上海去看他。那时鲁迅先生住在上海横浜路景云里。

我一年半没有见到鲁迅先生了，乍一见面，先生所给我的印象不但是精神愉快、旺盛，而且使我对他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脸上气色很好，不象以前那么沉郁而带着苍白色了；人也似乎胖了一些；身上的衣着也比以前整洁得多。我当时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高兴，感到鲁迅先生在日常的生活起居方面，已得到照顾，有了些改变。这该归功于景宋。

我在上海住了一个礼拜，钦文恰巧也在那里。我们就邀请鲁迅先生和景宋夫人同到杭州西湖去游憩几天。起初因为事忙，还犹豫不决，经过几次的恳说，才答应可以去。当我要离开上海回杭州去的那一天下午，临上火车之前，还特别转到景云里鲁迅先生家里，和他约定隔日乘沪杭夜车来杭，并留钦文在沪，一同陪了来。所以由我先期回杭打点，留钦文在沪伴行，为的是怕鲁迅先生临时再改变计划——又不去了。

到了十二日夜，果然鲁迅先生和景宋夫人偕钦文到了杭州城站，我们接着他们了。

二

鲁迅先生这次来到杭州，除了平素极熟的几个人以外，当时没有别人知道。

也就在这一年的一二月间，鲁迅先生还没有到杭州以前，在杭州的青年学生群中，曾盛传着鲁迅先生到达杭州，而且曾有人亲眼看到他在孤山脚下苏曼殊的坟前题了诗。当时就有一些听过我讲课的浙江大学学生接二连三的来探问我，我却并不晓得。过了不久，鲁迅先生在上海也听到叶圣陶先生说起这事，并且接到一位马女士从杭州寄去的信，说从一月十日在孤山别后长久不得音讯等等。鲁迅先生就写信给钦文，要我们调查一下。我们先就想去看看所谓鲁迅先生题的这首诗。到了孤山脚下，苏曼殊墓前，并没有找到。根据传闻，诗确曾题过的，是这样的四句："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也许已经被人擦去了，或者我们竟没有找着。

我们回去之后，又向青年学生中打听，知道这一位也名为"鲁迅"的先生，不但在曼殊墓前当众题了诗，而且就在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教书，我和钦文就去访问了他。他也姓周，名叫"鼎"还是"鼎夏"，现在记不清了。一个瘦长的脸，上唇留着短须，看去约莫有三十多岁，一点也不象我们所认识的鲁迅先生。身上穿一套白裤褂，褂子比一般人所穿的小衫要长一些，但并非西装衬衫，脚上穿了一双草鞋。手里拿着一支教鞭，正在上课。见面后先通姓名，我和钦文没有说出真姓名来，只说慕名拜访，他就自称鲁迅。说话的口气中，对当时的世风不甚满意，怀才不遇，所以只能隐姓埋名的到乡下来教小学生。说曾写过一本名为《彷徨》的小说，虽销售了八万多册，但他自己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还要另外再写一本。至于鲁迅先生还写过一些别的什么

文章，他也说不上来。看样子，他对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以及作品都很茫然。在谈话时，眼睛四面乱看，目光发直，指手划脚地装一些也许他以为鲁迅先生应该是这样的神气，似乎神经有些不正常。其所以要冒名的真实企图，一时也看不出来，他虽滔滔不绝地乱说，我们却只得告辞了；他还约我们以后再去，有什么事可以去问他，他是乐于指导我们的。

为这件事，鲁迅先生曾写了一篇短文登在《语丝》上，说明在杭州孤山题诗的"鲁迅"，是另一"鲁迅"（见《三闲集》）。又由我们将经过情形托朋友告知当时杭州市教育局的负责人陈君，请转劝他不要再假装下去了。

就是这个冒牌的假鲁迅，曾在这一年的春天，轰动了杭州市的一群青年，这回，鲁迅先生真的来到杭州，先就和我们说好，只让三两个熟人知道。因之，在居杭的四天中，也真的得到了在先生一生中不曾有过的游憩的机会。

四

如果用"林立"这么一个现成的辞，来形容当时杭州西湖边开设着的几乎一家挨一家的大大小小的旅店，我以为不但不能算是夸张，而且是恰当的。清泰第二旅馆——现在也许已经改了名称了，虽开设在西湖边旗下的范围之内，离湖滨却已较远，比较僻静一些。我先一天给鲁迅先生在这里预定了一间房间，所以一下火车，我们就到了清泰第二旅馆。

到旅馆后刚坐定，鲁迅先生就请景宋夫人从随带的小皮箱里拿出纸烟来，边吸边谈。说从上海上车不久，就有两个兵士，一次又一次地来盘问他，并且每问一次之后，就检查他随带的一只手提皮箱一次；火车到了嘉兴，他们该换班了，还特别叮嘱接班的兵士，想来总是叫他们要当心这位客人之类。于是又来盘

问、翻箱子，鲁迅先生一边谈，一边站起来模仿这几个兵士的神情、动作给我们看，但并没有怪他们，只是笑着说："也许他们以为我的小皮箧中有什么毒品吧，所以如此着忙。要不碰见我，叫他们做啥去！"这个故事，我至今想起来，火车上盘查的情形，就如亲眼见到似的。以致在写这篇回忆之前，竟误记为先由钦文回杭打点，是我陪了来到杭州的。可是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明明写着那天晚上，斐君和我到车站上去接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鲁迅先生记错了？我就写信去问钦文。得钦文复信后，才证明还是我记错了。可是到如今，眼睛一闭，沪杭车上的两个穿黄色服装的兵士，怎样一次又一次的来到鲁迅先生的座位前盘问；又怎样从行李板上拿下那只赭色的手提皮箱，打开来翻查；火车到嘉兴站时，他们斜着眼睛，瞅着鲁迅先生，悄悄地叮嘱接班的兵士以后，挤下车去，而且还听到了车窗外面嚷着"南湖菱"的叫卖声。一切都历历在目，然而还是记错了。我想，这该是由于鲁迅先生在讲述时的绘声绘形，给我的印象很深，虽然是二十八年以前的事，现在想起，宛如亲眼看见一般，而且在记忆中以耳代目，竟变成当场目睹的事了。

五

到杭州的第二天，由郑石君邀往湖内楼外楼午饭，肴馔烹调，颇受鲁迅先生的欣赏，对菜肴中的一味虾子烧鞭笋，鲁迅先生尤为赞许。饭后，走到西泠印社，在四照阁饮茶闲谈，一直谈到傍晚，主要是谈萧伯纳和高尔基的作品，也谈一些中国的绘画雕刻和别的。临出来时还在西泠印社买了一些拓本，内中有一种是五代前蜀贯休画的罗汉像石刻影印本，我由于先生的介绍，也买了一本，计十六帧，现在还藏着。

这一天晚上，我邀鲁迅先生、景宋夫人及郑石君、许钦文兄

弟等人到功德林去晚餐。功德林开设在杭州龙翔桥附近，是一个在杭州城里比较出名的素菜馆。平日鲁迅先生是不大喜欢到素菜馆去的。在北京时也常谈到。这回又算我的“捣乱”吧，偏要请鲁迅先生去。

鲁迅先生的不喜欢去素菜馆，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素”，当然也不是因为鲁迅先生嗜好荤腥。平素，鲁迅先生倒是爱吃蔬菜的。记得鲁迅先生还住在北京西三条的时候，有一次留我在家里便饭，饭菜中有一个油菜薹的汤，先生先尝一尝，就用筷子点着这个汤说，“还好”，劝我多吃些。鲁迅先生对素菜馆的不满，是因为当时一般的素菜馆中，常有一些伪装的鸭、假样的鱼、以及素鸡、素火腿一类素食荤名的菜肴，鲁迅先生以为如果有人愿意去吃鱼吃鸡鸭，吃去好了，既是要戒杀生、吃素持斋，却仍不能忘情于鸡鸭鱼肉，素菜荤名，实在大可不必。因之，鲁迅先生在平日就不大喜欢到素菜馆中去吃这些以假乱真的东西。

功德林既是一个在杭州负有盛名的素菜馆，自然也不能免俗，但菜类较多，烹调也可口，我们去了，原可以不点这一类假鱼假肉的菜的，又因暑热，所以我选定了它。虽属明知故犯，却自以为情犹可原。去了之后，幸好没有引起鲁迅先生的厌烦，有一些菜肴，且颇为鲁迅先生所欣赏，尤其对“笋油”，就是清燉笋干尖，颇为称道。

六

假使夏天住在上海，已感到暑热，那末来到杭州不会比上海感到清凉一些的，除非住到西湖的山里面去，也许会好些。在上海，夏晚还有海风来调节一下，住在西湖边，尤其在湖面上，夏晚吹来的却是一阵阵的热风，吹得人很不好受。这滋味我是尝到过的，那还是在我到杭州的第一年，天热，屋里坐不住，就到湖上

去，结果被热风吹回来了。

鲁迅先生在杭州的那几天，偏偏天气酷热，客旅中的饮食起居，当然不如居家方便，以致先生到杭州的第二日午后，肠胃受病，腹泻，不便出游，虽说就在客栈中服药休息，其实是闷在那里，如先生所谓“蒸神仙鸭”似的蒸了半日。

次日，亦即鲁迅先生到杭州的第三日，腹泻好了，又到楼外楼去吃午饭，是鲁迅先生和景宋夫人作东，约我们去的，饭后去到“虎跑”。

“虎跑”，在杭州不但以泉水出名，而且林木幽深，可行可憩，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我们到了那里，喝茶，谈天，舀泉水洗头、濯足，这时节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年龄比我们大来，说笑，嘻闹，到院中泉眼一个小方水池前去丢铜元，他都来参加，尽情的玩。累了，渴了，大家再坐下来。喝茶，谈天，茶淡了，一次再一次的重泡，也不知喝了多少碗。山中林木深处，天晚的早，以为天黑了，走出山来，太阳还蹲在山头上没下去。我们就是这样的，在虎跑寺里，看的天黑下来了，就向城内叫来一辆敞篷汽车，绕净慈、苏堤归来。在车上向里西湖的葛岭、保俶山一带望去，晚霞正放射着异乎寻常的光彩，衬着保俶塔，在西边的天上。有的是一团一团的象火焰，也象浓烟；有的是象画家用大笔在天上抹了一笔，象峭壁，也象高峰，矗入霄汉；有的颜色是蓝的，在曲曲折折的四周镶一条银色的边；也有的金色的光芒露在橙色的云端。看着看着，又变成另一个形态和另一种颜色了。车过涌金门，保俶塔只露着一个尖顶，快要望不见时，我说：古人诗中的“夏云多奇峰”原是写实。鲁迅先生答道：“今人的名叫夏奇峰，却近乎象征了。”这时节又听到了先生爽朗的笑声。

七

尽管我们也常常的听见过鲁迅先生愉快的笑声，但象这次游杭州那般快乐、高兴，真是少见。我们当然愿意他们能在杭州多住几天，可是天实在太热，十七日的早晨，鲁迅先生就和景宋夫人离杭返沪了。

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先生约我同到城站抱经堂书店去买了一些旧书。又在旗下看了几家新书店。晚上又同到清河坊翁隆盛茶庄去买龙井。鲁迅先生说，杭州旧书店的书价比上海的高，茶叶则比上海的好。书和茶叶都是鲁迅先生所爱好的，常叫我从杭州买了寄去。

鲁迅先生在杭州住了四日，虽是那么难得的高兴；在后来见面时说起来也总不忘此行。但说到杭州时，以为杭州的市容，学上海洋场的样子，总显得小家子气，气派不大。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象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到了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我离开了杭州，又回到北京。在我还没有离杭的一段时间中，鲁迅先生给我的信里，总仍说到忙和疲倦，我就借口于灵峰的梅花开了，或者满觉陇的桂花开了等等因由，想请鲁迅先生再一次的来到杭州游憩几天，哪怕只是三四天也好，但终未能如愿了！

许钦文当时曾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这次来杭，象是度了蜜月。后来我才知道，鲁迅先生的预备要来杭州玩几天，确是在和景宋夫人结婚时就约定了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俩象这次在杭州这样的畅游，也是唯一的一次，确也象一个小型蜜月旅行。

而且在鲁迅先生战斗劳苦的一生中，也只有这一次，居然匀出四天的时间来休息了一下。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九月号）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的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象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象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的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濛濛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

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象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的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象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烈，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

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掖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用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用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

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①，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希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的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① 应为鲁迅翻译《钲》的原稿，请参看许广平著《关于鲁迅的生活》。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的吸着烟。

海婴不安的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的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

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的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的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象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

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老板是犹太也许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就用眼瞪着她，很生气的看了她半天，而后说：

“是做什么的呢？”

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戴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

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的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象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作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作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那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

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的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

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从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间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

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的在讲一些什么。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花花的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的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擦擦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

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五十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了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的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得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做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象女工住的屋子，又不象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象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的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

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得溜明。

一九三六年三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的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快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的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花拉花拉的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的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

后门的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的，不动的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的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的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象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海上述林》校样，一九三五年冬，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的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

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的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的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就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一九三五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在饭馆里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的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袅袅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阖一阖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象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一九三六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晚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京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花花的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下午热度总在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之间，有时也到三十九度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色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有的时候张开眼睛看看，有的时候似睡非睡的安静的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的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而仍很远的蹲在书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

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的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那表格是一张硬纸，上面画了无数根线，许先生就在这张纸上拿着米度尺画着度数，那表画得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象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连的站着。许先生虽然每天画，但那象是一条接连不断的线，不过从低处到高

处，从高处到低处，这高峰越高越不好，也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度越高了。

来看鲁迅先生的人，多半都不到楼上来了，为的是请鲁迅先生好好的静养，所以把客人这些事也推到许先生身上来了。还有书、报、信，都要许先生看过，必要的就告诉鲁迅先生，不十分必要的，就先把它放在一处放一放，等鲁迅先生好了些再取出来交给他。然而这家庭里边还有许多琐事，比方年老的娘姨病了，要请两天假；海婴的牙齿脱掉一个要到牙医那里去看过，但是带他去的人没有，又得许先生。海婴在幼稚园里读书，又是买铅笔，买皮球，还有临时出些个花头，跑上楼来了，说要吃什么花生糖什么牛奶糖，他上楼来是一边跑着一边喊着，许先生连忙拉住了他，拉他下了楼才跟他讲：

“爸爸病啦，”而后拿出钱来，嘱咐好了娘姨，只买几块糖而不准让他格外的多买。

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一打门，许先生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的是再多打几下，就要惊醒了鲁迅先生。

海婴最喜欢听讲故事，这也是无限的麻烦，许先生除了陪海婴讲故事之外，还要在长桌上偷一点工夫来看鲁迅先生为着病耽搁下来的尚未校完的校样。

在这期间，许先生比鲁迅更要担当一切了。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盘，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的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着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的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着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一个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些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桌子上自己悠然的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

那已经送上去的一碗牛奶又带下来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欢喜吃硬

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的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的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就问许先生：

“有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精神好些，就一一的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先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这样的病，为什么鲁迅先生自己一点也不晓得呢，许先生说，周先生有时觉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说，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医生，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

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

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

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的药，还吃停止肺病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在楼下的客厅里许先生哭了。许先生手里拿着一团毛线，那是海婴的毛线衣拆了洗过之后又团起来的。

鲁迅先生在无欲望状态中，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想，睡觉是似睡非睡的。

天气热起来了，客厅的门窗都打开着，阳光跳跃在门外的花园里。麻雀来了停在夹竹桃上叫了三两声就又飞去，院子里的小孩子们唧唧喳喳的玩耍着，风吹进来好象带着热气，扑到人的身上，天气从刚刚发芽的春天，变为夏天了。

楼上老医生和鲁迅先生谈话的声音隐约可以听到。

楼下又来了客人。来的人总要问：

“周先生好一点吗？”

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

但今天说了眼泪就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

“周先生又不大好吗？”

许先生说：

“没有的，是我心窄。”

过了一会，鲁迅先生要找什么东西，喊许先生上楼去，许先生连忙擦着眼睛，想说她不上楼的，但左右的看了一看，没有人能替代了她，于是带着她那团还没有缠完的毛线球上楼去了。

楼上坐着老医生，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许先生一看了他们就自己低了头不好意思的笑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呢，而后又是慌忙的把毛线缕挂在手上缠了起来。

一直到送老医生下楼，许先生都是把背向鲁迅先生而站着的。

每次老医生走，许先生都是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门外的。许先生愉快的、沉静的带着笑容打开铁门闩，很恭敬的把皮包交给老医生，眼看着老医生走了才进来关了门。

这老医生出入在鲁迅先生的家里，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医生从楼上下来时，娘姨若在楼梯的半道，赶快下来躲开，站到楼梯的旁边。有一天老娘姨端着一个杯子上楼，楼上医生和许先生一道下来了，那老娘姨躲闪不灵，急得把杯里的茶都颠出来了。等医生走过去，已经走出了前门，老娘姨还在那里呆呆的望着。

“周先生好了点吧？”

有一天许先生不在家，我问着老娘姨。她说：

“谁晓得，医生天天看过了不声不响的就走了。”

可见老娘姨对医生每天是怀着期望的眼光看着他的。

许先生很镇静，没有紊乱的神色，虽然说那天当着人哭过一次，但该做什么，仍是做什么，毛线该洗的已经洗了，晒的已经晒起，晒干了的随手就把它缠成团子。

“海婴的毛线衣，每年拆一次，洗过之后再重打起，人一年一

年的长，衣裳一年穿过，一年就小了。”

在楼下陪着熟的客人，一边谈着，一边开始手里动着竹针。

这种事情许先生是偷空就做的，夏天就开始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就做夏天的。

许先生自己常常说：

“我是无事忙。”

这话很客气，但忙是真的，每一餐饭，都好象没有安静的吃过。海婴一会要这个，要那个；若一有客人，上街临时买菜，下厨房煎炒还不说，就是摆到桌子上来，还要从菜碗里为着客人选好的挟过去。饭后又是吃水果，若吃苹果还要把皮削掉，若吃荸荠看客人削得慢而不好也要削了送给客人吃，那时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

许先生除了打毛线衣之外，还用机器缝衣裳，剪裁了许多件海婴的内衫裤在窗下缝。

因此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钮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件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拆起来做一件袍子，正说着，海婴来了，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婴又要麻烦起来了，一定要说是他的，他就要要。

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

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一道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钮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

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

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现在许先生在窗下缝着衣裳，机器声格答格答的，震着玻璃门有些颤抖。

窗外的黄昏，窗内许先生低着的头，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重续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

许先生的手指把捉了在缝的那张布片，头有时随着机器的力量低沉了一两下。

许先生的面容是宁静的、庄严的、没有恐惧的，她坦荡的在使用着机器。

海婴在玩着一大堆黄色的小药瓶，用一个纸盒子盛着，端起来楼上楼下的跑。向着阳光照是金色的，平放着是咖啡色的，他招聚了小朋友来，他向他们展览，向他们夸耀，这种玩意只有他有而别人不能有。他说：

“这是爸爸打药针的药瓶，你们有吗？”

别人不能有，于是他拍着手骄傲的呼叫起来。

许先生一边招呼着他，不叫他喊，一边下楼来了。

“周先生好了些？”

见了许先生大家都是这样问的。

“还是那样子，”许先生说，随手抓起一个海婴的药瓶来。“这不是么，这许多瓶子，每天打一针，药瓶子也积了一大堆。”

许先生一拿起那药瓶，海婴上来就要过去，很宝贵的赶快把那小瓶摆到纸盒里。

在长桌上摆着许先生自己亲手做的蒙着茶壶的棉罩子，从那蓝缎子的花罩子下拿着茶壶倒着茶。

楼上楼下都是静的了，只有海婴快活的和小朋友们的吵嚷

躲在太阳里跳荡。

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

有一天他站在走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

“爸爸,明朝会!”

鲁迅先生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的连串地喊起来:

“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

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

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象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的说出:

“明朝会,明朝会。”

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来了,不住的训斥着海婴。

海婴一边笑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

“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赴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手下挟着黑花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的就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的，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老医生还是照常的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哪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倚着桌子边站着，好象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的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的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的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缺　页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一九三九年十月

（原载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生活书店一九四一年第一次版）

编　后

本书收辑了有关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四十一篇，结集为《鲁迅回忆录》一集，谨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四十一周年。

本书各篇一部分选自过去的报刊，其他则是约请作者新写的。即使是选载的，也有不少篇由原作者作了修订和补充。曾经与鲁迅共同战斗，或者亲身领受鲁迅教诲的许多同志，如宋庆龄、茅盾、周建人、王冶秋、陈望道、曹靖华、叶圣陶、徐彬如、唐弢、巴金、冯至、李霁野、赖少其、张望、刘岘、曹白、于伶、川岛等，都热心为本书撰稿和改稿。茅盾同志还在百忙中为本书题签，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我们热望有更多的同志踊跃为本书撰稿，以俾二集、三集……能陆续出版。

《鲁迅回忆录》的出版，也是对祸国殃民“四人帮”的批判和鞭挞。这伙“黑暗的动物”极端仇视与惧怕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因此他们放肆地涂抹鲁迅形象，卑劣地篡改鲁迅精神，阴险地封禁鲁迅著作，横暴地窒息鲁迅研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也曾公然无理扼杀

了《鲁迅回忆录》的出版，但历史证明他们的倒行逆施是徒劳的。“四人帮”紧步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后尘，他们的命运当然也就和他们师承的前辈一样，如同鲁迅所预言的，必然遭到化为“烟埃”的结局。

我们坚信：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必将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鲁迅研究和出版工作，也将重开新生面。

编　者

一九七七年九月

书号：10078·3002
定价：0.77元